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月刊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2023年第11期(总第233期)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李新芳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建军 刘晓清 汪东波 陈 红 吴建中

李国新 金 鹏 柯 平 胡海荣 徐益波

章云兰 鲁东明 程焕文 褚树青

主 编 胡海荣

副 主 编 赵继海 屠淑敏 郑秀花

编 辑 部

编 辑 李 芳 王晓琳 孙晓清

编 务 徐越人

英文编译 鞠 婧

刊名题字 沙孟海

封面设计 黄海晶

主管单位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单位 浙江图书馆

协办单位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编辑出版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

地 址 杭州市曙光路73号

邮 编 310007

电 话 (0571) 87988086

在线投稿 <http://bjb.zjlib.cn>

编读往来 lsrw@zjlib.cn

刊 号 ISSN2096-2363
CN33-1398/G2

定 价 22 元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3-11-10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月刊)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目录 2023年第11期(总第233期)

■ 专题 聚焦未成年人阅读

电子媒介、纸质媒介与青少年阅读效率

——基于178名受试者的实验调查 廉丽华 5

数字图书馆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问题与解决路径* 李紫阳 12

公共图书馆智障儿童阅读服务策略探析*

——以嘉兴市图书馆为例 薛路 俞亚军 19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儿童图书馆建设的生态维度分析 蔺梦华 25

■ 探索与创新

带区间信息的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群决策评价模型*

谢小军 马虹 薛申芳 乔希民 31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社交媒体“伪科普”信息特征研究*

李文文 吕海若 王诗语 张杨 38

我国公共图书馆弹幕视频网络运营现状与优化策略分析*

——以Bilibili为例 韩世曦 李金伟 43

ChatGPT赋能高校图书馆智能咨询服务研究* 王超 潘雪峰 49

同行评议期刊

A Peer Reviewed Journal

■ 工作研究

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合建分馆的发展路径选择：一项定性的比较分析

吕 果 54

数字时代公共图书馆纪录片资源建设的实践与策略*

郭晓婉 61

高校图书馆参与地方老字号文化资源建设的实践探索

李林瑛 李向云 于 冬 68

■ 基层图书馆

县级公共图书馆藏地方民国报纸开发利用探析

——以浙江省平湖市图书馆为例

沈 芳 73

舟山地区海岛“微信图书馆”的建设实践

袁素霞 78

■ 文献学研究

《史汉异同补评》的版本及体例*

王 悦 83

以“残缺”为“实”的文献保护研究

——以《嬾放大禅师语录》修复为例

吴 爽 吕 芳 90

本刊载文已被中国知网系列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平台、博看网、龙源网期刊收录，凡作者向本刊投稿并同意发表论文，均视为作者将该文著作权授予本刊，其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不再另行支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中邮阅读网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CONTENTS

No.11 2023 (Serial No.233) Monthly

Electronic Media, Print Media, and Adolescent Reading Efficiency: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with 178 Participants	Lian Lihua	5
Practical Issues and Solutions regard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for Underage Readers in Digital Libraries	Li Ziyang	12
Exploring Strategies for Reading Services for Children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n Public Libraries: A Case Study of Jiaxing City Library	Xue Lu Yu Yajun	19
An Ecological Dimension Analysis of the Involvement of Social Powers in Community Children's Library Construction	Lin Menghua	25
A Group Decision-Making Evaluation Model for University Library Service Quality with Interval Information	Xie Xiaojun Ma Hong Xue Shenfang Qiao Ximin	31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seudoscience" 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Li Wenwen Lv Hairuo Wang Shiyu Zhang Yang	38
Analysis on the Operation Statu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Bullet Screen Video of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 Taking Bilibili as an Example	Han Shixi Li Jinwei	43
Empowering Intelligent Consultation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with ChatGPT	Wang Chao Pan Xuefeng	49
Development Path Selection for Public Library Branches Co-Constructed with Social Power: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Lv Guo	54
Practice and Strategies in Developing Documentary Film Resources in the Digital Era for Public Libraries	Guo Xiaowan	61
Exploring the Involve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of Local Time-Honored Cultural Heritage	Li Linying Li Xiangyun Yu Dong	68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ocal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1912-1949) Newspapers in County-Level Public Libraries: A Case Study of Pinghu Library in Zhejiang Province	Shen Fang	73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WeChat Library for Island Areas: A Case Study of Zhoushan Region	Yuan Suxia	78
Editions and Structure of <i>Supplement of the Comments o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hih Chi and Hanshu</i>	Wang Yue	83
A Case Study of Document Restoration Emphasizing the "Real" in the "Incomplete": Restoration of <i>Zen Master Fangda's Quotations</i>	Wu Shuang Lv Fang	90

· 专题 聚焦未成年人阅读 ·

电子媒介、纸质媒介与青少年阅读效率

——基于178名受试者的实验调查

廉丽华

(本溪市图书馆 辽宁本溪 117099)

摘要: 通过178名受试者的数据搜集,对青少年纸质媒介与电子媒介的阅读表现进行实验分析,探究不同媒介对青少年阅读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受试者在电子媒介上的阅读时间比在纸质媒介上更短,但这影响了主要观点的理解。此外,电子媒介会影响受试者自我评估与实际表现之间的性能校准,造成性能校准偏差较大。另外,通过对性别分析,发现男生在电子媒介上阅读时的性能校准程度低于纸质媒介阅读。研究证实了电子媒介阅读会造成青少年阅读效率下降,进而为青少年通过合理媒介阅读提供了干预性学术依据。

关键词: 电子媒介;纸质媒介;青少年;阅读效率

中图分类号: G252

文献标识码: A

Electronic Media, Print Media, and Adolescent Reading Efficiency: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with 178 Participants

Abstract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from 178 participants, this study conducts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adolescent reading performance in print media and electronic media, aiming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media on adolescent reading efficienc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participants spent less time reading on electronic media compared to print media, but this affected their comprehension of key points. Additionally, electronic media influenced the performance calibration between participants' self-assessment and actual performance,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calibration bias. Furthermore, gend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male students demonstrated lower performance calibration levels while reading on electronic media compared to print media. The study confirms that reading on electronic media leads to decreased reading efficiency among adolescents, providing intervention-based academic evidence for promoting adolescent reading through appropriate media.

Key words electronic media; print media; adolescent; reading efficiency

1 引言

数字时代各类电子媒介不断兴起与发展,以数字电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为代表的新兴电子媒介终端已经深入人类的社会生活,而青少年同样也面临着数字化的机遇与挑战^[1]。随着数字信息系统的不断更新与完善,电子媒介不仅影响到成人的社会生

产方式,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青少年的生活与学习产生影响。

既往文献已经指出了电子阅读与纸质阅读可能存在的差异。如Jenson等人认为,媒介对阅读性能可能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影响^[2]。Buckingham考察了电子阅读与阅读理解之间的关系,发现当文本类型是信息性的或信息和叙述性的混合时,电子阅读劣势增加^[3]。Radovanović等人通过观察分析得出,学生在屏

幕上阅读比纸质阅读的时间更短、对阅读文本主要的信息理解更不准确^[4]。马捷等人探讨了阅读媒介与发展性阅读障碍之间的关系^[5]。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发现,不同的阅读媒介对青少年阅读有不同的影响。但是,纸质媒介与电子媒介,对青少年阅读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尚缺乏实验调查分析。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多元化阅读媒介究竟怎样影响青少年的阅读行为和阅读效率,尚缺乏实验证据。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实验法,以青少年为被试对象,对其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的表现进行实验分析,探究纸质媒介与电子媒介对阅读效率的影响,从而为青少年选择合适的阅读媒介,提供干预性学术线索参考。

2 实验设计

2.1 实验对象招募

本研究在本溪市招募了178名受试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年龄分段,青少年年龄为10—19岁,考虑到数据获取的可得性,本研究选择了这一年龄段的初中生与高中生。具体人口统计学样本如表1所示。

表1 实验样本描述性统计

项目	特征	频次	占比/%
年龄	11—12	31	17
	13—14	42	24
	15—16	34	19
	17—18	39	22
	19	32	18
性别	女性	91	51
	男性	87	49
年级	初一	41	23
	初二	33	19
	初三	25	14
	高一	31	17
	高二	32	18
	高三	16	9
偏好	电子阅读	109	61
	纸质阅读	69	39

2.2 实验材料

本研究选择了两篇中文课文,字数分别为381字和467字。可读性是使用Gulpease指数计算的,索引

上的分数越高(最大100=非常容易),文本就越容易。两篇课文的得分分别为51分和53分,课文难度适中。每个文本都使用Times New Roman格式,字体大小为14,并向左对齐。每个文本都呈现在一页上,因此无需翻页(在纸质条件下)或滚动(在数字条件下)即可阅读全文。标题居中并用粗体大写汉字书写。两个文本具有相同的结构,并由五个段落组成。

2.3 实验变量

阅读效率应该如何衡量?本研究参照Hu等人研究,从阅读时间、文本理解、性能校准、阅读记忆、读词能力、理解能力、主题知识理解与阅读兴趣八个维度展开分析^[6]。

2.3.1 阅读时间

在数字条件下,Qualtrics会自动记录在文本页面上花费的时间(以秒为单位)。在纸质条件下,使用智能手机上的计时器功能记录阅读时间。一旦研究人员向实验者发出信号,他们应该翻开空白页并开始纸张的另一侧阅读,并计时。

2.3.2 文本理解

本研究从三个不同层面评估了学生的文本理解能力,即主要观点、要点和其他相关信息。在主要观点层面的理解需要超越单一思想并整合思想的能力,以代表文本中讨论的最核心问题,在概括或抽象的层面上理解文本内容。在要点层面的理解(每个文本中有两个)需要能够表示与主要观点直接相关的独立句式并提取出关键信息。在其他相关信息层面的理解需要能够识别与主要观点没有直接联系但仍与主题相关的信息。

具体来说,实验者被要求解释文章的主要观点,列出要点,并写下他们能记住的任何其他相关信息。关于主要观点问题的答案得0—3分:0分为没有回答或不正确的回答;0.5分为提及特定主题的回复,没有任何额外解释;构成主要观点的每条额外信息增加0.5分,最高得分为3分。关于每个文本的两个预定义要点的问题的回答得0—2分,最高4分:没有回答或错误回答得0分;相关且准确但不完整的答案得1分;相关、准确和完整的回答为2分。对每篇文章中有关其他相关信息的问题的回答得0—10分,未回答或错误回答得0分。

2.3.3 性能校准

与其他专注于理解能力校准的研究一样,实验

者被要求回顾性地自我评估他们的表现,使用10分制(1=我根本没有回答好;10=我回答得很好;最高分=30)进行赋分。由于校准被定义为自我评估与实际表现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表现判断和相应的理解分数都必须使用类似的指标。因此,本研究通过计算比例分数将理解任务中每个答案的分数转换为10分制。然后,通过从性能判断中减去实际性能分数来计算学习者的校准偏差。本研究计算了所有三个问题的校准偏差的平均分数。

2.3.4 阅读记忆

实验要求实验者默读每个句子,并确定其真实性,然后记住每个句子的最后几个词语。当灰色屏幕出现时,实验者需以正确的顺序写下所记住的词语。整个实验持续了12—15分钟。实验者的阅读跨度得分是正确记住的最大数量,即能够以正确顺序重现的最后一个词语的数量。

2.3.5 读词能力

实验要求实验者完成一组管理的词汇决策任务。任务中,实验者需要阅读一个包含60个词语和60个非词语的列表,以此来评估他们的词语阅读速度以及识别无意义语言刺激的能力。在2分钟内,实验者需要尽可能快地仅标记非词语,并且不能出现任何错误。最初的练习任务是关于词语和非词语的简短列表。每标记一个正确的非词语,得一分(最高分为60);每标记一个错误的词语,则从总分中减去一分。

2.3.6 理解能力

为了测试实验者的阅读理解能力,让实验者阅读两篇课文,一篇叙述课文和一篇信息课文,并回答每篇课文的12道多项选择题(最高分=24分)。

2.3.7 主题知识

本研究评估了实验者对两个文本中讨论的主题的先验知识,为每个主题使用三个开放式问题,检测实验者主题知识的拓展性内容(最高分=24分)。

2.3.8 阅读兴趣

本研究使用两个自我报告量表,每个量表有八个项目来评估实验者的阅读兴趣。这些量表改编自Suwana使用的量表^[7]。实验者以5分制表示对每个项目的同意程度(1=完全没有;5=很多)。恐惧症量表的例子是:“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会感到无法解释的恐惧”,以及“我发现了解恐惧症是什么毫无用处,

因为你无法控制它们”(反向编码)。压力量表的例子是:“我认为知道可以做些什么来减少压力的影响是有用的”,以及“我不在乎知道压力对我的身体的后果”。

2.4 实验程序

本研究在本溪市第一中学进行实验,数据收集是在学校常规课程期间,老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实验分三节课进行,每节课之间的时间间隔约为一周。第一节课中,学生按程序为所有协议创建识别码,并完成了简短的人口统计调查。在同一会话中,还测量了控制变量,包括阅读记忆、词语阅读、阅读理解、主题知识和阅读兴趣。在第二和第三节课中,实验者完成了研究的阅读和理解部分。为了研究的目的,每个班级分为两组。在两次阅读课程中,班上的所有学生都阅读相同的文本,但其中一半阅读该文本的印刷版,另一半阅读该文本的数字版本。且在两次阅读课程中,两组进行版本互换。在收到文本之前,实验者被指示如下:“您将收到一段要阅读的文章,然后问三个关于您阅读内容的开放式问题。您可以根据需要使用尽可能多的时间来阅读文本,因为阅读后您将无法在回答理解问题时重新访问文本。这清楚吗?你有什么澄清问题吗?”实验者还被告知,他们将有无限的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在回答理解问题后,实验者被要求判断他们的表现。

2.5 实验工具

本研究考虑到了数据的多层次性,并使用带有随机截距的线性混合模型(Linear Mixed Model with Random Intercepts, LMM)来模拟这些层次。对于每个结果,班级和学生的变量被用作随机效应。

所有的统计分析都是用R软件4.0.3版进行的,使用lme4和nlme软件包来拟合LMMs, ggplot2用于图形部分。P值是双侧的,统计显著性水平定义为<0.05。此外,还使用R软件的Process中的自举程序进行了中介分析。研究允许测试校准是否在阅读媒介(虚拟编码为数字=0和纸质=1)和主要观点、要点和其他相关信息层面的理解之间起到中介作用^[8]。

3 结果与讨论

3.1 描述性统计

首先测试数据的正态分布。测量变量近似呈正

态分布,因此适用于参数统计分析。表2按介质报告了整个样本的控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表2 样本和介质描述性统计

项目	M(SD)	偏度(SE)	峰度(SE)
控制变量	读词能力	44.88(10.72)	-0.58(0.22)
	阅读记忆	2.37(1.00)	-0.25(0.20)
	理解能力	14.54(4.28)	-0.75(0.20)
	主题知识	1.19(0.54)	0.37(0.20)
	阅读兴趣	30.61(5.51)	-0.43(0.20)
纸质媒介	阅读时间	5 5 7 . 4 2 (216.14)	0.84(0.20)
	主要观点理解	0.92(0.54)	1.06(0.20)
	要点理解	0.65(0.98)	1.16(0.20)
	其他相关信息理解	3.013(2.02)	0.019(0.20)
	性能校准	3.89(1.89)	-0.12(0.20)
电子媒介	阅读时间	5 4 1 . 5 9 (259.33)	0.55(0.20)
	主要观点理解	0.81(0.50)	1.51(0.20)
	要点理解	0.59(0.77)	1.32(0.20)
	其他相关信息理解	2.73(2.00)	0.24(0.20)
	性能校准	4.76(1.59)	-0.49(0.25)

注:“M”(Mean)即均值;SD(Standard Deviation)即标准偏差;偏度(SE)表示数据分布的偏度(skewness)及其标准误差(Standard Error, SE);峰度(SE)表示数据分布的峰度(kurtosis)及其标准误差(Standard Error, SE)。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电子媒介具有更快的阅读速度,但是在主要观点理解、要点理解、其他相关信息理解上均弱于纸质媒介。

3.2 阅读媒介对阅读时间的影响

LMM模型测试了阅读媒介对阅读时间的影响,同时控制了潜在的干扰变量,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的结果表明,阅读媒介对阅读时间没有显著影响。实验者在阅读数字文本时表现更快,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主题知识和性别是唯一对结果变量(阅读时间)有显著影响的预测因子。该模型解释了60%的方差,其中5%由固定效应解释。

模型2探讨了阅读媒介与性别之间潜在的有趣相互作用,并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7$),模型解释了61%的方差(6%由固定效应解释)。对于男生,在平板电脑上阅读时的阅读时间显著减少(减少53秒,95%CI: -106.35至-0.42)。对于女生,两种阅读媒介之间的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

3.3 阅读媒介对理解主要观点、要点和相关信息的影响

本研究测试了阅读媒介对理解主要观点、要点和其他相关信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主要观点理解方面,阅读媒介、性别和阅读理解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4)。模型1解释了27%的方差(其中15%由固定效应解释)。相较于在屏幕上阅读,实验者在纸上阅读时能够更好地识别文本中讨论的中心问题。

表3 阅读媒介对阅读时间的影响

项目	模型1			项目	模型2		
	B	95%置信区间	p		B	95%置信区间	p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截距	434.45	[320.87—548.03]	<.001	截距	458.07	[342.62—573.53]	<.001
中位数[D]	-6.13	[-40.73—28.46]	0.727	中位数[D]	-53.39	[-107.38—0.60]	0.053
性别[男]	88.86	[33.36—144.37]	0.002	性别[女]	49.49	[-16.05—115.02]	0.138
主题知识	53.41	[0.91—105.90]	0.046	主题知识	53.41	[0.91—105.90]	0.046
				中位数[D] x 性别[F]	78.76	[9.05—148.46]	0.027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σ 2	23 174.74			σ 2	22 576.96		
τ 00 班级	15 171.95			τ 00 班级	15 470.84		
τ 00 学校	16 065.71			τ 00 学校	16 065.71		
ICC	0.57			ICC	0.58		
Marg. R ² /Cond. R ² =0.053/0.597				Marg. R ² /Cond. R ² =0.060/0.608			

注: β 为回归系数,即变量对结果的影响程度; p 用于判断统计结果是否显著; σ^2 为随机效应的变异性; τ 为随机截距的变异性; ICC 为类内相关系数,测量类内个体的相似度; Marg. R^2 为边际 R 方,衡量固定效应的解释力; Cond. R^2 为条件 R 方,衡量整个模型的解释力。

在数字阅读时,理解主要观点的分数在统计学上显著下降,为0.11分。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女生的表现优于男生,一般理解能力较高的学生与主要观点理解得分较高相关。此外,研究还探讨了媒介与性别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没有发现统计学意义(见表4中的模型2)。

关于要点的理解,模型没有显示出阅读媒介的任何效果。模型1解释了19%的方差(7%由固定效应解释)。实验者从纸质媒介移动到电子媒介平均少获得0.16分。同样,在模型2中测试了媒介和性别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没有统计学意义(见表5)。

LMM的研究结果表明,阅读媒介对理解其他相关信息的能力没有任何影响。模型1解释了55%的

方差(其中19%由固定效应解释)。在电子媒介上阅读时,相较于纸质阅读,实验者的理解能力下降了0.28分,这个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6),同时阅读理解和性别也具有统计学意义。高得分与理解文本的能力有关,女生的表现比男生好。然而,阅读媒介和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并没有统计学意义(见表6中的模型2)。

3.4 阅读媒介对性能校准的影响

为了回答阅读媒介对性能校准的影响,理解表现的校准偏差分数被用作LMM的结果变量。研究结果表明,阅读媒介对阅读能力的校准有影响,模型解释了59%的方差(其中10%由固定效应解释)。实验者在纸质阅读后,在对自己的理解能力进行自我评

表4 阅读媒介和控制变量对理解主要观点的影响

项目	模型 1			项目	模型 2		
	B	95% 置信区间	p		B	95% 置信区间	p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截距	0.01	[-0.35 - 0.37]	.958	截距	0.02	[-0.34—0.39]	.902
中位数 [D]	-0.11	[-0.21—-0.01]	.039	中位数 [D]	-0.13	[-0.29—0.03]	.104
性别 [男]	0.14	[0.02—0.27]	.023	性别 [女]	0.12	[-0.04—0.28]	.141
理解能力	0.03	[0.02—0.05]	<.001	理解能力	0.03	[0.02—0.05]	<.001
阅读兴趣	0.01	[-0.00—0.02]	.080	阅读兴趣	0.01	[-0.00—0.02]	.080
				中位数 [D] x 性别 [F]	0.04	[-0.16—0.25]	.674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σ 2	0.20			σ 2	0.20		
τ 00 班级	0.03			τ 00 班级	0.03		
τ 00 学校	0.00			τ 00 学校	0.00		
ICC	0.14			ICC	0.14		
Marg. R²/Cond. R²=0.150/0.268				Marg. R²/Cond. R²=0.150/0.266			

表5 阅读媒介对要点理解的影响

项目	模型 1			项目	模型 2		
	B	95% 置信区间	p		B	95% 置信区间	p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截距	-0.12	[-0.54—0.30]	.586	截距	-0.13	[-0.57—0.31]	.558
中位数 [D]	-0.16	[-0.34—0.02]	.084	中位数 [D]	-0.13	[-0.42—0.16]	.365
性别 [男]	0.03	[-0.17—0.22]	.789	性别 [女]	0.05	[-0.22—0.32]	.723
理解能力	0.04	[0.01—0.06]	.004	理解能力	0.04	[0.01—0.06]	.004
阅读记忆	0.10	[-0.01—0.21]	.065	阅读记忆	0.10	[-0.01—0.21]	.066
				中位数 [D] x 性别 [F]	-0.04	[-0.42—0.33]	.815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σ 2	0.64			σ 2	0.65		
τ 00 班级	0.03			τ 00 班级	0.03		
τ 00 学校	0.07			τ 00 学校	0.07		
ICC	0.13			ICC	0.13		
Marg. R ² /Cond. R ² =0.073/0.194				Marg. R ² /Cond. R ² =0.073/0.191			

估时比电子媒介阅读后校准更准确。与纸质阅读相比,实验者在电子媒介阅读时的校准误差高出0.43分。该研究发现,词汇阅读和性别对校准有显著影响,低的校准分数与更好的词汇阅读能力有关,女性的校准误差比男性低(见表7)。

进一步探讨媒介与性别之间潜在的有趣相互作用,将两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项添加到模型的固定部分,以检验中等效应是否受性别调节。虽然只有统计学显著性的趋势,但本研究分别对男生和女生重新运行LMM。男生的统计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电子媒介的阅读条件下,男生的校准偏差增加了0.75分,女生的校准偏差仅增加了0.21分。这表明,在电子媒介阅读条件下,性别对校准误差产生了显著影响。相比于女性,男性的校准误差增加更多。

3.5 讨论

本研究旨在扩展有关阅读媒介对青少年阅读效率的影响研究。首先,涉及到的对象是青少年,这一群体在以前很少被研究。其次,采用了LMM模型等方法,以控制各种影响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第三,除了阅读时间和理解力,还特别关注了青少年在

表 6 阅读媒介对理解其他相关信息的影响

项目	模型 1			项目	模型 2		
	B	95% 置信区间	p		B	95% 置信区间	p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截距	-0.50	[-1.78—0.79]	.447	截距	-0.50	[-1.80—0.80]	.454
中位数 [D]	-0.28	[-0.59—0.03]	.073	中位数 [D]	-0.28	[-0.77—0.20]	.252
性别 [男]	0.97	[0.48—1.46]	<.001	性别 [女]	0.97	[0.39—1.55]	.001
读词能力	0.02	[-0.01—0.04]	.146	读词能力	0.02	[-0.01—0.04]	.146
理解能力	0.11	[0.05—0.18]	.001	理解能力	0.11	[0.05—0.18]	.001
主题知识	0.40	[-0.11—0.90]	.122	主题知识	0.40	[-0.11—0.90]	.122
				中位数 [D] x 性别 [F]	0.01	[-0.62—0.63]	.986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σ^2	1.81			σ^2	1.83		
τ^2 00 班级	1.22			τ^2 00 班级	1.22		
τ^2 00 学校	0.25			τ^2 00 学校	0.25		
ICC	0.45			ICC	0.45		
Marg. R ² /Cond. R ² =0.187/0.552				Marg. R ² /Cond. R ² =0.187/0.549			

表 7 阅读媒介对性能校准的影响

项目	模型 1			项目	模型 2		
	B	95% 置信区间	p		B	95% 置信区间	p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截距	5.82	[4.54—7.10]	<.001	截距	5.96	[4.45—7.48]	<.001
中位数 [D]	0.43	[0.16—0.70]	.002	中位数 [D]	1.30	[0.39—2.21]	.005
性别 [男]	−0.58	[−1.09—−0.07]	.026	性别 [女]	−0.31	[−0.89—0.27]	.298
理解能力	−0.06	[−0.13—0.00]	.062	理解能力	−0.06	[−0.13—0.00]	.063
读词能力	−0.02	[−0.05—−0.00]	.049	读词能力	−0.02	[−0.05—−0.00]	.050
主题知识	0.42	[−0.08—0.93]	.102	主题知识	0.42	[−0.09—0.93]	.103
				中位数 [D] x 性别 [F]	−0.54	[−1.09—0.00]	.051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σ 2	1.40			σ 2	1.38		
τ 00 班级	1.67			τ 00 班级	1.69		
τ 00 学校	0.00			τ 00 学校	0.00		
ICC	0.54			ICC	0.55		
Marg. R ² /Cond. R ² =0.095/0.587				Marg. R ² /Cond. R ² =0.100/0.595			

校准方面的表现。

首先讨论的问题是不同媒介下的阅读时间是否会有所不同。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与Byron等人基于高年级学生的分析研究报告的总体结果不一致。其研究指出,在针对青少年调查中,发现数字阅读的时间较长^[9]。这可能是由于Byron给青少年阅读的是不连续的文本导致的。另外,本研究显示出媒介和性别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只有男生在从纸质媒介转向电子媒介时的阅读时间会减少。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男生在电子媒介上阅读时投入的精力较少,因为他们认为电子阅读模式下的操作更容易。这一结果表明男生在数字条件下更少地校准和高估了他们的理解能力。

第二个讨论的问题是文本理解力在不同的阅读媒介中是否会有所不同。本研究发现,在电子媒介上的阅读对文本的深入理解是有害的,特别是在主要观点层面的理解上。这证实了既往电子阅读可能有害的逻辑性推导研究。然而,本研究的结果与Deszcz-Tryhubczak等人的发现不一致,他们调查了相同的三个层面(即主要观点、要点和其他相关信息)的理解,但没有发现主要观点理解的阅读媒介差异^[10]。然而,他们的研究对象为20周岁以上的大学本科生,大学生可能更有能力思考、理解并驾驭文本信息。此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可能的因素,例如年龄、阅读经验和技能水平、文化背景、教育环境等对阅读媒介的影响。因而,大学生可能适合进行电子阅读,但是初中生与高中生并不适合。

总的来说,本研究试图在青少年群体中探讨阅读媒介对阅读时间、文本理解和表现校准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数字阅读和纸质阅读之间存在一些差异,尤其是在文本理解和表现校准方面。这些结果对教育者、家长和政策制定者有重要意义,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指导,帮助学生更有效地利用不同媒介进行阅读和学习。

4 结语

本文的实验说明电子化阅读并不能取代纸质阅读,过度的电子化阅读反而会对青少年造成阅读效率的下降,因而应警惕电子媒介阅读在青少年群体中的过度渗透,家庭和学校应多鼓励青少年学生的纸质化阅读行为,出版社和图书馆应提供更多适合青少年的纸质阅读材料,为青少年学生提供良好的阅读环境^[11]。

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受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本研究的实验时间与实验场地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由于受到实验时间的影响,本研究只使用了两篇课文,因此研究结果不能推广到其他文本类型之外,以更全面地了解阅读媒介对青少年文本理解的影响。其次,实验样本仅局限于本溪一地,是否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当然,未来有条件可以对这一问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如开展更大规模的实验性调查,扩展阅读文本,寻找更多样本,以进一步探讨阅读媒介对青少年阅读效率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刘微.电子图书发展现状及前景初探[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6):81-82,93.
- [2] JENSON J,DROUMEVA M.Revisiting the media generation: Youth media use and computational literacy instruction[J].E-learning and digital media,2017,14(4):212-225.
- [3] BUCKINGHAM D.Defining digital literacy-What do young people need to know about digital media?[J].Nordic journal of digital literacy,2015,10(9):21-35.
- [4] RADOVANOVIC D,HOLST C,BELUR S B,et al.Digital literacy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Social Inclusion,2020,8(2):151-167.
- [5] 马捷,李洪晨,郝志远.阅读媒介会导致发展性阅读障碍吗?——一项面向学龄儿童群体的实证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2(5):59-72.
- [6] HU J,YU R.The effects of ICT-based social media on adolescents' digital reading performanc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ISA 2009, PISA 2012, PISA 2015 and PISA 2018[J].Computers & Education,2021,175:104342.

(下转第30页)

· 专题 聚焦未成年人阅读 ·

数字图书馆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问题与解决路径*

李紫阳

(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5)

摘要: 未成年读者是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服务对象,但实践中,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存在严重问题,应予以解决。研究发现,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问题在于监护人知情同意权的适用落空,知情环节存在告知义务与知情权利失衡问题,同意环节存在同意验证性差与非理性自愿问题。数字图书馆可采取如下具体措施解决相关问题:在知情环节提供专业与多版本服务协议,严格履行法定的持续告知义务;在同意环节尊重同意撤回权与打破数据孤岛实现同意者身份集约认证。最后,数字图书馆还应注意保护孤儿与“事实孤儿”的个人信息权益。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法;信息法治;未成年读者;监护人知情同意权;个人信息保护;数字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0

文献标识码: A

Practical Issues and Solutions regard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for Underage Readers in Digital Libraries

Abstract Underage readers are important beneficiaries of digital libraries, but in practice, there are significant issues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Empirical research has revealed that the main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for underage readers lie in the in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informed consent rights of guardians, an imbalance between disclosure obligations and the right to be informed in the disclosure process, and issues of weak consent verification and irrational voluntariness in the consent process. Digital libraries can implement the following specific measur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providing professional and multi-version service agreements in the disclosure process and strictly fulfilling the statutory obligation of continuous disclosure; respecting the right to withdraw consent and breaking data silos to achieve concentrated authentication of consents. Additionally, digital libraries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protecting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of orphaned children and de facto orphans.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law; information rule of law; underage reader; guardian's informed consent right;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digital library

1 问题的提出

因应读者个人信息保护需要,立法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

法》)第43条与第50条第2款中规定,公共图书馆及工作人员不允许出售、非法提供读者个人信息、借阅信息以及其他可能涉及读者隐私的信息,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该规定体现立法者对读者个人信息权的尊重^[1],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然而,在《中华人民

*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档案数据安全风险监管与法律保护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L22CTQ003)的阶段性成果。

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出台后,《公共图书馆法》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条款愈发显得滞后与粗糙。比如,《公共图书馆法》第34条虽然为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读者(下文简称“未成年读者”)公共阅读服务事业健康发展奠定基调,但是却不当忽视对未成年读者信息进行特殊保护的必要性。数字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的“未来样态”,未成年读者是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服务对象。因此,为防范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安全风险,数字图书馆理应对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

从立法论视角看,《公共图书馆法》应适应公共图书服务“脱实向虚”形态转变,及时自我修正,放弃未成年读者与其他读者个人信息一体化保护(实质为未成年人信息附属于成人信息保护)立法模式,增设未成年读者监护人知情同意权条款,规定浮动性同意能力补足条款,采用未成年读者选择进入模式等。然而,法律修改非朝夕之事,短期内欲通过修改《公共图书馆法》实现数字图书馆领域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法治飞跃进步的可能性有限。因此,本文认为应重点“持解释者视角,关注规则如何适用”^[2],以“通过对现行法运行状况的持续跟踪和世界法律发展动态的准确把握,为现行法律的渐进发展提供适应社会需求和时代发展的解释方法或理论根据。”^[3]目前,由于数字图书馆领域未成年读者信息法治问题颇多,受限篇幅,无法一一展示。因此,本文以“未成年读者监护人知情同意权的适用问题”为主线,“以点带面”式的研究数字图书馆个人信息保护实践难题及解决路径,以期定位数字图书服务与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平衡点,实现产业发展与个人信息保护并行的美好愿景。

2 实践问题

监护人知情同意权为未成年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因应模式,是我国立法认可的未成年个人信息保护的“帝王规则”。然而,虽然立法者与学者为监护人知情同意权预设了较为理想的法教义学功能,但实证表明,数字图书馆领域未成年读者监护人知情同意权落实效果欠佳,甚至接近功能失灵^[4],异化为未成年读者信息侵权行为挡箭牌和违法

处理未成年读者信息法律根据^[5]。

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图书馆存在两种对待未成年读者监护人知情同意权的做法:其一,规避模式。该模式以贵州数字图书馆为代表,不要求用户提供个人身份信息,不查验用户个人身份信息,不向用户提供隐私服务协议,更不会预先征求未成年读者监护人的知情与同意;其二,混同模式。该模式以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为代表,虽要求用户一揽子同意并查验身份,但不区分未成年读者与其他类别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条款。在规避模式中,由于数字图书馆在处理未成年读者信息时,自始不向其本人及监护人告知处理事项并征得同意。因而,此情形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列。对此,本文建议采用此类模式的数字图书馆应尽快树立读者个人信息保护理念,知晓读者个人信息保护与监管失职风险,针对未成年读者与其他读者分别制定在线隐私服务协议,设定专人专岗负责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确定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义务。混同模式主要问题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知情环节的告知义务与知情权利失衡问题;二是同意环节的同意验证性差与非理性自愿。

2.1 知情环节:告知义务与知情权利的失衡

知情是同意的前提,只有监护人充分知情,同意决定才是“自由的、真实的、可被确认的。”^[6]完整知情环节包括告知方充分告知与知情方完整理解,二者缺一不可。据此,数字图书馆良好告知行为应是在信息全生命周期内进行实质与持续告知,向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提供易得、易懂的隐私政策等书面文件,而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则应完整阅读并了解数字图书馆透过书面文件传达的意思表示内容。看似简单的两点要求,却难以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告知与知情之间存在巨大权利鸿沟。

首先,形式化的格式告知,难谓真正告知。尽管数字图书馆借以履行读者信息处理目的、方式与范围等事项告知义务的文件名称不同,但均是格式化文件,可读性差。此外,部分数字图书馆提供隐私协议之目的并非对用户真正告知,更不是用户真实知情,而是规避法律风险,表现出其对个人信息保护法规的遵从。因而,它们在履行个人信息处理告知义务时,极可能背离立法目的,在书面格式文本中“过分偏重告知义务在形式上的履行(即强调意思表示的发生),从而忽视意思表示应达到的效果。这样一

种“走过场”的告知”^[7],使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告知行为从保护读者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异化为规避法律监管的特权行为,个人信息保护目的彻底落空。

其次,告知义务自我免除,难谓尊重法律。部分数字图书馆基于强势地位,近乎强制性要求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接受裹挟免责条款的格式文本,并要求对未来隐私协议的可能变动进行一揽子预先同意。比如,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提供的《在线实名注册使用协议》第1.3条、第1.4条及第6.2条规定,读者点击“立即注册”即视为对协议的概括授权,授权内容既包括对当前文本内容,还包括未来可能的修改。无论不授权两者中的哪一项,读者均不能使用其数字图书服务。同时,该协议还规定,对未来可能进行的任何修改,都不再负任何形式的通知义务,这无疑是要要求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要承担随时关注条款是否改变的注意义务^[8]。此举亦与立法规定冲突,利用地势差当免除自我告知义务,不合理的让作为信息权利主体的读者负担高于立法规定的自我注意义务。

最后,告知不等于知情,格式告知影响用户知情。形式格式文本对用户知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格式文本“求全”,不断堆砌晦涩专业术语,使缺乏专业知识的用户难以真正知情,长期处于“告而不知,知而不懂”的“亚健康状态”;二是格式文本冗长影响可读性,减损隐私协议阅读效率。有研究表明,“字符为5 000字左右的阅读率为区间57%—66%,而字符为9 500字左右的阅读率仅为5%。”^[9]本文对提供异地注册服务的部分数字图书馆隐私协议字数进行了统计。其中,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提供的《在线实名注册使用协议》为4 566字,中国知网提供的《中国知网使用协议》为7 664字,郑州教育数字图书馆提供的《郑州教育信息网络服务使用协议》为7 071字。这意味着相当比例的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对数字图书馆隐私协议阅读率可能低于50%,低阅读率导向的必然结局是更低的知情率。

2.2 同意环节:同意验证性差与非理性自愿

同意是未成年读者监护人知情同意权落实的关键要素,同意有效的判断标准主要是同意可验证性与理性自愿。然而,这两项标准的实践境况堪忧。

其一,监护人同意可验证性差。年龄验证是确保监护人知情同意权落实的重要举措,也是立法关注的难点问题。其他业态已通过立法方式要求从业

者履行用户年龄验证义务。比如与游戏业协会确立“网络游戏防沉迷”机制,要求网络运营商验证用户年龄信息,通过防沉迷识别限制未成年玩家游戏时长、游戏类型。据观察,游戏、金融等领域用户年龄验证义务要求严格,处罚严厉;社交媒体、交友平台、活动平台等领域要求宽松,处罚较轻。目前,立法者从侧面对电子图书服务者是否负有用户年龄验证义务进行了规定。2021年3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联合发布《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以下简称《移动应用程序规定》)第5条第35项规定,电子图书类,基本功能服务为“电子图书搜索、阅读”,无须个人信息,即可使用基本功能服务。因此,在移动电子图书服务领域,服务提供者不需要验证用户年龄,更不能强制验证用户年龄。虽然现阶段数字图书馆多以网页而非移动应用程序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该规定同样可以适用于网页化数字阅读服务。此为导致监护人同意可验证性差的原因之一。

与《移动应用程序规定》态度不同,本文主张数字图书馆应根据不同年龄,向未成年读者提供差异化、具有针对性的阅读服务^[10]。2011年,我国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未成年人发展纲要(2011—2020)》提出要面向未成年读者建立图书分类制度。2016年,《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更是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少儿阅读规律的研究和运用,探索建立中国未成年人阶梯阅读体系。”因此,获得差异化分级分类阅读服务是未成年读者的法定权利。为保障该权利,并实现未成年读者利益最大化,理应要求数字图书馆在向用户提供阅读服务时获取并验证用户年龄,对未成年读者还应该追加要求其监护人提供个人信息以验证监护关系。然而,应注意的是,即使现阶段法律明确要求数字图书馆在提供服务时有获取、验证读者年龄的义务,监护人同意可验证性差问题也难以避免。一方面,“隐私政策等文件规定了未成年人保护的内容,但网络运营者往往被动依赖于用户主动提供的注册信息来识别其年龄,后续使用过程中也不会采用其他手段来验证用户的真实年龄,使得针对未成年人的身份识别机制形同虚设。”^[11]另一方面,读者身份信息均由读者自主填写,在纯线上注册、登录并使用服务的过程中,数字图书馆如果不能与公安身份识别系统贯通,或者不能采用面部

识别等新型技术方式,将难以验证读者年龄与同意者身份。未成年读者极可能谎报年龄或谎称其本人是监护人作出同意。更有甚者,部分个人信息自我保护素养较差的监护人可能会协助未成年读者谎报年龄。

其二,监护人同意非理性自愿。未成年读者监护人知情同意权有选择进入(opt-in)与选择退出(opt-out)两种操作模式。与选择进入相比,选择退出模式具有削弱信息主体个人信息控制权、减少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监管风险及提高个人信息采集效率的复合功能。这些功能与信息处理者的利益相匹配。因而,选择退出模式已成为包括数字图书馆在内的信息处理者的通常操作。例如,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的《在线实名注册使用协议》即规定,只要读者点击立即注册即表明对协议内容作出概括性授权,如果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对协议任一条款持反对态度,不点击立即注册,未成年读者就不能享受阅读服务。此种境况下,由于数字图书馆与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之间存在地位势差,两者不存在商谈空间,由此形成“柠檬均衡效应”^[12],未成年读者监护人将在充分了解数字图书馆所可能带来不利的情况下,轻率的、非自愿的作出同意。

此外,理查德·塞勒和卡斯·桑斯坦教授提出,几乎所有人在所有时间作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或者至少比别人作出的选择更好的假设都是错误的,“当人们感到掌控局面时,他们更愿意承担风险,并认为这些风险不那么严重。”^[13]此结论较为合理。大数据时代,读者个人信息安全风险具有持续性、积累性与不可预测性,读者个人信息安全问题随时可能爆发,且随着时间推移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问题不断升高,这些问题均是未成年读者及其监护人在作出概括性授权同意时难以预见的^[14]。例如,在数字图书馆“二次-N次”使用未成年读者信息的过程中,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对数字图书馆的“二次-N次”信息使用行为不知情,也并不了解“二次-N次”使用过程中存在的衍生个人信息安全风险,此外,有些个人信息安全风险,数字图书馆本身也无法掌握的。数字图书馆收集、存储、处理与传输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肯定会依靠自动化算法,算法则多由外包公司设计并运行,数字图书馆工作人员对算法具体内容与技术风险、技术偏见并不了解。因此,“算法

黑箱”会加剧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授权结果不可预测性。因而,此种未成年读者监护人基于“自我理性假设”盲目作出的概括性授权同意行为本身即征表了监护人同意非理性问题。

总之,监护人知情同意权在数字图书馆信息法治领域的适用境况堪忧,在立法尚未解决相关问题前,宜思考如何适用法律才能解决相关问题。

3 解决路径

3.1 知情环节:实质告知与持续告知

如前所述,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存在知情环节告知义务与知情权利失衡问题,表象是形式(格式)告知,本质是优势方权利地位滥用。欲解决该问题,需重点在数字图书馆与未成年读者及其监护人权力势差弥合方面作出努力。目前,学界提出两种权力地位势差问题解决方案:一是放弃修正势差,将规制重点放在信息收集后的使用行为;二是承认势差,并通过非对称赋权,缩减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的力量差^[15]。两种观点各有所长,可结合两者优势,分两步解决数字图书馆与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间权力势差问题:第一步对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进行非对称赋权,让数字图书馆在合理的范围内承担更多义务。比如,要求数字图书馆严格贯彻实质告知与履行持续告知义务;第二步即规制数字图书馆的信息使用行为。此步骤同样是未成年读者信息保护的重要问题,但与本文主题关联有限,留待它文做细致分析。

其一,实质告知:提供专门与多版本隐私服务协议。通过访问国家图书馆少儿馆等十八家少儿数字图书馆网站可知,多数少儿数字图书馆未向未成年读者提供隐私服务协议,未“在首页及子页面中标示个人信息协议文本。仅部分图书馆在账号注册环节简要提及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但过于概要。”^[16]然而,从读者信息安全合规角度考虑,本文建议数字图书馆均应主动提供便捷可查的隐私服务协议,尤其是需要提供专门版本未成年读者隐私服务协议,或者在普通隐私服务协议中增设未成年读者保护章节。目前看,未成年读者信息隐私协议在公益性质的阅读网站发展较慢,在营利性阅读网站发展较快,规则也较为完善。营利性阅读网站提供的相关隐私协议

文本可以成为赋能数字图书馆未成年读者信息隐私协议的外部驱动。比如,《微信读书隐私政策》共七节,第四节即为“我们如何保护个人信息”,第六节为“我们如何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为方便未成年用户查看隐私信息,在第六节中插入“未成年隐私保护声明链接”。此种将普通版本隐私服务协议与专门未成年用户隐私服务协议相区分,并明确未成年读者信息权益优先性的做法,可较好地保障未成年读者的阅读权益与个人信息权益。

“徒法不足以自行”,规则需要被妥善理解与良好执行才能发挥效用。因此,数字图书馆还应从告知与知情等两个侧面着力提升未成年读者隐私服务协议可读性,保证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读的到”“读得懂”。首先,针对隐私服务协议内容冗长、重点不显、专业词汇多、含义模糊、修改频繁等问题^[17],数字图书馆有必要对隐私服务协议进行简繁处理,既要向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提供完整版本的隐私服务协议,供掌握专业知识的读者及监护人、执法部门工作人员、专业法律服务工作人员等第三方工作人员阅读;简化版本的隐私服务协议应重点关注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预设其知识有限)的理解能力,采用语音版本、视频版本、动画版本等多种不同形式呈现隐私服务协议。简繁两种文本均应以单独弹窗的形式出现在数字图书馆置顶页面,减少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的寻找难度。总之,数字图书馆应自觉、主动地解决现有隐私服务协议格式化气息浓厚、文本可读性弱、读者阅读负担重等问题,保障隐私服务协议的“易得”“易读”“简明”“规范”“同步”的要求,实现用户与隐私服务协议的友好交互。

其二,数字图书馆应履行法定持续信息告知义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如果个人信息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处理信息种类与保存期限等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将变更部分告知个人。然而,部分数字图书馆非但不履行首次告知义务,反而还会在隐私服务协议中不当免除自身持续信息告知义务。对此,数字图书馆应积极开拓信息告知渠道,以保障持续信息告知义务得到履行。一方面,单次登录强制告知。即未成年读者登录网站时,数字图书馆应在醒目界面提醒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阅读隐私服务协议,并提供便捷的条款咨询通道。同时,在技术方面应要

求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必须点击阅读,否则不允许进入到下一操作界面。此告知方式在互联网金融服务网站较为常见,不存在实操层面的技术障碍;另一方面,条款改变即时告知。数字图书馆如果改变隐私服务协议条款,应以醒目方式、简洁内容直接即时推送到服务页面,并要求用户输入手机号码等足以验证同意者为监护人时才可以继续为其提供数字阅读服务。总之,“持续披露和动态同意可能带来成本增加的疑虑,不过,通过高科技手段,成本可以被大大降低,困难可能被想象夸大了。便利的、对使用者友好型的交流平台”^[18],是消解未成年读者及其监护人知情同意权适用问题的技术性化解方案。

3.2 同意环节:动态撤回与集约认证

解决同意环节问题的创新性举措包括:其一,尊重动态撤回权。部分数字图书馆提供的格式条款,从表面看尊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5条等款项明文规定的同意撤回权,但其本质上是剥夺了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权。对此,本文建议数字图书馆在提供隐私服务协议时应尊重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的两种具体权利:一是,具体同意权,即监护人应对未成年读者作出具体、针对性的同意;二是,动态撤回权,即监护人作出的同意“从整齐划一的同意向分层的同意转变,从一次性同意向可更新的动态同意转变”^[18]。传统知情同意模型存在致命问题,仅允许信息主体在信息收集的阶段作出同意表示。然而,信息主体在信息收集阶段难以明确决定行为对未来造成的可能影响。比如,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在给予数字图书馆处理未成年读者信息的同意授权后,未成年读者可能会接受来自于数字图书馆的商业性或营利性弹窗的滋扰。此时,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完全可以行使同意撤回权,要求数字图书馆暂停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可以说,动态撤回权是对监护人同意非理性自愿问题的回应,赋予监护人修正同意决定的机会,保障监护人对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使用全过程的处分权利。须注意,除撤回同意权,立法层面还赋予个人信息主体信息删除权。“撤回权+删除权”的综合性制度设计“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尤为重要,直接决定了特定信息的生命周期是否能够被公民自决,避免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有始无终。”^[11]

其二,打破数据孤岛,实现集约验证。目前,域

外与我国均将同意者身份年龄认证工作交由信息处理者承担。比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第8条第2款要求信息处理者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对同意者身份作“合理努力地验证。”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COPPA)则是提出信息处理者需要在收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前取得“可验证的父母同意”。我国虽未明确进行立法,但实务自发形成信息处理者自主认证模式。在数字图书馆领域表现为,数字图书馆具有是否验证同意者身份,如何验证同意者身份的自我决定权。然而,如果不经由统一立法的方式强调图书馆的身份验证义务,数字图书馆将基于自利性考虑选择减少运营负担,消极对待同意者身份验证问题。有学者在考察18家少儿图书馆读者办证年龄规定后就发现,各图书馆办证年龄上线规定不同,12周岁以下至18周岁以下不等,也存在无年龄限制、监护人与未成年人管理混同等问题^[19-20]。然而,监护人知情同意权是不满14周岁未成年读者信息安全的保护阀,如果不能对同意者年龄进行验证,则该权利必将成为“空中楼阁”。

为解决本问题,数字图书馆应继续加强身份验证工作。一方面,应从立法角度明确包括数字图书馆在内图书馆的验证义务;另一方面,应从技术角度打破数据孤岛,实现同意者身份集约认证。根据《公共图书馆法》第5条规定,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因此,集约认证的可行方案之一是由文化主管部门主导身份验证工作。存在隐忧的是,文化主管部门受限财力与技术,常不具备海量敏感信息保护与信息泄露应急处置能力。因此,如果将海量读者敏感数据汇集至文化主管部门网站,可能既会使文化主管部门超出必要范围存留读者敏感信息,又会使读者信息安全时刻处于“风险的火山口上”。因此,数字图书馆行业不妨借鉴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EDPB)的做法,引入可信赖的第三方作为集约认证主体。比如,可将数字图书馆与公安部门身份验证系统贯通,并由公安部门主导、网监部门参与,在原公安身份验证系统基础

上增加监护关系身份识别标签,构建“未成年身份识别验证平台”。此举可解决各数字图书馆随意设定获取、处理未成年读者及其监护人个人信息的问题。须明确,验证途径单一不影响验证手段多元。数字图书馆可以利用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新型身份识别技术,对同意者身份进行识别认证。域外也提倡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于同意者身份验证领域。比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在2015年即曾将“人脸照片匹配验证识别”认证为“可验证的父母同意”方法。我国公民在公安系统办理身份证件时被要求预留指纹与人像信息,因此,透过指纹与人脸等方式验证父母脸部特征实现对同意者身份的验证具备实操基础。事实上,我国部分数字图书馆已自发贯通图书服务系统与公安验证系统。“广州图书馆即对接公安系统的身份证信息库,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实现注册人身份真实性和有效性判定,确保注册人身份信息真实有效。”^[21]

4 结语

大数据时代,公共图书馆固然要善用技术,推进公共阅读服务“脱实向虚”,做好“虚拟服务”,但服务形态演变不应侵犯读者权益,滥用公权优势限制未成年读者及监护人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必须予以制止。否则,日后只会使立法追赶陷入愈加滞后与被动的境地。目前来看,数字图书馆可以从知情与同意等两个侧面采取实质告知、持续告知、动态撤回与集约认证方式解决现有监护人知情同意权适用落空问题,并通过解决该问题推动对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的全盘综治保护。最后,须提醒,数字图书馆应主动承担孤儿与“事实孤儿”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工作。据民政部统计,至2019年1月,我国共有34.3万孤儿^[22]。此外,社会上还有大量父母健在,但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孤儿”^[23]。为保障这部分未成年读者的个人信息权益,数字图书馆可以考虑设置专人、配置专款在数字图书馆服务领域内专门负责从事孤儿与“事实孤儿”的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扮演数字阅读服务领域“孤儿监护人”的角色。

参考文献:

[1] 金武刚.公共图书馆服务:从行业共识到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解读[J].图书馆杂

- 志,2017(11):15-19.
- [2] 朱庆育.“立法论”与“解释论”的中间时刻[J].云南社会科学,2019(5):94.
- [3] 傅郁林.法学研究方法由立法论向解释论的转型[J].中外法学,2013(1):169.
- [4] 林凯,张建肖.知情同意权的功能失灵与应对——兼评《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相关规定[J].中国应用法学,2020(2):162-186.
- [5] 夏梦颖,徐家林.算法型信息分发的隐私风险及法律对策[J].传媒观察,2020(10):14-18.
- [6] 傅宏宇.论网络环境下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50-56.
- [7] 张新宝.个人信息收集:告知同意原则适用的限制[J].比较法研究,2019(6):1-20.
- [8] 国家数字图书馆在线实名注册使用协议[EB/OL].[2023-04-19].<https://sso1.nlc.cn/sso/css/login/protocol.html>.
- [9] 朱侯,张明鑫,路永和.社交媒体用户隐私政策阅读意愿实证研究[J].情报学报,2018(4):362-371.
- [10] 王欢.图书馆推进未成年人分级阅读服务新思路:以黑龙江省图书馆为例[J].河北科技图苑,2015(2):82-83,86.
- [11] 蔡一博,吴涛.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与制度应对:以“替代决定”的监护人同意机制完善为视角[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2):126-133.
- [12] 丁晓强.个人数据保护中同意规则的“扬”与“抑”——卡-梅框架视域下的规则配置研究[J].法学评论(双月刊),2020(4):130-143.
- [13] SOLOVE D J.Introduction: Privacy Self-Management and the Consent Dilemma[J].Harvard Law Review,2013(7):1887.
- [14] 吴泓.信赖理念下的个人信息使用与保护[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1):22-36.
- [15] 陈峰,王利荣.个人信息“知情同意权”的功能检视与完善进路[J].广西社会科学,2021(8):106-111.
- [16] 李雪健.儿童读者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4):13-20.
- [17] 李伟,蒋文杰.隐私协议用户知情同意的认定[J].中国检察官,2021(1):3-15.
- [18] 田野.大数据时代知情同意原则的困境与出路:以生物资料库的个人信息保护为例[J].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18(6):111-136.
- [19] 万方.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同意”与“同意撤回”[J].中国法学,2021(1):167-188.
- [20] 孙益武.儿童个人信息保护是伪命题还是真难题——兼评《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J].青少年犯罪问题,2020(2):90-97.
- [21] 覃毅.广州图书馆微信小程序上线:刷脸认证1分钟办证[EB/OL].[2023-04-19].<https://www.sogou.com/link?Url=ocWV09y9H2SL9HRbkEdouvQBexdH81MoVkMbDIYfIF56Iq7zELdIP9jSFLMKeh7ETipEEExaQ94DqRgCyTB2gQ>.
- [22] 民政部.设立儿童福利司,全国范围收养登记实现零收费[EB/OL].[2023-04-19].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05190.
- [23] 张哲.事实孤儿:一个被遗忘的群体[J].方圆,2017(18):15-21.

作者简介:李紫阳,法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政府采购与合规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法治。

收稿日期:2023-04-23

本文责编:郑秀花

· 专题 聚焦未成年人阅读 ·

公共图书馆智障儿童阅读服务策略探析*

——以嘉兴市图书馆为例

薛路 俞亚军

(嘉兴市图书馆 浙江嘉兴 314001)

摘要: 智障儿童因其生理、心理原因,从小就与同龄的普通孩子在知识认知、信息素养、文化涵养等方面拉开了巨大差距。嘉兴市图书馆与嘉兴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展馆校合作,依据智障儿童IEP系统测评结果,实施“星光彩虹”智障儿童阅读服务项目。经过多年探索,项目形成了智障儿童“一体三式多元”引导型阅读模式,积累了智障儿童“馆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创新研究经验。此模式具有可复制性,可供公共图书馆参考借鉴。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智障儿童;阅读服务

中图分类号: G258.2; G252.17

文献标识码: A

Exploring Strategies for Reading Services for Children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n Public Libraries: A Case Study of Jiaxing City Library

Abstract Children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often face significant disparities in knowledge acquisition,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cultural enrichment due to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Jiaxing City Library has collaborated with local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s to establish a collaborative initiative, the "Starlight Rainbow" reading service project, catering to children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based on their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IEP) assessments. Through years of exploration, this project has evolved into a "One Core, Three Styles, Multiple Approaches" guided reading model for children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t has also accumulated innovative research experiences in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among "Library-School-Community" entities. This model exhibits replicability and offers insights for public libraries seeking to enhance their services for children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children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reading service

1 引言

目前,全球74亿人口中约有15%的人具有不同类别、不同程度的残障^[1]。截至2022年,中国各类残疾人总数已达8 502万人,6—14岁学龄残疾儿童为246万人,占全部残疾人口的2.96%。残疾儿童中,

有视力残疾13万人、言语残疾17万人、多重残疾75万人、智力残疾76万人。有63.19%的残疾儿童正在普通学校或特殊教育学校接受义务教育^[2]。全球权威性智力障碍研究学会——美国智力落后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n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AAIDD)自1983年起,对“智障”概念进行了不断修订。我国主要沿用1983年第8版的提法,

* 本文系2021年度浙江省图书馆学会课题“公共图书馆培智儿童阅读服务探究——以嘉兴市图书馆为例”(项目编号:Ztx2021B-8)的研究成果之一。

认为智力障碍是指一般功能明显低于平均水平,同时伴有适应行为的障碍,并发生在发育时期(18周岁前)^[3]。2002年以来,理论体系更强调要从智能、适应能力、参与互动与社会角色、身心健康、相关背景五个方面对智障群体给予支持^[4]。换言之,利于智障儿童融入社会、参与互动的服务变得尤为重要。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指出,正常和病理之间的边界,对于特定类型的行为而言,存在跨文化的不同;文化的含义、习惯和传统也可以造成偏见或在社会和家庭中支持对精神障碍的应对^[5]。因此,公共图书馆作为智障儿童社会支持系统的组成部分,需从社会、家庭、个体等不同维度进行评估,以期对智障儿童提供科学有效的精准化服务。

2 项目背景

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2年更新版《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指出,必须向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利用其正常的服务和资料的人,如语言上处于少数的人、残障人士、缺乏数字化或计算机技能的人、缺乏读写能力的人或住院病人及在押犯人等提供特殊的服务和资料^[6]。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提出:应确保残疾儿童能有效地获得和接受教育、培训、康复、就业等机会,其方式应有助于该儿童尽可能充分地参与社会,实现个人发展,包括其文化和精神方面的发展^[7]。《“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提出:丰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公共文化供给,保障其基本文化权益^[8]。《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指出:保障残疾人享有平等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积极创造条件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9]。《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指出:公共图书馆应当考虑残疾人等群体特点,积极创造条件,提供适合其需要的文献信息、无障碍设施和服务^[10]。2022年5月5日,世界上第一部版权领域的人权条约《马拉喀什条约》对中国生效,这意味着残疾人社会融合和文化参与、平等获取文化和教育的权利将进一步得到保障。

2023年,笔者以专业检索式“SU='智障儿童' * '公共图书馆'”在中国知网中文总库检索到3篇研究

文章,分别是王嘉陵介绍了台湾地区公共图书馆智障儿童玩具图书馆建设情况^[11],张希以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创新智障儿童服务模式为例提出启示^[12],陈玉婷、束漫对香港地区41所智障儿童学校图书馆服务进行了调查研究^[13]。以专业检索式“SU='智障儿童' * '阅读'”共检索到122篇文章,其中特殊教育领域的文章占比87.77%。公共图书馆领域1篇,为梁祥珍探讨了公共图书馆智障少儿阅读辅导工作的实践^[14]。由此可见,智障儿童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服务群体之一。我国公共图书馆一直致力于思考、实践与研究面向智障儿童的精准服务。在此背景下,嘉兴市图书馆联合嘉兴市特殊教育学校(以下简称“市特校”),立足公益平等、互助共享的宗旨,通过开展馆校融合“星彩虹”系列阅读服务,积极寻求对智障儿童的可持续社会支持路径,赋能全民精神共富。

3 项目实践

3.1 前期调研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和美国智力落后协会的分级标准,我国按智力商数(Intelligence Quotient, IQ)及社会适应性行为程度将智力障碍划分为四个等级。参与“星彩虹”项目的智障儿童处于智力残疾二级(重度, IQ小于34)和三级(中度, IQ处于35—49之间)或肢体残疾一级(脑瘫伴随智力障碍),存在行为、学习、情感、社交等多种障碍。2022年5月,嘉兴市图书馆对8至17周岁的273名智障儿童家长(包含海宁市培智学校的37位学生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

由统计结果可知,在校智障儿童在阅读目的上,技能拓展、知识学习需求占比较高。在阅读方式上,仍以教师指导、亲友口述等传统方式为主,对新技术、新媒体等数字阅读方式了解甚少。智障儿童尚存缺乏专业指导、主观性弱等阅读难点。公共图书馆基于使命和义务,亟需对智障儿童给予公共文化服务视阈下的社会支持。

3.2 现存问题

从学校角度看,市特校培智部现有学生236人,占全校学生总人数的77.89%。项目组通过对12户一至九年级智障儿童家庭的访谈了解到,经过学校培智生活语文等课程的系统教学,孩子的阅读能力和

表1 嘉兴地区在校智障儿童阅读情况

排序	调研项目	选项(多选)	答题人数/人	占比/%
1	阅读目的	技能拓展	189	69.23
2		知识学习	154	56.41
3		课余娱乐	78	28.57
4		修身养性	17	6.23
1	阅读方式	看电视	110	40.29
2		学校老师陪伴与指导	109	39.92
3		家人、朋友陪伴与指导	86	31.50
4		电子书	49	17.95
5		纸质书	25	9.16
6		报刊	12	4.40
1	阅读难点	缺乏专业指导与精准服务	100	36.63
2		主观意愿薄弱	94	34.43
3		父母陪伴较少	82	30.03
4		信息素养较低	35	12.82
5		学校教学内容局限	29	10.62
6		社会关注度不够	19	6.96

注:调研共收集到273个样本有效值

表达能力均有所提升,但精准供给的智障儿童阅读资源仍然匮乏。其次,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其对社会交往存在一定需求,特别是对外界的好奇心也日益增长。根据项目组对10户智障一年级新生家庭的访谈得知,二孩家庭有5户,且二孩均为健康儿童。出于安全考虑和忙于生活,家长无法时刻陪伴智障儿童,为其提供开阔眼界、培养社交能力的平台与资源。此外,笔者在对部分任课教师的访谈中了解到,智障学生采用通校管理办法,即每日在校时间为早上八点至下午三点半。智障儿童普遍缺乏课余文化生活,精神、心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从公共图书馆角度看,面向普通少年儿童群体的阅读推广策略并不能直接迁移到智障儿童之中。例如,在普通儿童中广泛开展的分级阅读,对智障儿童则难以实施。公共图书馆应根据智障儿童的残疾类别、残障等级等信息,制定全新的分级体系。其次,公共图书馆无障碍空间倾向于硬件建设,在馆藏文献、数字阅读、信息素养提升等软服务上缺乏精准完善的实践。最后,社会大众对智障儿童的了解缺少科学性,偏见普遍存在。公益性残障服务机构对智障儿童容易产生知难而退的规避心态,例如,服务集中于自闭症日等特殊节日开展;活动拘泥于送福利、献爱心等轻内容重形式的做法。这些举措反而使智障儿

童产生心理落差。

3.3 创新做法与成效

嘉兴市图书馆与市特校开展馆校合作,依据学校最新一年针对智障学生的IEP(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系统测评结果,实施“星光彩虹”阅读服务项目,为智障儿童突破信息屏障、提高生活质量、融入现代社会助力赋能。经过图书馆与学校的多年探索,项目形成了智障儿童“一体三式多元”引导型阅读模式。

3.3.1 精准化供给:创建“一体”服务基础

嘉兴市图书馆从硬件、软件两大方向着手,打好智障儿童专门空间、文献资源、专业人员三者“馆校融合”的服务基础。

一是空间一体,阵地共建。嘉兴市图书馆在市本级已建成300多家图书流通站,在分馆管理方面经验丰富。近年来,图书馆与普校的合作已在城乡铺开,馆校合作模式推动了图书馆的各项社会效益。在大众阅读推广日趋成熟的基础上,嘉兴市图书馆协助市特校建立学校图书馆,同时也是嘉兴市图书馆在市特校的流通站。空间位于特教学校培智部教学楼内,定期对师生开放。入馆无需预约和刷卡等操作。教学楼设置箱式电梯、坡道等无障碍设施,方便智障儿童无障碍出入。馆内配备六台电脑,并接入嘉兴数字图书馆,为智障儿童获取现代化的阅读体验创设绿色环境。

二是资源一体,馆藏共享。嘉兴市图书馆通过办理集体借阅证的方式,为市特校图书馆提供500册馆藏图书,并按学校需求随时更换。结合智障儿童的阅读能力、兴趣点及教师建议,馆员精选了低幼绘本、注音童书、图画书、翻翻书、触摸书、漫画等种类图书设立荐书专架。嘉兴市图书馆电子馆藏对学校免费共享,保障智障儿童享有平等的数字阅读权利。嘉兴市图书馆定期对学校采购图书和调整馆藏予以指导和建议。学校引入嘉兴市图书馆原创开发的少儿版“悦心听读本”,为智障儿童进行听读言语训练提供支持,实现纸电一体的全新阅读体验。

三是人员一体,效益共赢。项目团队由嘉兴市图书馆馆员和市特校教师共同组成,双方各由一人负责讯息对接,按需指派专业人员参与活动和开展研究。当前,已有嘉兴市图书馆文献借阅、科情服务、馆外流通服务、新技术体验服务等馆员,学校语文、

数学、音乐、美术(陶艺)等教师参与到项目中来,携手提高服务内容多元化和专业化水准。在馆校核心团队的基础上,双方积极招募志愿者。嘉兴学院大学生、特殊儿童社工组织作为志愿者服务的重要力量,积极参与到了绘本讲读、入馆参观等线下活动之中。

3.3.2 沉浸式伴读:打通“三式”阅读情境

智障儿童因大脑神经受损、构音器官损伤等生理缺陷,无法习得与普通孩子同等的阅读理解和言语沟通能力,信息获取通道受阻。嘉兴市图书馆打造“三式”阅读情境(见图1),充分调动智障儿童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参与阅读过程,产生了良好的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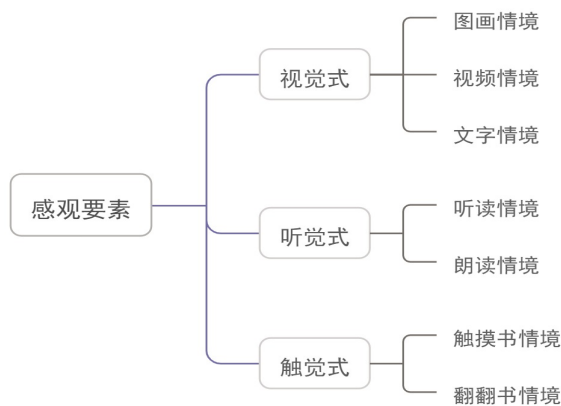


图1 智障儿童“三式”阅读情境模型

“视觉式”阅读情境是符合大众阅读习惯的传统阅读情境,以文字阅读为主。但对于智障儿童而言,图画、视频等形式更能吸引其注意力。利用视觉提示加深印象是智障儿童进入文字世界的敲门砖。以绘本《我的情绪小怪兽》讲读活动为例,将孩子喜怒哀乐等各种情绪用不同颜色和表情予以替代。主讲馆员引导智障儿童观察每种情绪小怪兽的区别,直观地感受情绪表达,从而学会认识情绪、控制情绪。此外,绘本讲读结合新媒体短视频资源,增强人与文本之间的共鸣,降低智障儿童直接进行文字阅读的难度,激发其阅读兴趣。

“听觉式”阅读情境旨在唤起智障儿童的联想能力。嘉兴市图书馆于2022年推出“听阅一体”体系,将数字资源推广到弱势群体身边。其中少儿版“悦心听读本”面向0至6周岁婴幼儿开发,亦适用于市特校全龄段的智障儿童。灵动可爱的小狗外形支持无线使用,方便携带。参与活动的每位儿童均能积

极主动地要求试听内置的故事、古诗词、儿歌资源。听读本从听觉入手,为智障儿童打开了一个阅读新世界。再者,以音乐绘本《多杰》为例,馆员联合音乐教师,用“音乐+阅读”的全新视角设置阅读情境。活动过程分为“听—唱—读”三部曲,调动智障儿童感观系统,引导孩子感知旋律、体会故事内涵。据笔者观察,现场儿童不仅能沉浸于旋律当中,更是能够结合故事内容,精确表达“好听”“感动”等情感体验,疗愈成效显著。音乐绘本的演绎注重互动性。亲子合唱、独唱等表演环节挖掘了部分智障儿童在音乐与表演领域的天分。此外,图书馆阅读活动与学校“唐诗考级”项目结合,设立古诗词朗诵小舞台,给予智障儿童平等展示自我的机会与平台。

“触觉式”阅读情境强调身体与实物的触碰,促使智障儿童协同大脑与肢体获取信息。首先是触摸书、翻翻书、3D立体书阅读情境设置。教育家蒙台梭利认为,感觉训练与智力培养密切相关。在对智障儿童进行感官训练时,应该把感觉和语言联系起来^[15]。以触摸书《小熊波比》讲读活动为例,全书采用大开本异形设计,共有20多种大面积触摸材料,包括动物毛发和植物组织纹理等。智障儿童以手指触摸结合视觉,体会光滑、柔软、粗糙等感知觉,在探索内容的过程中,通过具象感受理解抽象概念。其次是生活情境设置。在“触觉式”阅读情境中,融合生活手工、实物涂鸦、拼图等操作环节。活动由书本知识导向生活技能提升,为智障儿童融入社会作好铺垫。再次是新技术产品体验。例如,嘉兴市图书馆将可移动的点读笔、简易编程积木活动送入学校;馆校合作带领智障儿童参观全国首个元宇宙阅读实验基地,感受声光电效果和触摸式产品,引导智障儿童体验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乐趣。

3.3.3 社会性互动:创设“多元”体验活动

社会性互动重在引导智障儿童获得技能性信息。培智教学以部编版教材命名,如“生活语文”“生活数学”“生活体育”等,重点关注学生的生活体验。项目组深入研究培智新课标,以培养生活技能、促进社会融入为立足点策划活动。

一是教师及家长分批带领智障儿童走进嘉兴市图书馆参观。智障儿童在接触社会的同时,也展现出了探索各大功能区的好奇心和学习自信心。家长也获得了家庭阅读和亲子教育的新方式。二是图书分

馆主题活动。嘉北街道分馆距市特校仅数百米路程。学校利用班会课、午休等时间,带领智障儿童定期前往分馆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阅读。三是在活动时增设互助环节。同一小组的若干名智障儿童合作完成一项任务,如手工制作、拼图、涂鸦等,促进智障儿童之间的社会交往,提升其表达交流能力。四是地方文化游学。学校根据阅读活动参与情况对智障儿童进行评估。作为奖励,表现优异者即可参与地方文化游学活动。智障儿童以“旅游”的方式近距离了解家乡,并尝试乘坐公交车、打卡景点,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更近一步。

4 策略探析

4.1 保障基础服务,夯实“空间+”阅读共同体

一是依托总分馆建设智障儿童阅读“空间共同体”。截至2020年底,全国已有2 397个县(市、区)建立图书馆总分馆制^[16]。总馆实体空间无障碍设施设备应下沉基层分馆,为城乡智障儿童阅读服务奠定阵地基础。二是推进文献资源精准化,建设智障儿童“资源共享体”。公共图书馆有义务创新研究智障儿童分级阅读体系,设立总分馆荐书专架,方便城乡智障儿童借阅适合自身阅读能力的文献资源。三是建设智障儿童数字“体验共创体”。为了缩小智障儿童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数字鸿沟、文化鸿沟,公共图书馆应为智障儿童提供与普通儿童同等的享受新技术体验的机会,指导其了解和使用数字资源,学会正确鉴别信息真伪,提升其信息素养。

4.2 拓展外延服务,构建“阅读+”社会支持系统

公共图书馆应联合家庭、学校、残联、社区、志愿者服务站等团体及机构,创建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系统。例如,图书馆联合智障儿童家庭,以建立“家庭书架”、举办“家长沙龙”阅读指导活动为切入口,为智障儿童家庭阅读助力。在亲子阅读的基础上,提升智障儿童家庭对其文化需求和心理发展的关注,提高智障儿童的生活质量。再如,图书馆联合街道(社区),推广情绪引导类绘本、技能提升类图书、亲子阅读等文献资源,建立社区互助联盟,为智障儿童就近提供生活化场景技能训练和社交平台。第三,机构之间加强跨界合作,积极倡导大学生、康复医学医生、特教教师等专业人士加入智障儿童阅读推广队

伍,以志愿者活动形式充实服务内容,保障团队质量,推动服务持续开展。

4.3 加强业务创新,提升“服务+”专业研究能力

第一,将“具身认知”理论应用于智障儿童阅读服务。“具身认知”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强调身体与心智之间的相互作用。该理论认为:“认知既是具身的又是嵌入的,大脑嵌入身体、身体嵌入环境,它们构成了一体的系统。”^[17]公共图书馆应摒弃传统机械式阅读形式,“活化”静态文本,帮助智障儿童从切身体验中感受语言文字的内涵,形成开放型阅读方式。第二,借助直觉思维,挖掘智障儿童“内隐学习力”。“内隐学习”最早由Reber于1967年提出^[18],即个体无意识获得刺激环境中复杂学习的过程。研究者将其拓展到了特殊群体当中,其中包括自闭症、瘫痪、智力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脑损伤等^[19]。多元化的阅读形式能够刺激智障儿童的感观,强化其认知,助其将信息内化。第三,在馆校合作框架下制定馆员与教师的业务培训计划,促进双向交流与进步。为智障儿童提供阅读服务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工程,亟需以继续教育支撑专业化服务,以相对固定的团队进行跟踪研究,创新和优化实践。

4.4 唤起人文关怀,打造“关爱+”协同育人之城

一方面,公共图书馆在智障儿童阅读服务中渗透生命教育理念是重中之重。著名教育家叶澜提出,把老师讲课的时间减到一节课的三分之一,留下大量时间让学生看书、朗读和交流^[20]。重视生命及实践是阅读与教育的共通之处。阅读亦是激发智障儿童生命活力,传递珍惜生命、自强自爱理念的载体。另一方面,当前已有不少单位将目光转向特殊儿童,给予物质和精神的关爱。例如,嘉兴市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智障儿童教育体系已较为成熟;嘉兴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举办“点亮心灯”智障儿童阅读系列活动;中山大学三余社送康复性游戏志愿者活动到智障儿童身边^[21],等等。在“馆校社”的群策群力下,面向智障儿童的服务也将日益彰显人性温度和人文关怀,切实推进全民阅读差异化、精准化发展。

5 结语

保障残疾人享有公平的文化权益,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以“小众特惠”促“大众普惠”是全民精神共富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公共图书馆开展精准化阅读服务是夯实智障儿童文化生活终身可持续进行的基础。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在其著作《静默之身》中提出：“残障由社会定义，由文化赋予意义，这是一种社会病。对残障的研究是一扇独特的窗口，

从中可以看到个人与社会的斗争，因为残疾人不是一个特殊群体，而是人类状况的隐喻。”^[22]本文倡导公共图书馆加强与特殊教育学校等机构的合作，在“馆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下撬动更多社会资源为智障儿童获取有效信息提供帮助，为其心理健全发展助力、为其人生价值观形成赋能、为其走向社会护航。

参考文献：

- [1] 卜佳俊,戴连君,唐李真.无障碍与信息技术[M].北京: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2-3.
- [2] 中国残联统计的数据[EB/OL].[2022-12-12].https://www.sohu.com/a/616550681_121124023.
- [3] 刘春玲,咎飞.智力落后定义的演变及其启示[J].中国临床康复,2004(3):530.
- [4] 许家成.“智力障碍”定义的新演化[J].中国特殊教育,2003(4):20-24.
- [5]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3.
- [6] 公共图书馆宣言[EB/OL].[2022-09-03].<https://repository.ifla.org/bitstream/123456789/2081/1/ifla-unesco-public-library-manifesto-2022-zh.pdf>.
- [7] 儿童权利公约[EB/OL].[2023-04-26].<https://www.unicef.org/zh/>.
- [8]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EB/OL].[2022-08-16].http://www.gov.cn/zhengce/2022-08/16/content_5705612.htm.
- [9] 残疾人保障法[EB/OL].[2008-07-01].http://www.gov.cn/guoching/2021-10/29/content_5647618.htm.
- [10] 公共图书馆法[EB/OL].[2017-11-04].<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711/86402870d45a4b2388e6b5a86a187bb8.shtml>.
- [11] 王嘉陵.台湾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服务[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2(10):84.
- [12] 张希.公共图书馆智障儿童群体服务模式的实践与思考[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5(2):75-77.
- [13] 陈玉婷,束漫.我国香港智障儿童学校图书馆服务[J].图书馆论坛,2018(3):11-15.
- [14] 梁祥珍.智障少年儿童阅读辅导工作的探索与实践[J].图书馆学刊,2011(6):104.
- [15] 王强虹.试论蒙台梭利的弱智儿童教育理论与实践[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2):43.
- [16] 全国已建成超2万个图书馆分馆[EB/OL].[2021-04-23].http://www.gov.cn/xinwen/2021-04/23/content_5601730.html.
- [17] 叶浩生.具身认知:原理与应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9.
- [18] REBER A S.Implicit learning of artificial grammars[J].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1967,6(6):855-863.
- [19] 袁玉萍.自闭症儿童动作序列的内隐学习及干预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22.
- [20] 潘晨聪,叶澜.用“新基础”点亮生命,激活成长自觉[J].上海教育,2023(1):36-39.
- [21] 爱让未来无障碍:关爱智障儿童[EB/OL].[2012-10-30].http://www.zgzyz.org.cn/content/2012-10/30/content_7237208.htm.
- [22] 罗伯特.静默之身[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5.

作者简介: 薛路,嘉兴市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 俞亚军,嘉兴市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

收稿日期: 2023-05-08

本文责编: 孙晓清

· 专题 聚焦未成年人阅读 ·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儿童图书馆建设的生态维度分析

蔺梦华

(佛山市顺德图书馆 广东佛山 528300)

摘要:社区儿童图书馆的建设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文章通过生态学中生态位分析,搭建理论维度、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对象维度的四维体系,并以此为依据探索我国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儿童图书馆的具体路径,分别是管理模式多样化、资源建设共享化、服务人员专业化和社会关系情感化。

关键词:社区儿童图书馆;社会力量;维度分析;生态位

中图分类号:G258.24

文献标识码:A

An Ecological Dimension Analysis of the Involvement of Social Powers in Community Children's Library Construction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hildren's libraries requires the involvement of social powers. This article utilizes the ecological niche analysis from ecology to establish a four-dimensional system consisting of theoretical dimension, temporal dimension, spatial dimension, and object dimension. Based on this system,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specific paths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powers in community children's library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se paths include diversification of management models, sharing of resource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ervice personnel, and emotionaliz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Key words community children's library; social powers; dimension analysis; ecological niche

1 引言

2010年《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儿童图书馆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公共图书馆都要开设专门的少年儿童阅览室,在乡镇、街道、社区等建设少年儿童图书馆分馆(少年儿童阅览室)”,此后,我国逐步重视儿童图书馆特别是社区儿童图书馆的建设^[1]。由于基层面临资金短缺、人手匮乏等困境,社会力量的参与无疑对社区儿童图书馆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在2022年12月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来源,选择“中文文献”为调查对象,选择“模糊检索”为匹配方式,以“社区儿童图书馆”为主题词,得到论文70篇,时间跨度从1998年到2022年;以“社区少儿图书馆”进行检索,得到论文

64篇。其内容大多为美国、芬兰、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社区图书馆的儿童服务。但是以“社区儿童图书馆*社会力量”进行检索,仅有1篇论文。由此可见,我国社会力量参与儿童图书馆建设的研究相对滞后。基于我国的行政区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对公共图书馆的定义^[2],本文研究的社区儿童图书馆是指强调公益性、社区性,服务对象主要为儿童的,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社区(村)图书馆(室)。

本文采用生态学中生态位(Niche)的概念来理解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儿童图书馆建设的行动空间和发展价值。生态位,指每个物种在共同体中的时间和所处位置及其功能关系,或与其他物种在共同体中的关联位置^[3]。在社会生态体系中,生态位概念有两个重要启发:一是要选择合适的生态位方可避免竞争乃至有效合作;二是生态位至少包括时间、空间和

对象三个维度。因此,本文从理论维度、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对象维度的四维体系对如何利用社会力量建设社区儿童图书馆进行研究。

2 理论维度

2.1 经济学搭建理论基础

经济学家汉斯曼(Henry Hangman)认为,不以利润分配为导向的非营利组织可以比营利组织更加合理地将消费者和捐赠者的资金用于公共服务。随着大众文化的兴盛和中产阶级的崛起,有效的价格区分制度被限制,捐赠作为一种自愿的价格区隔体系成为必要;而这一行为在非营利组织中更容易实现^[4]。社区儿童图书馆作为典型的非营利组织,更加容易成为捐赠或者资助的对象,实现获赠收入的最大化利用。

2.2 社会学指导理论框架

社会学家迪马济奥(Paul DiMaggio)认为近代历史中随着非营利的文化机构和商业的文化产业形成,社会上出现了高级文化和流行文化的“两分法”,在城市精英社区和相对中立地区,确定了文化机构的基本职能及其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范畴。城市上层阶级出于希望控制城市文化环境和建立“排他性”文化的愿望,促成其对于非营利组织资助,这些组织承担着社会福利和美学提升的新型公共功能^[5]。我国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应当更加重视社区儿童图书馆的基层服务效能和社会影响,指引社会力量特别是城市精英阶层对其进行导向性资助。

2.3 生态学提供指导方法

生态位是生态学中重要的一个子理论,又称为生态龛,最早由美国学者R.H.约翰逊在1910年提出,任何物种在其进化和发展过程中,都存在适合其最佳生态位,并通过和其他物种生态位的联系与交融推进彼此的有序进化^[6]。我国“全民阅读”多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社会生态系统中多种力量都参与到儿童阅读中,代表政府力量的主要有公共图书馆、教育部门、共青团和妇女联合会等,代表社会力量的主要有商业机构、社会组织、基金会、企业家以及个人等。作为公共图书馆的社区儿童图书馆只有寻找到最佳生态位,处理好和其他机构的竞合关系,才能推进相互的有序进化。

2.4 儿童权利理论提供法律保障

儿童权利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特殊人权,第一个全面阐述儿童权利和自由的《儿童权利公约》出台标志着其诞生,《儿童权利公约》指导了世界各国的儿童权利立法、司法和行政保护。我国在1991年正式参与签署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先后发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明确规定“增加社区图书馆和农村流动图书馆数量,公共图书馆设儿童阅览室或图书角。整合社区资源建设儿童活动场所,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提高运行能力,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服务”^[7]。社区儿童图书馆通过保障儿童平等阅读,为社区儿童提供分级阅读等多样化的阅读服务和指导,规范提供有保障和安全的阅读环境,为社区儿童提供读者购书建议、小读者留言等服务,充分体现了儿童权利中的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四大基本权利。

3 时间维度

对于文化机构参与到社区营造和社区治理的过程而言,不同时间节点需求不同,不同主体的贡献值也不同。目前我国传统的社区公共空间建设多由政府包办,居民在其建设过程中缺少话语权和参与感,导致居民难以产生认同感、用户粘度较低。社区儿童图书馆作为典型的社区公共空间,可以让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因此需要积极吸引以居民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尽可能参与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对于不同类型的社区儿童图书馆,社会力量的参与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1)新建型,常见于新建楼盘或新乡村、拆迁村等,建筑物多为新规划中已有的公共空间,这种类型难点主要在于管理和运营。因此社会力量的参与时间为设计和管理两个阶段。(2)改造型,常见于城市老城区的社区、城中村或者乡村,这种类型难点主要在于缺少空间,因此社会力量的参与时间早于新建型,为规划、设计、改造、管理四个阶段。例如广东佛山顺德区的“和乐图书馆”公益项目,起源于容桂街道志愿者(义务工作者)联合会看到部分老旧社区的农家书屋、电子阅览室等空间缺乏日常管理,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在与社区

居委会充分沟通后,编写详细项目书向广东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申请专项资金,用于场地改造、家具购置、图书购买和活动实施等。在项目服务定位方面,“和乐图书馆”免费服务社区的儿童和家长,日常开放时间适应学龄儿童作息,采取周六日开放制。在项目日常管理运营方面,广州满天星公益提供免费的图书馆管理系统;社区居委会以合约方式免费提供闲置场地和水电、网络等;容桂街道志愿者(义务工作者)联合会采用自愿报名方式实现人员排班。2021年在桂洲社区建设首家和乐图书馆,经过一年多的成功运作后,2023年3月携手容边社区推出第二家“和乐图书馆”,同时笔者调研了解到已有多个社区向项目方表达了合作意愿,实现了志愿者、社工、基金会和社区的深度合作,具有可复制性和推广性^[8]。

4 空间维度

空间维度关注的是如何处理与社会生态中其他主体的竞合关系,并且和其他社会机构保持特异性。我国有较多的私人儿童图书馆,例如皮卡书屋、悠贝亲子图书馆、蓝月亮儿童图书馆、蒲蒲兰绘本馆、小考拉亲子童书馆、墨盒子绘本书馆等,其特质在于性质由私人创办、位置分布在社区、资源以畅销儿童读物为主、费用采用会员制,优势在于形式灵活易于推广,缺点在于非公益性导致社会覆盖面有限。例如蒲蒲兰绘本馆,是由日本老牌儿童专业出版社白杨社(Poplar Publishing Co.,Ltd.)于2004年7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子公司,业务包括实体儿童书店和儿童早期阅读课程的策划、执行等^[9]。顺德乐从镇文化融合创新中心作为承担镇街图书馆职责的实体机构,在人力资源紧张的现状下通过购买蒲蒲兰阅读系列课程的方式提供专业的公共儿童阅读服务。同时,乐从镇妇女联合会自2018年以来分别在葛岸、沙边、水藤、大罗、东平建立5个社区绘本馆,在融创中心建立1个镇街绘本馆;并且连续四年打造“书香飘万家”项目,以绘本馆为阵地进行家庭阅读普及教育,取得良好成效^[10]。

目前我国社区儿童图书馆普遍存在生态位重叠,即在生态链中关系相近的两个种群间生态位的相似性现象,主要表现为资源同质化、服务模式同质化。资源同质化,即内容资源多为绘本等儿童读物,

由于内容由上游出版物限制、经费短缺限制和书籍选择无法体现专业性的限制,社区公共图书馆的内容竞争力甚至劣于私人儿童图书馆。服务模式同质化,即服务人员职业化程度不高、水平参差不齐,缺乏高质量的图书导读和分级阅读。社区儿童图书馆需要审视自我在社会生态中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公益性”和“专业性”,扮演好社区管理方的“联动者”、社区居民的“陪伴者”角色。

5 对象维度

服务对象的精准选择是图书馆最重要的服务能力之一,社区儿童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应当做到精准定位。按照《儿童权利公约》的定义,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11]。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12]。在图书馆领域,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分别制定了《青少年图书馆服务指南》和《婴幼儿图书馆服务指南》。《婴幼儿图书馆服务指南》指出“在家庭学习和终生学习的社会背景下,3岁以下儿童无约束地使用免费公共图书馆是一项基本人权”^[13],说明儿童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是18岁以下的儿童,并且区分不同年龄段的服务对象。其次,亲子家庭也是社区儿童图书馆的重要服务对象。家庭是社区最基础的构成细胞,亲子阅读也是图书馆的主要服务方式。最后,弱势群体也是不应忽视的服务对象,需要根据所在地的人群构成具体分析:城中村社区图书馆主要是城市流动儿童和单亲特困家庭,乡村图书馆主要是留守儿童和贫困儿童。只有根据社区的人口结构准确分析,才能做到服务对象的精准定位,从而发挥不同社会力量的作用。

6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儿童图书馆建设的发展路径

综上所述,笔者尝试从理论指导、时间规划、空间竞合和对象选择四个维度探索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儿童图书馆建设的发展路径。基础理论提供指导方法,确立政府、社会组织多方参与的管理模式;时间规划强调全过程管理,注重资源建设过程中生态文化的共生能力;服务对象为儿童和亲子家庭的特殊

性,决定了服务人员的专业性要求;生态学作为柔性纽带,通过情感化的社会关系将时间、空间和对象紧密连接为共融的一体,保证其长久生命力。

6.1 管理模式多样化

6.1.1 政府“关键种”引导

生态学理论认为,生态系统中某些物种在维护稳定性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其作用的发挥直接影响整个生态系统,这些物种被称为“关键种”^[14]。政府,就是社区儿童图书馆建设的关键种,是社区管理最大的“业主”。政府应该用养护一个生态系统的思维来经营社区,对社会公益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管理模式和“项目化”的运行模式,鼓励和激励多方主体参与进来;同时,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和生态竞合关系;最后,对社区儿童图书馆的运营效益进行评估和监管,增加社会公信力和吸引力。例如《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规定,“街道、镇、园区管委会等相关部门应当充分发挥基层主体作用,协同做好公众参与工作,承担公共要素的运营管理职责”^[15]。

6.1.2 社会组织立体参与

根据对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的检索整理,图书馆相关社会组织共369个。社会团体数量最多,多数为图书馆学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位居第二,例如北京市皮卡少儿中英文图书馆、大连市红月亮儿童图书馆、晋城市漫读吧儿童图书馆等;基金会仅有2个。与之对比,博物馆相关社会组织共2445个,多达图书馆的6倍^[16]。这些数据一方面说明我国社会力量的基础在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图书馆行业对于社会力量的利用明显弱于博物馆行业,这无疑是值得图书馆界深思的一个问题(见表1)。

表1 我国图书馆和博物馆社会组织统计表

类别	组织类型		
	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	基金会
图书馆/个	252	115	2
博物馆/个	101	2 341	3

与此同时,我国现有社会组织中社区基金会185个,有公开募捐资格的为11个;儿童基金会89个,有公开募捐资格的为30个^[16]。不少社区基金会和儿童基金会从事与社区儿童阅读相关的项目。例如广东

省德胜社区慈善基金会,2017年在广东省民政厅注册,定位为资助型、支持性的社区基金会,接受企业和私人捐赠资金设立冠名基金“红豌豆儿童阅读基金”,由基金会实行1:1的配资,致力于社区儿童阅读推广。社区儿童图书馆的建设视野不能局限于图书馆领域,要在全面了解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基金会和志愿服务组织。北京朝外地区文化服务中心、朝阳区图书馆和悠贝亲子图书馆三方签署了《社会力量参与朝外地区图书馆运营合作协议书》,建立街道提供设施与场地,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运营,区图书馆配送图书资源,政府适当对其提供资金补贴的运作模式^[17]。

6.2 资源建设共享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指出,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兴办实体、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设施、捐赠产品等方式,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18]。以我国著名的网络众筹平台“腾讯乐捐”为例,从数量上分析,截至2022年12月17日,“图书馆”项目共计2493个,状态为“募款”的有133个,状态为“执行中”的有1739个,状态为“已结束”的有621个。“阅读”项目共计1805个,状态为“募款”的有132个,状态为“执行中”的有1276个,状态为“已结束”的有397个^[19]。从项目发起人类型分析,主要包括基金会、社会组织、项目团体和个人等,其中基金会占比最高。从项目内容分析,包括社区(村)图书馆建设、图书捐赠、培育阅读推广人、开发阅读课件等。从服务对象分析,涵盖社区儿童(家庭)、贫困山村儿童、盲童、乡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以及困境家庭儿童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儿童图书馆建设已经从单一的筹集资金扩大到让更多的主体亲自参与到公共文化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培养和提升了公众的文化创造能力,体现了生态文化的共生能力。

6.3 服务人员专业化

6.3.1 专职人员建立准入机制

图书馆从业人员素质直接关系服务质量,根据我国现状,社区儿童图书馆的人员应为专职人员和志愿者结合的方式,专职人员应同时兼具图书馆员和教育工作者的双重素质。美国《卓越阅读法案》十分重视儿童阅读的科学性,强调“通过使用源自可靠的、可复制的阅读研究(包括自然拼读法)的发现,

改进学生的阅读技巧,以及阅读课老师的在职教学实践”^[20]。因此社区儿童图书馆除了需要图书馆学专业人才,还需要积极吸纳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儿童文学等专业的优秀人才,形成学科比例协调的人才管理队伍。

6.3.2 志愿者完善培训制度

社区儿童图书馆对于志愿者应当采取“先培训、后上岗”原则,保证志愿服务的专业性。由政府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组织研究儿童阅读志愿者的培训与管理制度,出台培训相关的课程、政策、标准或指南,对培训的内容、管理和资质考核进行制度化、标准化规范。我国各地目前有不少的儿童阅读推广人培训项目,例如由上海市图书馆学会主导的上海市图书馆学会联合上海浦东图书馆2015年开始的儿童阅读推广人培育项目;由政府部门主导的青岛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2017年推出的“领读一百天,改变人生路”阅读推广人培育三年计划;中山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中山亲子阅读培训及比赛。

6.4 社会关系情感化

6.4.1 社区情感构建

社区儿童图书馆是社区情感和社会关系建构的汇集机构,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也是其与亲子阅读商业机构或其他社会组织最大的不同之处。社区儿童图书馆作为公共图书馆,应当在强调公益性基础上,凸显其社区情感营造的功能,为本社区的家长和孩子提供知识获取与安全保障于一体的场所,具备亲子交流、信息交互的公共平台功能。例如深圳2009年开展社区“四点半学校”工作,缓解了家长接送难和孩子放学无处可去的问题,社区儿童图书馆通常承担了这一职能,图书馆与社区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21]。社区儿童图书馆要准确定位自身的社会生态

位,积极地对外扩展链接,和其他社会主体形成协同关系,充分利用里仁良知、道德情操等社会情感,将自身打造为社区情感交流平台,融合更多社会财富的情感用途。

6.4.2 乡情精神链接

乡情,是一种基于地域以及附着在经济、社会、文化纽带上的特殊情感,体现为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及在此基础上的回馈意愿和公共精神^[22]。乡情在现代社会依然有较大动员力,一是可以激发乡贤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管理和慈善资源捐赠的热情;二是可以调和社区矛盾以及达成治理共识。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且乡情文化深厚的地区,社区儿童图书馆作为文化的代表符号和公共空间,更加容易成为乡情的链接纽带。例如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历来有“顺德祠堂南海庙”美誉,区妇女联合会利用当地祠堂改造农家书屋建设“儿童书阁”,这一项目连续多年获得区女企业家协会和区留学生协会资金捐助购置童书,村居妇女联合会负责日常管理运作;同时联合顺德区图书馆,全区建设“亲子阅读绘本馆”36个,妇女联合会负责联系社区或村居免费提供场地,区图书馆以集体借书证的方式提供图书,实现政府资金、社会资金和公共图书馆三方合作。

7 结语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社会力量对于社区儿童图书馆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者。社区儿童图书馆利用社会力量应从当地的社区生态乃至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找准生态位,处理好竞合关系,真正发挥社区儿童图书馆在“书香社会”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儿童图书馆建设工作的意见[EB/OL].[2022-10-10].http://www.gov.cn/jzwgk/2010-12/14/content_1765361.htm.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EB/OL].[2022-10-10].<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711/86402870d45a4b2388e6b5a86a187bb8.shtml>.
- [3] 杨瑛娟,周小婷,杨倩.基于生态位理论的陕南三市竞合协调发展研究[J].湖北农业科学,2021(3):167-170,200.
- [4] HANGMAN H. Nonprofit Enterprise in the Performing Arts[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1(12):341-361.
- [5] DIMAGGIO P J, ANHEIER H K. The Sociology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Sector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0(16):140-141.

- [6] 黄煜.生态位理论视阈下高职院校“双创”教育的困境及脱困之道[J].教育与职业,2021(5):67-71.
- [7]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EB/OL].[2022-10-27].http://www.nwccw.gov.cn/2017-04/05/content_149166.htm.
- [8] 和乐阅读 | 容边社区和乐图书馆揭牌暨第二季度计划工作坊[EB/OL].[2023-04-10].<https://mp.weixin.qq.com/s/bErw3dJj-V5lEuFG7Cqm7g>.
- [9] 蒲蒲兰绘本馆[EB/OL].[2023-04-07].<http://www.poplar.com.cn/front/cooperate>.
- [10] 新浪广东.启蒙阅读亲子共学,乐从镇家庭领读者实操培训再启航[EB/OL].[2023-04-09].<http://gd.sina.com.cn/sd/2021-04-13/detail-ikmxzfmk6600556.d.html>.
- [11] 儿童权利公约[EB/OL].[2022-10-27].<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44-25.shtml>.
- [12] 未成年人保护法[EB/OL].[2022-10-28].<http://www.zgzyw.com.cn/zgzyw/system/2020/10/22/030135578.shtml>.
- [13] IFLA.Guidelinesforlibraryservicestobabiesandtoddler[EB/OL].[2022-10-28].<http://archive.ifla.org/VII/d3/pub/Profrep100.pdf>.
- [14] 李洪佳.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生态困境及优化策略[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20(1):50-54.
- [15] 关于印发《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的通知[EB/OL].[2022-11-27].<http://www.shpt.gov.cn/guituju/zw-zcyj/20181123/355958.html>.
- [16] 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EB/OL].[2022-11-28].<https://datasearch.chinanpo.gov.cn/gsxw/newList>.
- [17] 北京朝阳区试点社会力量参与管理图书馆[EB/OL].[2022-11-31].<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0122/c172318-24188908.html>.
-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EB/OL].[2022-11-17].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6-12/25/content_2004880.htm.
- [19] 腾讯乐捐[EB/OL].[2022-10-17].<https://gongyi.qq.com/succor/>.
- [20] 范并思.现有法律框架下的儿童阅读立法研究[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8(5):3-9.
- [21] 广州日报.深圳四点半学校“课堂很有料”[EB/OL].[2022-12-15].<http://gd.sina.com.cn/news/gz/2018-03-06/detail-ifyztfz9009973.shtml>.
- [22] 蓝煜昕,林顺浩.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J].中国行政管理,2020(2):54-59.

作者简介: 蔺梦华, 硕士, 佛山市顺德图书馆副馆长, 研究方向为公共图书馆管理与服务。

收稿日期: 2023-03-08

本文责编: 孙晓清

(上接第11页)

- [7] SUWANA F.Content, changers, community and collaboration: Expanding digital media literacy initiatives[J].Media Practice and Education,2021,22(2):153-170.
- [8] POTTER J,GILJE Ø.Curation as a new literacy practice[J].E-learning and Digital Media,2015,12(2):123-127.
- [9] BYRON P,MCKEE A,WATSON A,et al.Reading for realness: Porn literacies, digital media, and young people[J].Sexuality & Culture,2021,25(5):786-805.
- [10] DESZCZ-TRYHUBCZAK J,HUYSMANS F.Reading and digital media[J].Learning to Read in a Digital World,2018,17(2):1-2.
- [11] 王向真.基于UTAUT的高校学生电子图书使用行为研究:以广西中医药大学为例[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8(11):82-88.

作者简介: 廉丽华, 本溪市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阅读推广, 数字图书馆。

收稿日期: 2023-04-25

本文责编: 王晓琳

· 探索与创新 ·

带区间信息的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群决策评价模型*

谢小军¹ 马虹² 薛申芳¹ 乔希民¹

(1.广州工商学院通识教育学院 广东广州 510850)

(2.广东金融学院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 广东广州 510521)

摘要:高校图书馆的服务质量评价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现有的评价方法缺乏对不同类群体用户需求的关注。针对这个问题,文章建立了一种基于不同类型群体决策的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综合评价模型。首先根据现有投影测度的缺陷,给出了一个广义标准化投影测度公式。该公式能综合测度两个区间向量的接近程度,并应用于测度带有区间信息的两个评价矩阵的接近程度;其次,将新提出的投影测度公式应用于改进的TOPSIS方法中,建立了一种含实数和区间数混合信息的群决策模型;最后,将该模型应用于广东省某4所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的评价中。实验分析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鲁棒性和稳定性。

关键词: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方法;区间数;群决策;广义标准化投影;TOPSIS方法

中图分类号:G258.6;G251

文献标识码:A

A Group Decision-Making Evaluation Model for University Library Service Quality with Interval Information

Abstract The evaluation of service quality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has long been a subject of significant interest. Existing evaluation methods often overlook the diverse needs of various user groups. To address this concern,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for university library service quality based on decision-making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user groups. Initially, a generalized standardization projection metric formula is introduced to address the limitations of current projection measures. This formula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measure of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wo interval vectors and is applied to assess the proximity of evaluation matrices containing interval information. Subsequently, the newly derived projection metric formula is integrated into an enhanced TOPSIS (Technique for Order of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 method, resulting in a group decision-making model that combines real and interval data. Finally, this model is applied to the evaluation of library service quality at four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Experimental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exhibits robustness and stability.

Key words library service quality; evaluation method; interval data; group decision-making; generalized standardization projection; TOPSIS method

1 引言

传统图书馆的服务质量评价侧重硬件条件,例如基础设施、藏书资源等。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图书馆的“服务”是否令人满意成为图书馆服务质量

* 本文系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科研平台和项目“基于产教融合的MR(混合现实)协同创新中心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22ZDZX1037);广州工商学院校级科研课题“基于三角模糊数时间序列的组合预测模型研究”(项目编号:KA202132)的研究成果之一。

评价标准的依据^[1]。因此以用户为中心的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日益成为主流^[2]。用户不再只是图书馆服务的接受者,而且还是服务质量的评判者,意味着评价主体由传统的图书馆系统和行政主管部门转变为图书馆用户。这种转变对指导图书馆提高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以关注用户需求如何评价和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成为图书馆管理研究领域最近重点关注的课题^[3-4],已引起众多学者和研究专家的重视。

在近期文献研究中,通过以用户为中心构建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5-7]、聚类分析^[8]、模糊综合评价法^[9-12]、关联分析^[13]等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丰富和完善了以用户为中心的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但是都是将全体读者视作为同一类专家或同一类型用户,即现有的评价方法缺乏对不同类群体用户需求的关注。不同类群体用户主要指具有不同身份的角色,例如高校图书馆服务的对象^[14]主要分为三大群体:学生群体、专任教师群体、辅导员群体。不同类群体用户往往会有不同的需求,所以综合考虑不同类群体用户的需求更符合现实的需要。针对此问题,本研究拟采用群决策(Group Decision Making, GDM)^[15-17]方法来建立图书馆服务质量的评价模型。群决策可以集结各类用户群体的观点,是一种综合性更强的决策方法。在群决策方法中,优劣解距离法(Technique for Order Performa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 TOPSIS)方法^[18-19]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法。TOPSIS方法需要考虑决策方案到理想解的距离^[20-22]。常用的测度是欧几里得距离和海明距离。事实上,向量投影具有更好的综合测度,它可以同时兼顾反映两个向量指标之间的距离和夹角。因此,在TOPSIS方法中,如果用投影测度来替代距离测度,能增强模型的综合性,从而增大其应用的范围。然而本研究发现传统的投影测度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基于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探讨。

(1) 针对不同类群体用户的评价信息,融合TOPSIS方法建立了一种基于不同类型群体决策的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综合评价模型;

(2) 考虑投影测度比距离测度更加综合,以及针对现有投影测度的缺陷,给出一个新的投影测度公式,建立一种改进的TOPSIS评价方法;

(3) 针对现有的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信息中只考虑了实数或者区间数中某一种形式,建立一种含实数和区间数的混合信息综合评价模型。

2 投影测度

为了方便起见,在评价过程中使用以下索引集:

(1) 记 $M = \{1, 2, \dots, m\}$, $N = \{1, 2, \dots, n\}$ 。

(2) 评价问题的方案集为: $A = \{A_i | i \in M\}$ 。

(3) 评价问题的属性集为: $G = \{g_j | j \in N\}$ 。

(4) 属性的权重向量为: $w = \{w_j | j \in N\}$, $0 \leq w_j \leq 1$ 且 $\sum_{j=1}^n w_j = 1$ 。

定义 1^[23] 设 $a = (\alpha_1, \alpha_2, \dots, \alpha_n)$ 和 $\beta = (\beta_1, \beta_2, \dots, \beta_n)$ 是两个区间向量, 其中 $\alpha_i = [\alpha_i^l, \alpha_i^u]$, $\beta_i = [\beta_i^l, \beta_i^u]$, 定义区间向量 a 在集 β 上的投影为:

$$Proj_{\beta}(\alpha) = \frac{\alpha\beta}{|\beta|} \quad (1)$$

其中 $\alpha\beta = \sum_{i=1}^n (\alpha_i^l \beta_i^l + \alpha_i^u \beta_i^u)$, $|\beta| = \sqrt{\sum_{i=1}^n ((\beta_i^l)^2 + (\beta_i^u)^2)}$ 。

一般情况下, $Proj_{\beta}(\alpha)$ 越大, 区间向量 a 就越接近 β , 然而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此结论不具有一般性。

例 考虑 $\alpha = ([0, 4], [0, 0])$, $\beta = ([0, 2], [0, 0])$ 是两个区间向量, 显然 $\alpha \neq \beta$, 利用式(1)计算出 $Proj_{\beta}(\beta) = 2$, $Proj_{\beta}(\alpha) = 4$, 显然 $Proj_{\beta}(\alpha) > Proj_{\beta}(\beta)$, 这是一个矛盾。文献^[19]提出了一种新的投影测度方法:

$$Proj_{\beta}(\alpha) = \frac{\alpha\beta}{|\beta|^2} \quad (2)$$

从式(2)可以得出, 当 $Proj_{\beta}(\alpha)$ 越接近 1, 区间向量 a 就越接近 β ; 当 $Proj_{\beta}(\alpha) = 1$ 时, $\alpha = \beta$ 。但是笔者发现式(2)仍然存在问题, 利用上述例子进行考察, 由式(2)计算出 $Proj_{\beta}(\beta) = 1$, $Proj_{\beta}(\alpha) = 2$, 显然 $Proj_{\beta}(\alpha) > Proj_{\beta}(\beta)$, 这是矛盾的。另外, 式(1)和(2)除了以上问题以外, 还存在一个缺点, 不满足标准化条件: $0 \leq Proj_{\beta}(\alpha) \leq 1$, 其投影值有的情况很大, 有的情况很小, 这样用来判断两个区间直觉模糊集接近程度时, 很难把握其精度。为解决这些问题, 本文给出以下广义标准化投影公式:

$$GNProj_{\beta}(\alpha) = \frac{\alpha\beta}{|\alpha||\beta| + |\alpha|^2 - |\beta|^2 + |\alpha\beta - |\beta|^2|} \quad (3)$$

显然式(3)满足标准化条件: $0 \leq GNProj_{\beta}(\alpha) \leq 1$,

对于例1中两个区间向量, 计算 $GNProj_{\beta}(\beta)=1$, $GNProj_{\beta}(\alpha)=1/3$, 显然, $GNProj_{\beta}(\alpha) < GNProj_{\beta}(\beta)$, 因此式(3)比式(2)和(1)更加完善, 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故式(3)可以更加准确地来度量两个区间向量的接近程度。

定义2 类比式(3), 设 $A=(a_{ij})_{T \times N}$ 和 $B=(b_{ij})_{T \times N}$ 是两个评价矩阵, 则可定义 A 在 B 上的广义标准化投影值为:

$$GNProj_B(A) = \frac{AB}{|A||B| + |A|^2 - |B|^2 + |AB - |B|^2|} \quad (4)$$

其中 A 和 B 具有共同的属性集合 $G=\{g_j\}, j \in N$, 属性集合 G 包含2类, 记为 G_1 和 G_2 , 满足 $G=G_1 \cup G_2$, $G_1 \cap G_2 = \emptyset$, 当 $g_j \in G_1$ 时, A 中的元素 a_{kj} 和 B 中的元素 b_{kj} 为实数; 当 $g_j \in G_2$ 时, A 中的元素 a_{kj} 和 B 中的元素 b_{kj} 为区间数 $[a_{kj}^l, a_{kj}^u]$ 和 $[b_{kj}^l, b_{kj}^u]$, 且有 $|A| = \sqrt{|A|^2}$, $|B| = \sqrt{|B|^2}$, $AB = \sum_{k=1}^T \left(\sum_{g_j \in G_1} a_{kj} b_{kj} + \sum_{g_j \in G_2} (a_{kj}^l b_{kj}^l + a_{kj}^u b_{kj}^u) \right)$, $|A|^2 = \sum_{k=1}^T \left(\sum_{g_j \in G_1} (a_{kj})^2 + \sum_{g_j \in G_2} ((a_{kj}^l)^2 + (a_{kj}^u)^2) \right)$, $|B|^2 = \sum_{k=1}^T \left(\sum_{g_j \in G_1} (b_{kj})^2 + \sum_{g_j \in G_2} ((b_{kj}^l)^2 + (b_{kj}^u)^2) \right)$ 。

3 带区间信息的群决策评价模型

由决策专家对方案 $A_i \in A, i \in M$ 中的属性 $g_j \in G, j \in N$ 进行评价打分, 利用上文给出的投影公式融合TOPSIS方法建立综合评价模型, 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 建立决策评价矩阵。

$$\tilde{A}_i = \begin{pmatrix} g_1 & g_2 & \cdots & g_n \\ d_1 & a_{11}^l & a_{12}^l & \cdots & a_{1n}^l \\ d_2 & a_{21}^l & a_{22}^l & \cdots & a_{2n}^l \\ \vdots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d_i & a_{i1}^l & a_{i2}^l & \cdots & a_{in}^l \end{pmatrix}, i \in M \quad (5)$$

其中 $\tilde{A}_i, i \in M$ 表示决策专家对 A_i 方案的决策评价矩阵。

步骤2 建立加权决策评价矩阵。设

$$B_i = \begin{pmatrix} g_1 & g_2 & \cdots & g_n \\ d_1 & b_{11}^l & b_{12}^l & \cdots & b_{1n}^l \\ d_2 & b_{21}^l & b_{22}^l & \cdots & b_{2n}^l \\ \vdots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d_i & b_{i1}^l & b_{i2}^l & \cdots & b_{in}^l \end{pmatrix}, i \in M \quad (6)$$

若 a_{ij}^l 在式(4)中为实数, 则 $b_{ij}^l = w_j a_{ij}^l, k \in T, j \in N$; 若 a_{ij}^l 在式(4)中为区间数 $[a_{ij}^l, a_{ij}^u]$, 则 $b_{ij}^l = [w_j a_{ij}^l, w_j a_{ij}^u], k \in T, j \in N$ 。

步骤3 确定正负理想决策评价矩阵。假设属性指标 G 的类型包含效益型和成本型, 则正负理想决策评价矩阵为:

$$B^+ = \begin{pmatrix} g_1 & g_2 & \cdots & g_n \\ d_1 & b_{11}^+ & b_{12}^+ & \cdots & b_{1n}^+ \\ d_2 & b_{21}^+ & b_{22}^+ & \cdots & b_{2n}^+ \\ \vdots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d_i & b_{i1}^+ & b_{i2}^+ & \cdots & b_{in}^+ \end{pmatrix}, B^- = \begin{pmatrix} g_1 & g_2 & \cdots & g_n \\ d_1 & b_{11}^- & b_{12}^- & \cdots & b_{1n}^- \\ d_2 & b_{21}^- & b_{22}^- & \cdots & b_{2n}^- \\ \vdots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d_i & b_{i1}^- & b_{i2}^- & \cdots & b_{in}^- \end{pmatrix} \quad (7)$$

其中 B^+ 为正理想决策评价矩阵, B^- 为负理想决策评价矩阵。若属性指标 g_j 为效益型, 且 b_{ij}^l 在式(6)中为实数, 则 $b_{ij}^+ = \max_{i \in M} \{b_{ij}^l\}$, $b_{ij}^- = \min_{i \in M} \{b_{ij}^l\}$, $k \in T, j \in N$; 若属性指标 g_j 为效益型, 且 b_{ij}^l 在式(6)中为区间数 $[b_{ij}^l, b_{ij}^u]$, 则 $b_{ij}^+ = [\max_{i \in M} \{b_{ij}^l\}, \max_{i \in M} \{b_{ij}^u\}]$, $b_{ij}^- = [\min_{i \in M} \{b_{ij}^l\}, \min_{i \in M} \{b_{ij}^u\}]$, $k \in T, j \in N$ 。若属性指标 g_j 为成本型, 且 b_{ij}^l 在式(6)中为实数, 则 $b_{ij}^+ = \min_{i \in M} \{b_{ij}^l\}$, $b_{ij}^- = \max_{i \in M} \{b_{ij}^l\}$; 若属性指标 g_j 为成本型, 且 b_{ij}^l 在式(6)中为区间数 $[b_{ij}^l, b_{ij}^u]$, $b_{ij}^+ = [\min_{i \in M} \{b_{ij}^l\}, \min_{i \in M} \{b_{ij}^u\}]$, $b_{ij}^- = [\max_{i \in M} \{b_{ij}^l\}, \max_{i \in M} \{b_{ij}^u\}]$ 。

步骤4 利用式(4)计算每个评价对象的加权决策评价矩阵与正负理想决策评价矩阵的广义标准化投影值:

$$GNProj_{B^+}(B_i) = \frac{B_i B^+}{|B_i||B^+| + |B_i|^2 - |B^+|^2 + |B_i B^+ - |B^+|^2|}, i \in M \quad (8)$$

$$GNProj_{B^-}(B_i) = \frac{B_i B^-}{|B_i||B^-| + |B_i|^2 - |B^-|^2 + |B_i B^- - |B^-|^2|}, i \in M \quad (9)$$

其中 $B_i B^+ = \sum_{k=1}^T \left(\sum_{g_j \in G_1} b_{kj}^l b_{kj}^+ + \sum_{g_j \in G_2} (b_{kj}^l b_{kj}^+ + b_{kj}^u b_{kj}^+) \right)$, $B_i B^- = \sum_{k=1}^T \left(\sum_{g_j \in G_1} b_{kj}^l b_{kj}^- + \sum_{g_j \in G_2} (b_{kj}^l b_{kj}^- + b_{kj}^u b_{kj}^-) \right)$, $|B_i|^2 = \sum_{k=1}^T \left(\sum_{g_j \in G_1} (b_{kj}^l)^2 + \sum_{g_j \in G_2} ((b_{kj}^l)^2 + (b_{kj}^u)^2) \right)$, $|B^+|^2 = \sum_{k=1}^T \left(\sum_{g_j \in G_1} (b_{kj}^+)^2 + \sum_{g_j \in G_2} ((b_{kj}^+)^2 + (b_{kj}^-)^2) \right)$, $|B^-|^2 = \sum_{k=1}^T \left(\sum_{g_j \in G_1} (b_{kj}^-)^2 + \sum_{g_j \in G_2} ((b_{kj}^-)^2 + (b_{kj}^+)^2) \right)$, $|B_i| = \sqrt{|B_i|^2}$, $|B^+| = \sqrt{|B^+|^2}$, $|B^-| = \sqrt{|B^-|^2}$ 。一般来说, 较大的 $GNProj_{B^+}(B_i)$ 和较小的 $GNProj_{B^-}(B_i)$, 意味着较好的评价对象 A_i 。

步骤5 计算相关系数。一个基于广义标准化投影测度的相关系数定义为:

$$GNRC_i = \frac{GNProj_{B^+}(B_i)}{GNProj_{B^+}(B_i) + GNProj_{B^-}(B_i)}, i \in M \quad (10)$$

步骤6 评价对象排序。根据步骤5计算出的每个评价对象 A_i 的相关系数 $GNRC_i$, 排序的准则为: 相关系数 $GNRC_i$ 越大, 对应的评价对象 A_i 就越好。

4 实例分析

文章通过调研选定广东省内某4所高校图书馆作为评价对象, 针对这4所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进行评价, 接下来将给出详细的评价过程。

首先, 对这4所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进行问卷调查。这里的评价专家集合被记为 $D = \{d_1, d_2, d_3\}$, 其中 d_1, d_2, d_3 分别代表该高校的专任教师、学生、教辅行政人员3类用户。依据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将图书馆评价指标归纳为服务交互性、服务环境、服务功能

三个维度^[24]。沈宝光等人^[5,24]在ISO图书馆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服务环境、服务功能、服务可交互性、服务结果的四维度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由于此指标体系评价全面,后被研究者广泛使用。因此,本文采用该四个评价指标,记为 $G = \{g_1, g_2, g_3, g_4\} = \{\text{服务环境, 服务功能, 服务可交互性, 服务结果}\}$ 。

通过设置问卷调查,选定4所高校图书馆中的3类用户(专任教师用户、学生用户、教辅行政人员用户)当场发放问卷。收集各所高校图书馆的有效问卷数不少于200份,每类用户不少于50人。问卷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针对图书馆服务质量的4个指标属性进行打分,属性指标评价分数均采用百分制,其中属性指标服务环境为实数,服务功能、服务可交互性、服务结果均为区间数;另一个就是针对图书馆服务质量的4个指标属性的权重进行选择。然后对回收的问卷调查进行统计和处理,针对4所高校图书馆分别计算每类用户的平均评价分数,并依据步骤1建立4所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的决策评价矩阵 $\tilde{A}_i = (a_{ij})_{3 \times 4}$ ($i=1,2,3,4$),其中 a_{ij} 是第 k 类用户对第 i 所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的第 j 个属性的平均评价分数。4所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的决策评价矩阵见表1。

表1 4所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的决策评价矩阵

评价矩阵	用户	g_1	g_2	g_3	g_4
$\tilde{A}_1$	d_1	53	[68,72]	[63,78]	[65,79]
	d_2	92	[67,79]	[63,77]	[72,74]
	d_3	88	[72,78]	[51,58]	[75,77]
$\tilde{A}_2$	d_1	86	[84,84]	[48,57]	[79,90]
	d_2	71	[64,85]	[73,77]	[67,80]
	d_3	83	[77,76]	[65,79]	[77,85]
$\tilde{A}_3$	d_1	73	[68,79]	[71,85]	[75,85]
	d_2	76	[70,81]	[70,72]	[78,86]
	d_3	67	[64,65]	[81,85]	[68,62]
$\tilde{A}_4$	d_1	83	[64,84]	[70,75]	[61,83]
	d_2	91	[64,92]	[86,78]	[67,93]
	d_3	69	[79,89]	[80,86]	[79,82]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确定的4个指标属性权重为 $w = (0.2, 0.3, 0.2, 0.3)$,依据步骤2建立加权决策评价矩阵 $B_i = (b'_{ij})_{3 \times 4}$,4个加权决策评价矩阵见表2。

表2 加权决策评价矩阵

评价矩阵	用户	g_1	g_2	g_3	g_4
B_1	d_1	10.6	[20.4,21.6]	[12.6,15.6]	[19.5,23.7]
	d_2	18.4	[20.1,23.7]	[12.6,15.4]	[21.6,22.2]
	d_3	17.6	[21.6,23.4]	[10.2,11.6]	[22.5,23.1]
B_2	d_1	17.2	[25.2,25.2]	[9.6,11.4]	[23.7,27]
	d_2	14.2	[19.2,25.5]	[14.6,15.4]	[20.1,24]
	d_3	16.6	[23.1,22.8]	[13,15.8]	[23.1,25.5]
B_3	d_1	14.6	[20.4,23.7]	[14.2,17]	[22.5,25.5]
	d_2	15.2	[21,24.3]	[14,14.4]	[23.4,25.8]
	d_3	13.4	[19.2,19.5]	[16.2,17]	[20.4,18.6]
B_4	d_1	16.6	[19.2,25.2]	[14,15]	[18.3,24.9]
	d_2	18.2	[19.2,27.6]	[17.2,15.6]	[20.1,27.9]
	d_3	13.8	[23.7,26.7]	[16,17.2]	[23.7,24.6]

依据步骤3,确定正负理想决策评价矩阵。2个正负理想决策评价矩阵见表3。

表3 正负理想决策评价矩阵

评价矩阵	用户	g_1	g_2	g_3	g_4
B^+	d_1	17.2	[25.2,25.2]	[14.2,17]	[23.7,27]
	d_2	18.4	[21,27.6]	[17.2,15.6]	[23.4,27.9]
	d_3	17.6	[23.7,26.7]	[16.2,17.2]	[23.7,25.5]
B^-	d_1	10.6	[19.2,21.6]	[9.6,11.4]	[18.3,23.7]
	d_2	14.2	[19.2,23.7]	[12.6,14.4]	[20.1,22.2]
	d_3	13.4	[19.2,19.5]	[10.2,11.6]	[20.4,18.6]

依据步骤4计算每个加权决策评价矩阵 $\tilde{A}_i$ 与正负理想决策评价矩阵的广义标准化投影值,依据步骤4计算的结果,由步骤5可计算相关系数 $GNRC_i$,最后依据步骤6对4所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进行排序。4所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投影值、相关系数以及排序结果见表4。

表4 投影值、相关系数以及排序

评价高校	$GNProj_{B^+}(B_i)$	排序	$GNProj_{B^-}(B_i)$	排序	$GNRC_i$	排序
A_1	0.688 3	4	0.794 9	4	0.465 8	4
A_2	0.803 2	2	0.690 2	2	0.500 7	2
A_3	0.725 2	3	0.754 0	3	0.478 9	3
A_4	0.847 1	1	0.662 6	1	0.509 5	1

从表4可以看出,4所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依据相关系数 $GNRC_i$ 的排序结果为: $A_4 > A_2 > A_3 > A_1$,即图书馆服务质量最好的为 A_4 。

5 实验分析

5.1 对比分析

依据表4可知,本文提出的投影方法依据 $GNProj_{B^+}(B_i)$ 、 $GNProj_{B^-}(B_i)$ 、 $GNRC_i$ 值的排序均是一致的,从数值上的差异性可以看出具有较好的区分度,这一结果从侧面反映了本文模型具有较好的鲁棒性和更好的区分度。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文所构建的模型的优势,本节将广义标准化的投影模型与传统投影方法及文献[19]提出的投影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新的方法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与已有的方法的对比上,将步骤4中的式(8)和式(9)替换为传统的投影方法,其结果为:

$$Proj_{B^+}(B_i) = \frac{B_i B^+}{|B^+|}, i \in M \quad (11)$$

$$Proj_{B^-}(B_i) = \frac{B_i B^-}{|B^-|}, i \in M \quad (12)$$

类似地,将步骤4中的式(8)和式(9)替换为文献[19]的投影方法,其结果为:

$$Proj_{B^+}(B_i) = \frac{B_i B^+}{|B^+|^2}, i \in M \quad (13)$$

$$Proj_{B^-}(B_i) = \frac{B_i B^-}{|B^-|^2}, i \in M \quad (14)$$

一般来说,较大的 $Proj_{B^+}(B_i)$ 和较小的 $Proj_{B^-}(B_i)$ 的,意味着评价对象 A_i 较好。

进一步将式(10)替换为传统的投影相关系数计算方法,其结果为:

$$RC_i = \frac{Proj_{B^+}(B_i)}{Proj_{B^+}(B_i) + Proj_{B^-}(B_i)}, i \in M \quad (15)$$

一般来说, RC_i 较大,对应的评价对象 A_i 就越好。

根据式(11)至式(15),计算出4所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投影值、相关系数以及排序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

表5 传统投影方法的投影值、相关系数及方案排序

评价高校	$Proj_{B^+}(B_i)$	排序	$Proj_{B^-}(B_i)$	排序	RC_i	排序
A_1	86.701	4	86.796	1	0.499 7	4
A_2	92.647	2	92.512	3	0.500 4	3
A_3	88.752	3	88.559	2	0.500 5	2
A_4	94.624	1	94.192	4	0.501 1	1

表6 文献[19]的投影方法的投影值、相关系数及方案排序

评价高校	$Proj_{B^+}(B_i)$	排序	$Proj_{B^-}(B_i)$	排序	RC_i	排序
A_1	0.862 4	4	1.085 8	1	0.442 7	4
A_2	0.921 5	2	1.157 3	3	0.443 3	3
A_3	0.882 8	3	1.107 8	2	0.443 5	2
A_4	0.941 2	1	1.178 3	4	0.444 1	1

由以上表5和表6可知:

(1)传统的投影方法和文献[19]的投影方法依据 RC_i 值排序为 $A_4 > A_2 > A_3 > A_1$,4个评价对象的 RC_i 值非常接近,不利于做出决策,且排序结果与本文基于广义标准化投影的排序是不一致的;

(2)传统的投影方法与文献[19]的投影方法依据 $Proj_{B^+}(B_i)$ 、 $Proj_{B^-}(B_i)$ 、 RC_i 值的排序均是不一致的;

(3)传统的投影方法与文献[19]的投影方法的投影值 $Proj_{B^+}(B_i)$ 、 $Proj_{B^-}(B_i)$ 均出现了大于1的情况,这给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增加了困难,也从侧面反映了本文提出的广义标准化投影在[0,1]之间的优势。

以上分析表明,传统的投影方法和文献[19]的投影方法依据 $Proj_{B^+}(B_i)$ 、 $Proj_{B^-}(B_i)$ 、 RC_i ,得出了3种不同的排序关系,从模型的鲁棒性来看,暴露了传统的投影方法和文献[19]的投影方法的不足。而且本文基于广义标准化的投影的评价结果具有更好的区分度,凸显了本文投影模型的优势。

5.2 一个动态的实验

考虑以上实验只用了一组样本数据。本节接下来将通过一个动态的实验进行补充。令评价矩阵 $\tilde{A}_i$ 阵中的元素 a_{11} 的为参数 λ , $\lambda \in [0,100]$,让 λ 从0不断增加到100,决策评价矩阵 $\tilde{A}_i$ 中其他元素保持不变。因为正负理想投影值 $GNProj_{B^+}(B_i)$ 、 $GNProj_{B^-}(B_i)$ 和 $GNRC_i$ 均可以作为评价对象排序的测度指标,故分别绘制出随着 λ 的不断变化时它们的动态变化。变化情况如

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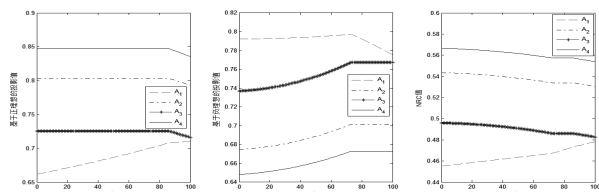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广义标准化投影方法的动态变化

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参数 λ 的不断变化,本文基于广义标准化投影方法的4个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的评价结果排序始终是一致的,这反映了该模型具有一定的鲁棒性。

为了将传统的投影方法和文献[19]的投影方法与本文提出的投影方法作对比,现将基于传统投影和文献[19]投影方法的正负理想投影值 $Proj_{B^+}(B_i)$ 、 $Proj_{B^-}(B_i)$ 和相关系数 RC_i 随着 λ 的不断变化的动态变化情况绘制为如图2和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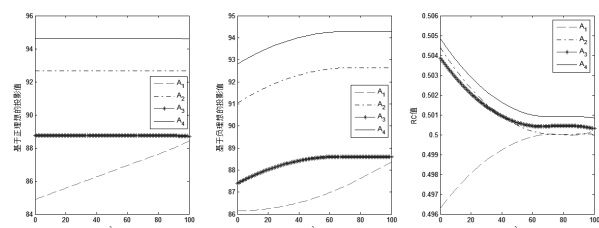


图2 基于传统投影方法的动态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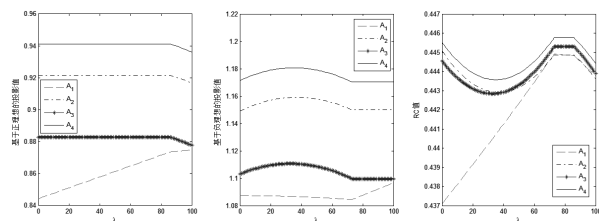


图3 基于文献[19]投影方法的动态变化

从图2可以看出,随着参数 λ 的不断变化,基于传统投影方法的4个评价对象的测度中按照正理想投影值 $Proj_{B^+}(B_i)$ 排序始终是保持一致的,而且这个结果与本文模型排序结果是一致的,表明传统投影方法在某些方面是支持本文模型的;基于传统投影方法按照负理想投影值 $Proj_{B^-}(B_i)$ 排序关系虽然始终是一致的,但是与 $Proj_{B^+}(B_i)$ 排序关系却是刚好相反的,这是一个矛盾,凸显了传统投影方法在某些方面的缺陷;基于传统投影方法按照相关系数 RC_i 的排序关系在 $\lambda < 30$ 时是基本稳定的,但是当 $\lambda > 30$ 时, A_2 和 A_3 的排序关系是不稳定的,以及当 $\lambda \geq 70$ 时, A_1 和 A_2 的排序关系也是不稳定的,侧面反映了传统投影方法

的劣势。

从图3可以看出,随着参数 λ 的不断变化,基于文献[19]投影方法的4个评价对象的测度中按照正理想投影值 $Proj_{B^+}(B_i)$ 排序始终是保持一致的,此结果与本文投影模型排序结果是一致的,说明文献[19]投影方法在某些方面是支持本文模型的;基于文献[19]投影方法按照负理想投影值 $Proj_{B^-}(B_i)$ 排序关系虽然也始终是一致的,但是与 $Proj_{B^+}(B_i)$ 排序关系却是刚好相反的,这是矛盾的,也凸显了文献[19]投影方法的缺陷;基于文献[19]投影方法按照相关系数 RC_i 的排序关系在 $\lambda < 30$ 时是基本稳定的,但是当 $\lambda > 30$ 时, A_2 和 A_3 的排序关系是不稳定的,以及当 $\lambda \geq 70$ 时, A_1 和 A_2 的排序关系也是不稳定的,侧面反映了文献[19]投影方法的劣势。

综合以上图1和图2、图3对比,可以动态地看出本文所构建的基于广义标准化投影模型不仅弥补了传统投影的缺陷,而且具备一定的鲁棒性和稳定性,并且具有更好的区分度。通过静态和动态的2类实验对比,均表明本文构建的投影模型要优于传统投影方法和文献[19]投影方法。

6 结论及建议

针对高校图书馆的服务质量评价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广义标准化投影测度和群体决策,并带有区间信息的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综合评价模型。新提出的投影测度公式弥补了传统投影方法和文献[19]投影方法的缺陷。本文模型还具有以下优势:

(1)操作简单,容易实现。本文提出的评价模型允许专家的评价信息带有实数和区间信息的混合,为各类群体用户进行评价提供了方便,模型借助于MATLAB软件或其他编程软件均可容易实现。

(2)较好的鲁棒性和稳定性。一方面,本文提出的投影测度融合TOPSIS方法的综合评价模型,可以从正理想决策、负理想决策和相关系数3个指标同时进行测度,所以,本文模型更加综合;另一方面,从实例对比和实验分析可知,本文模型具有一定的鲁棒性和稳定性,区分度更好。

(3)本文提出的广义标准化投影测度公式的投影值位于 $[0, 1]$,更利于各类群体用户进行决策和判断,为各类用户群体进行综合评价提供了方便。

参考文献:

- [1] 曾强,丁媛.国内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述评[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2,40(4):92-97.
- [2] 范悦谦,施国洪,夏前龙,等.新信息环境下我国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的实证研究[J].情报杂志,2015,34(11):193-198.
- [3] 王丽.近十年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质量研究概述[J].图书馆研究,2021,51(1):69-73.
- [4] 沈军威,郑德俊.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优化模式的构建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9,63(15):52-59.
- [5] 沈光宝,温汉荣.高校图书馆移动服务质量的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J].现代情报,2015,35(10):157-160.
- [6] 李迎迎,王焕景,郑春厚.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服务的拟熵权模糊综合评价[J].图书馆论坛,2014,34(5):71-78.
- [7] 梁茹,李建霞,刘颖,等.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综合服务能力评价[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33(2):38-46.
- [8] 吴玉萍.基于SVC的高校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模型研究[J].情报科学,2017,35(10):35-39.
- [9] 沈思,王晓文,崔旭.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高校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质量评价[J].现代情报,2016,36(2):70-73,85.
- [10] 武瑞原,许强.基于ANP-Fuzzy模型的高校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研究[J].情报杂志,2016,35(5):155-160.
- [11] 高海涛,徐恺英,盛盼盼,等.基于AHP-DEA的高校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模型研究[J].情报科学,2016,34(12):88-91,101.
- [12] 汤森,王铁旦,彭定洪.用户感知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的犹豫模糊Kano-Taguchi方法[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3):84,105-110.
- [13] 朱学芳,邢绍艳.基于用户需求的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服务质量评价研究[J].情报科学,2022,40(3):3-11,20.
- [14] 吕桂敏.高校图书馆服务对象特点简析[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5(6):79-80.
- [15] 刘培德,滕飞.基于共识模型和ORESTE的扩展概率语言多属性群决策方法[J].中国管理科学,2021,29(3):199-209.
- [16] 梁昌勇,戚筱雯,丁勇,等.一种基于TOPSIS的混合型多属性群决策方法[J].中国管理科学,2012,20(4):109-117.
- [17] 王梓懿,陈晨.基于综合赋权TOPSIS模型的古籍修复用纸性能评价研究[J].图书馆研究,2022(8):12-20,40.
- [18] 岳川,张健.基于群决策和投影测度的软件质量评价模型[J].计算机应用,2020,40(1):218-226.
- [19] 孔繁超,曹亚新.基于模糊多指标和TOPSIS方法的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J].情报科学,2010,28(3):416-419.
- [20] 王应明.一种多指标决策与评价的方法:投影法[J].统计研究,1998(4):66-69.
- [21] 邱根胜.一种多指标决策与评价的新方法[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4(11):47-50.
- [22] XU G, LIU F. An approach to group decision making based on interval multiplicative and fuzzy preference relations by using projection[J]. 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2013, 37(6): 3929-3943.
- [23] YUE C. Normalized projection approach to group decision-making with hybrid decision inform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and Cybernetics, 2018, 9(8): 1365-1375.
- [24] 刁羽.高校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的优化研究:基于Kano模型与服务质量差距模型的视角[J].图书馆学研究,2013(8):22-26,48.

作者简介: 谢小军, 硕士, 广州工商学院通识教育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决策分析与预测; 马虹, 硕士, 广东金融学院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助教, 研究方向为预测和决策分析; 薛申芳, 博士, 广州工商学院通识教育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卫星自主导航; 乔希民, 广州工商学院通识教育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格上拓扑学与非经典数理逻辑。

收稿日期: 2023-04-03

本文责编: 李芳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社交媒体“伪科普”信息特征研究*

李文文 吕海若 王诗语 张 杨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38)

摘 要: 文章聚焦社交媒体中传播的“伪科普”信息,采用定性内容分析法揭示其信息特征,以期“伪科普”信息识别与治理提供参考依据。首先基于已有文献构建伪科普信息特征大纲,包含内容特征、传播特征、来源特征3个一级指标,并进一步细化为主题、表现形式等8个二级指标。之后选取“科普中国”发布的2022年传播范围较广的12条伪科普信息作为内容分析数据来源,依据伪科普信息特征大纲对12条伪科普信息进行编码。最后通过编码数据分析发现,伪科普信息主题集中在医疗健康类,“引用”所谓的“数据”或“证据”对目标群体进行“诱导”与“劝诫”,并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多渠道传播。

关键词: 伪科普; 社交媒体; 信息特征; 内容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seudoscience" 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pseudoscience" 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and employs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to reveal its in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and governance of "pseudoscience" information. Firstly, based on existing literature, a framework of pseudoscience in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is constructed, consisting of three primary indicators: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dissemin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 characteristics. These indicators are further refined into eight secondary indicators, including themes and presentation forms. Subsequently, 12 widely circulated pseudoscience information posts published b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hina" in 2022 are selected as the data source for content analysis. These posts are coded 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of pseudoscience in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ded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 themes of pseudoscience information are mainly related to medical and health topics. They "quote" so-called "data" or "evidence" to "induce" and "admonish" the target audience, and are disseminated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in a multimedia format.

Key words pseudoscience;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1 引言

科普(即科学技术普及与推广),是科学传播的

重要形式。科普活动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内核,引导群众掌握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最终达到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目的。科普活动多利用现代化信息传播渠道与传播媒介将科普信息渗透到公众

*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社交媒体虚假信息传播的形成机理与治理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2SJYB0621)研究成果之一。

社会生活中,具有渗透性、持续性、群众性等特点,其中科普信息是科普活动的内核,传播媒介是科普活动的重要工作^[1]。当前社交媒体成为科普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之一,加速了科普信息的传播与利用,与此同时部分虚假科普信息,即伪科普信息,与真实的科普信息共同渗透在各类社交媒体中,给公众正常生活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2]。针对这一现象,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规定,旨在建立健全科普信息发布和传播机制,特别是与人民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科普类虚假信息的治理格外受重视,如2022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宣部等九部委联合签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意见》,强调要提升健康科普信息的质量,发挥健康科普专家的作用,遏制虚假健康信息的传播,净化健康科普知识传播环境^[3]。鉴于伪科普信息具有较强的“迷惑性”,因此有必要对其特征开展深入探索,进而为针对性治理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2 研究现状

科普信息是指利用各种媒介向普罗大众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及科学精神的活动,而伪科普信息则反之,其传播的是未经证实、缺乏事实依据或与事实不相符的内容。已有文献中通常将伪科普信息与谣言、虚假信息混用,其中《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将谣言定义为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或者捏造的消息,虚假信息则更加强调不实信息的误导性意图^[4]。相较而言伪科普信息的内涵与定义更加专指,聚焦于知识科普类不实信息。伪科普信息按照主题、目的、传播方式等可以分为纯粹杜撰、夸张改造、断章取义、以讹传讹四种类型^[1]。通过文献调研发现,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层面的虚假信息或谣言的传播与治理问题,研究人员围绕各种类型虚假信息的特征、传播影响因素等进行了诸多探索^[5-6]。

伪科普信息作为虚假信息中的一种,其迷惑性更强,而当前针对伪科普信息的研究较少且较为分散,已有研究多停留在对伪科普信息传播危害与治理必要性的讨论,仅个别研究关注到伪科普现象的形成机理,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已有研究指出,伪科普信息可以是蓄意伪造,也可能是无意制造。伪科普信息的传播不仅传播错误科普信息,形成错误引

导,同时危害人们的财产安全,也会给人的心理和身体造成危害,严重的伪科普信息传播还会造成负面舆论风波和社会恐慌^[7-8]。据此,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及有关部门共同搭建了科学辟谣平台,面向公众提供辟谣、谣言举报、科普价值引领等服务,逐步形成了“捕捉线索—及时辟谣—正向传播”的有效工作机制^[9]。

综上所述,近年来社交媒体应用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为伪科普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土壤,社交媒体伪科普信息的传播范围更广、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路径更加复杂,因此治理难度更大。鉴于当前针对伪科普信息研究较少的现状,本研究拟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伪科普信息的特征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丰富相关领域理论研究成果,为伪科普信息治理相关政策的制定、科普信息治理实践的开展等提供参考依据。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Assarroudi等人^[10]将内容分析法划分为三类,即传统内容分析法、定向内容分析法、总结性内容分析法。其中,传统内容分析适用于探索性研究问题或现象,因此其编码类别(大纲)来自于原始数据;定向内容分析(directed content analysis)的编码类别来源于已有文献或理论;总结性内容分析(summative content analysis)是从识别和统计文本中特定单词和内容开始,拓展到潜在意义和主题的分析。

鉴于伪科普信息作为虚假信息中的一种,既具有虚假信息的共性特征,同时也具备自身独特的特征。据此,本研究采用定向内容分析方法,即在已有虚假信息特征研究相关文献调研的基础之上,构建伪科普信息特征编码体系。本研究中设计的伪科普信息特征编码体系借鉴了Zhang等人^[11]构建的包括外部特征(surface features)、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s)、来源特征(source features)的虚假健康信息特征列表,将伪科普信息特征编码体系划分为内容特征(content features)、传播特征(propagation features)与来源特征(source features)3个维度,具体划分为主题、表现形式、说服方式等8个二级特征指标(编码大纲见表1)。

3.2 数据来源

表 1 伪科普信息编码大纲

一级特征	二级特征	指标内涵	编码说明
内容特征	主题	伪科普信息涉及的内容主题	1 医疗健康 2 居家生活 3 其他
	表现形式	伪科普信息的呈现方式	1 文字 2 图文 3 视频
	说服方式	劝说方式	1 劝诫(不要) 2 诱导(要)
	情感表达	情感立场	1 正向 2 负面
传播特征	对象	信息内容的受众群体	1 特定群体 2 不区分
	渠道	传播渠道的数量	1 多渠道 2 单一渠道
来源特征	引用数据	信息中提到的数据来源	1 缺失 2 篡改
	证据支撑	信息中提到的观点支撑	1 编造 2 情境迁移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科普中国”发布的《2022 年度流言榜单出炉,你信过吗?》^[12],该榜单包含了 12 条 2022 年度传播范围较广的伪科普信息(见表 2)。此外,该素材列表所含伪科普信息均被证实为伪科普信息并被“科普中国”辟谣。选取上述伪科普信息作为内容分析数据来源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与代表性。

表 2 社交媒体伪科普信息素材列表

序号	伪科普信息
1	老年人常有多种基础疾病,接种新冠疫苗更容易发生副作用,弊大于利。
2	防疫口罩和核酸采样棉签里含有“石墨烯”,会对身体产生伤害。
3	空调开 26 度既舒服又省电。
4	变电站会产生辐射和噪音,影响健康。
5	葡萄酒中含有能保护心脏的白藜芦醇,常喝有助于健康。
6	空气炸锅也是炸,而且会产生丙烯酰胺,可能致癌。
7	颈椎病不要紧,不舒服了找人按摩一下,平时自己做做操就好了。
8	多喝苏打水对身体有好处,可以调节身体酸碱平衡。
9	接种 HPV 疫苗,有可能让女性怀不上孩子。
10	脂肪肝是胖人的专利,只要吃素减肥,就不会患脂肪肝。
11	藿香正气水是中暑的特效药。
12	老人跌倒确实很危险,但只要起身并活动无碍,就不用担心,也不用着急去医院。

4 内容分析结果

本研究构建的伪科普信息特征编码体系包含了内容特征、传播特征、来源特征 3 个一级特征指标,8 个二级特征指标,共 96 个编码。在此基础之上对选定的伪科普信息进行定性内容分析,编码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编码结果

一级特征	二级特征	指标	频次	总百分比/%
内容特征	主题 C1	医疗健康	11	11.46
		居家生活	1	1.04
		其他	0	0
	表现形式 C2	文字	2	2.08
		图文	9	9.38
		视频	1	1.04
	说服方式 C3	劝诫	5	5.20
		诱导	7	7.29
	情感表达 C4	正向	7	7.29
		负面	5	5.20
传播特征	对象 P1	特定群体	3	3.13
		不区分	9	9.38
	渠道 P2	多渠道	12	12.50
		单一渠道	0	0
来源特征	引用数据 S1	数据缺失	10	10.42
		篡改数据	2	2.08
	证据支撑 S2	编造	11	11.46
		情境迁移	1	1.04

4.1 伪科普信息内容特征

通过对伪科普信息主题编码的统计发现,2022 年度广泛传播的伪科普信息中,医疗健康类伪科普信息占据了绝对的比重(11.46%)。此外,个人财产类信息也是伪科普信息中常见的主题之一。当前健康是公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也是伪科普信息涉足较多的领域。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健康类伪科普信息具有较高的关注度、敏感性、迷惑性,加之信息不对称,导致公众“关心则乱”更容易“轻信”此类信息,进而造成此类虚假信息的进一步转发与传播。

当前社交媒体应用普及,各类社交平台转发、复制功能日益完善,因此可以支撑各种形式的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如视频、文本、图片等。在信息的表现

形式上,伪科普信息更加注重表现形式的灵活性,通常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9.38%)来增加伪科普信息的表现力和可读性。近年来随着视频剪辑技术的发展,伪科普类的短视频也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

在说服方式上,伪科普信息开头多采用“权威专家披露”“科学研究表明”等表述方式,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等手段来增强伪科普信息的可信度,进而诱导、误导(劝诫)公众。同时,伪科普信息的标题通常较为夸张,以吸引人的注意力、博人眼球为主要目的。

伪科普信息在情感表达上通常遵循“同理心(Empathy)”思维,基于受众视角将问题夸大,进而与受众产生情感共鸣。已有研究表明,后真相时代人们更容易被情感所左右,情感会扰乱人的认知,进而影响公众对信息真实性的评估与判断^[13]。也正因此,伪科普信息通常会打“感情牌”,进而诱导公众采纳或分享伪科普信息。

4.2 伪科普信息传播特征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伪科普信息传播在受众群体的选择上有两种趋势。其一是针对特定群体,如老年人、青少年或患某一类疾病的特定群体(3.13%),因为此类群体信息素养或认知有限,对伪科普信息内容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盲目性,因此更容易受伪科普信息的误导。另一类则面向普罗大众传播,伪科普信息内容辐射范围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传播对象面向大众群体(9.38%)。

在传播渠道上,伪科普信息的传播渠道具有较强的社交化传播特征,即借助朋友圈、微信群等社交网络在家人、朋友之间进行转发与传播,同时具有多渠道、跨平台传播的特征(12.50%)。近年来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之间跨平台转发功能日益完善,伪科普信息可同时在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等跨平台、多渠道传播,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泛。

4.3 伪科普信息来源特征

伪科普信息的来源特征主要指其中内容中涉及的数据与证据来源。伪科普信息中通常都会“引用”“数据”与“证据”对观点进行支撑,如实验数据、专家观点等,这些“数据”与“证据”来源多用来提高伪科普信息的“迷惑性”,进而增加诱导的成功率。通过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发现,伪科普信息所“引用”的“数据”多采用宏观提及、具体数据缺失

的形式进行(10.42%),如“如××实验数据表明”,但未出现具体数据数值。在“证据”“引用”上,多采用编造的形式(11.46%),如“××专家指出”。因此,伪科普信息在数据与证据来源使用上具有虚假引用、“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等特点,“数据”与“证据”溯源缺乏真实性与可靠性。

5 启示

5.1 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健全高质量科普教育体系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指出:“科学技术普及是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的活动,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14]科普教育是提升公众科学素养,降低伪科普信息危害的重要手段。因此,需要建立一个高质量的科普教育体系,以全方位、多阶段保障科普教育的效果。在科普教育体系中,政府在推动科普教育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也是监督和评估科普教育的主体,要强化各级政府部门科普服务的意识,积极鼓励学校、研究机构、企业、医院等参与到科普教育中,吸引专业科普人员和志愿科普人员共同致力于科普教育,壮大科普教育人才队伍。

5.2 加强对特殊人群信息素养、科学素养的关注

通过内容分析发现,伪科普信息主题以健康类为主,同时此类信息的受众目标以健康意识较强,但缺乏信息搜寻与甄别能力的老年人为主。此外,青少年受社会阅历、个人认知水平的限制,对伪科普信息的甄别与判断能力较弱,也是伪科普信息的主要目标群体。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加强对老年人、青少年、特殊疾病患病群体健康信息素养、科学素养的关注,及时了解此类群体的信息需求,加大各类信息的科普力度,拓宽信息科普的辐射面、科普深度。同时,拓宽信息科普的渠道与平台,多方面保障老年人、青少年、特殊疾病患病群体更加便捷地获取到真实可靠的科普信息,进而降低因信息素养、科学素养较低而产生的负面效应。

5.3 聚焦社交媒体加速科普信息的生产与传播

加强正确科普信息的传播是减少伪科普信息危害的重要措施之一^[14]。要以满足公众需求为导向,持

续推进高质量科普信息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依托医院、高校等组织资源,鼓励行业专家参与到科普内容的生产中,同时丰富科普信息的表现形式,如文字、图片、视频等。在传播渠道上,传统媒介时代科普信息主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传播,当前社交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转变,因此科普信息的传播要顺应社交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与大众信息获取、

利用方式的偏好,进一步创新与丰富科普信息的传播方式。推动主流媒体在科普信息传播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同时,增强各类社交媒体、新媒体在科普信息传播中的责任意识,提高社交媒体平台、新媒体平台对科普信息内容审核的范围与力度,从技术、管理等层面加强监管意识,进而降低伪科普信息传播的概率与危害。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EB/OL].[2023-03-23].http://www.gov.cn/zhengce/2022-09/04/content_5708260.htm.
- [2] 沈曦.社交网络中“伪科普”现象的形成机理与应对策略[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5.
-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卫宣传发〔2022〕11号[EB/OL].[2022-05-31][2023-03-23].<http://www.nhc.gov.cn/xcs/s3581/202205/1c67c12c86b44fd2afb8e424a2477091.shtml>.
- [4] 朱梦蝶,付少雄,郑德俊,等.文献视角下的社交媒体健康谣言研究[J].图书情报知识,2022,39(5):131-143.
- [5] 黄雨婷,冯婕.信息素养视域下的虚假信息甄别:国际进展与我国对策[J].图书情报知识,2021(2):121-132.
- [6] 吕叶文.后真相时代老年人群微信虚假信息易感现象研究[D].昆明:云南财经大学,2021.
- [7] 郑雪倩,邱宝昌,韩丹东.伪科普文章泛滥亟待管理规范[N].法制日报,2018-08-25(005).
- [8] 杨玉龙.别让“伪科普”伤了真感情[N].工人日报,2018-07-20(003).
- [9] 如何应对网络科普谣言或虚假信息?中国科普研究所提出这些办法[EB/OL].[2023-02-12].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toc_style_id=feeds_default&share_to=wechat&item_id=7491952500868395197&track_id=42CB00F1-0A4D-43AE-A5B0-C3862E4BBD74_684053820696.
- [10] ASSARROUDI A,NABAVI H F,ARMAT M R,et alDirected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The Description and Elaboration of Its Underpinning Methods and Data Analysis Process[J].Journal of Research in Nursing,2018,23(1):42-55.
- [11] ZHANG S,MA F C,LIU Y M,et al.Identifying features of health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sites: an exploratory analysis[J/OL].Library Hi Tech,2022,40(5):1384-1401[2023-03-23].<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content/doi/10.1108/LHT-09-2020-0242/full/html>.
- [12] 2022年度流言榜单出炉,你信过吗?[EB/OL].[2023-02-12].https://www.kepuchina.cn/article/articleinfo?business_type=100&classify=1&ar_id=393746.
- [13] 袁光锋.数字媒介、不确定性与风险传播中的情感治理[J].理论与改革,2023,251(3):134-143,160.
- [14] 李慧,宋佳.高质量科普教育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培养和储备可堪大用的人才:国际视野下科普教育的实践与启示[J].人民教育,2023,884(1):72-75.

作者简介: 李文文,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博士,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用户信息行为;吕海若,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本科生;王诗语,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本科生;张杨,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语义分析。

收稿日期: 2023-03-30

本文责编: 王晓琳

· 探索与创新 ·

我国公共图书馆弹幕视频网络运营现状与优化策略分析*

——以Bilibili为例

韩世曦¹ 李金伟²

(1. 宁波大学图书馆 浙江宁波 315000)

(2. 浙江图书馆 浙江杭州 310001)

摘要: 文章阐释了新媒体时代公共图书馆利用弹幕视频网站提供用户服务的重要性,并以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B站)为例,采集获得42所已开通B站账号的公共图书馆,从账号基本情况、更新情况、内容主题、传播指数、弹幕词频五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B站视频运营存在的问题包括:账号开通率不高,区域分布不均衡;账号活跃度较低,视频更新频率较慢;视频选题较为单一,视频制作缺乏创意性;账号运营数据不佳,公共图书馆品牌影响力不足;用户参与度较低,视频吸引力不足。据此提出优化策略,以推动公共图书馆B站视频运营及相关服务的改进。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弹幕视频网络; Bilibili; 运营策略

中图分类号: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Analysis on the Operation Statu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Bullet Screen Video of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 Taking Bilibili as an Example

Abstract The article explains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libraries using bullet screen video to provide user services in the new media era, and takes the Bilibili as an example to collect and obtain 42 public libraries that have opened accounts in Bilibili, and makes statistical analysis from five aspects: basic account information, update frequency, content theme, propagation index (BVCI), and bullet screen word frequency. The study reveals several issues in the current opera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on Bilibili: low account activation rate with uneven regional distribution, low account activity and slow video update frequency, limited diversity in video topics and lack of creativity in video production, poor account operation data leading to insufficient brand influence of public libraries, and low user engagement due to inadequate video attractiveness. In light of these finding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bullet screen video; Bilibili; operation strategy

1 引言

在社会数字化转型趋势下,公共图书馆传统服

务手段已难以满足用户需求,公共图书馆服务正向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方向转型,其服务媒介和服务形式逐渐多样化^[1]。随着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的丰富,线上服务形式的增多,微信、微博、抖音、哔哩哔哩

* 本文系浙江省图书馆学会2022年度学术研究项目“图书馆视频媒体弹幕传播效果研究”(项目编号: Ztx2022B-13)的研究成果之一。

哩(Bilibili,以下简称“B站”)等新媒体平台的开设,公共图书馆数字服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显示,截至2022年6月,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9.95亿,较2021年12月增长2 017万,占网民整体的94.6%。而弹幕视频网站是近年来新兴的网络视频平台,其中以B站使用率最高。根据2022年《哔哩哔哩Q2财报》^[3]显示,2022年第二季度B站月均活跃用户数达3.06亿,同比增长29%;日均活跃用户数达8 350万,同比增长33%。随着B站“知识区”的开通,B站被称为“Z世代的新式社交型学习平台”^[4]。B站强大的用户基数以及在知识传播领域较高的认可度,为公共图书馆通过弹幕视频网站拓宽公共文化服务渠道、铺开宣传推广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应积极利用弹幕视频网站传播阵地,扩展传播渠道,借助优质的视频内容和运营策略,提升内容传播效果,向用户宣传图书馆、推广文化信息资源与服务,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基于此,本研究通过调研公共图书馆B站账号,对账号内相关数据和内容进行分析,探讨当前公共图书馆B站运营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结合图书馆账号属性和B站平台特性提出相应优化策略,以期公共图书馆优化利用B站提供参考。

2 我国公共图书馆B站运营现状分析

2.1 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已开通B站的公共图书馆账号,借助B站搜索功能,以“图书馆”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剔除其中非公共图书馆账号,获得调研样本并进行数据采集和统计。本次调查数据采集时间截至2022年8月31日,调查内容包括公共图书馆B站账号的粉丝数、作品数、播放数、弹幕数、点赞数、投币数、收藏数、分享数等。同时,通过逐条浏览各公共图书馆B站视频内容,对视频内容主题进行识别和归类,并收集各公共图书馆B站账号视频中的弹幕内容,进行词频分析。

2.2 账号基本情况

通过上述检索途径和筛选策略,共获得42所公共图书馆B站账号的数据,涵盖省市区(县)等各级

图书馆。对图书馆B站账号名、归属地、级别和粉丝数等调查结果数据分析发现:①开通情况:开通B站账号的公共图书馆共42所,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截止到2021年底,全国公共图书馆数量达到3 215所^[5],全国开通B站账号的公共图书馆约占1.3%。②账号名称:大部分公共图书馆B站账号名和图书馆名称保持一致,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如湖北省、佛山市、虹口区等地区图书馆B站账号直接以湖北省图书馆、佛山市图书馆、虹口区图书馆命名;还有一部分图书馆会使用简称,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B站账号名为广西图书馆。③地域分布:开通账号的公共图书馆主要集中在华东和华南地区,分别为19所和9所,共占比66.7%,其他地区公共图书馆开通账号数量相对较少,其中东北地区没有公共图书馆开通B站账号。④图书馆级别:县区级公共图书馆开通账号数量最多,共21所,占比达50%;市级公共图书馆有13所,省级公共图书馆有8所。⑤粉丝数:上海图书馆粉丝数最多,达到44 000,是粉丝数排名并列第二的坪山图书馆和长沙图书馆的4倍;排名第三的陕西省图书馆粉丝数没有过万;粉丝数低于1 000的图书馆有30所,占比高达71.4%。

2.3 账号更新情况

本研究对比了样本账号近30天视频更新情况,发现15所公共图书馆新增视频数为0,占比35.7%;超过一半账号新增评论数、弹幕数、点赞数、投币数、收藏数和分享数均为0。进一步分析发现,部分图书馆视频运营基本陷入“停滞”状态,有成为“僵尸”账号的趋势,如海宁市图书馆于2020年6月11日注册认证,但注册后两年来未发布任何视频作品。

2.4 账号内容主题

笔者通过逐条浏览样本账号发布的视频,共计2 751条,对视频内容进行识别和归类,归纳统计出资源推荐(占比29%)、活动推广(占比13%)、知识科普(占比12%)、图书馆业务(占比6%)、读者互动(占比4%)、讲座类(占比31%)和其他(占比5%)7个主题^[6],对每种主题下涉及的视频内容进一步整理,形成公共图书馆B站视频内容主题分类表(见表1)。

2.5 账号传播指数

传播指数可用于衡量视频的传播和影响效果,传播指数越高,表明其传播影响力越大。本研究参考北京清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发布的B站视频传播

指数BVCII(Bilibili Video Communication Index)V2.0^[7],其指标体系涵盖发布情况、视频播放热度、用户互动反馈情况、账号粉丝数量四个维度。为更加全面地测量公共图书馆B站视频传播与影响效果,本研究

表1 公共图书馆B站视频内容主题分类

主题	内容
资源推荐	书籍推荐(主题书单、睡前故事、读书心得、说书评书、获奖图书、馆员荐书等)、影音推荐(电影赏析、音乐品鉴等)、数字资源推荐(电子图书、电子报刊、会议论文等)
活动推广	活动预告(一周活动预览、比赛预热、活动邀请函、展览预告、沙龙预告、讲座预告等)、活动现况(参赛作品、云游展览、活动结束倒计时、当天活动盛况等)、活动回顾(媒体总结报道、活动结束后的回顾、活动总结等)
知识科普	文化历史科普(历史名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日习俗、名家访谈)、医学科普(疫情相关知识、急救小常识等)、自然科学科普(自制或转载动植物科普小短片)等
图书馆业务	图书馆公告(开闭馆公告、网络升级、停车系统维护、退押金、免收滞纳金等)、图书馆工作(馆员工作、图书馆间业务合作、消防演练、馆员培训、会议、工会活动、扶贫下乡等)、图书馆指南(借书流程、疫情防控入馆须知、自助设备使用、图书馆楼层介绍、数字资源如何使用等)、图书馆宣传(图书馆ip形象、宣传片、阅读报告、图书馆特色介绍等)等
读者互动	互动采访(采访读者、考研加油打气等)、馆内拍摄(读者进馆排队、拍摄读者学习、馆内白噪音等)、学习直播(馆内学习慢直播回顾)等
讲座类	线上或线下开设的讲座、讲坛、公开课等
其他	节日祝福(元旦、中秋、国庆等节日祝福)、公益宣传片(禁毒宣传片、文明城市宣传片、学雷锋宣传片等)、时事热点(新闻报道转载、时事热评等)、自制小短片(风景、美食、名人旧址、剧情短片等)

将收集数据中的“弹幕量”“点赞量”“投币量”“收藏量”“分享量”5个反映用户典型互动反馈行为的指标作为“互动指数”的二级指标。由于多数公共图书馆B站账号开通时间较短,为便于统计和计算,将监测账号时间调整为账号开通至数据统计之时。原有的BVCII二级指标“账号新增粉丝数”则与“账号总粉丝数”数据相同,故不再重复统计,“互动指数”权重因此从30%调整为42%。由于评论可承载的信息和情感更为丰富,在语义、结构上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和严谨性,因此将原有二级指标“X3视频平均评论量”权重调整为22%,约占其一级指标权重的一半。由此形成了优化后的BVCII指数及其各维度和细分指标(见表2)。优化后的BVCII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BVCII = \{0.15 * \ln(X1+1) + 0.25 * \ln(X2+1) + 0.22 * \ln(X3+1) + 0.04 * \ln(X4+1) + 0.04 * \ln(X5+1) + 0.04 * \ln(X6+1) + 0.04 * \ln(X7+1) + 0.04 * \ln(X8+1) + 0.18 * \ln(X9+1)\} * 100$ 。

(X6+1)+0.04*ln(X7+1)+0.04*ln(X8+1)+0.18*ln(X9+1)*100。

参考上述指标与权重,将相关数据代入公式计算,得到42所公共图书馆B站账号的传播指数。综合分析视频数、播放量、评论量、弹幕量、点赞量、投币量、收藏量、分享量、粉丝数和传播指数几个指标可以发现:①BVCII指数:排名第一的是上海图书馆,其BVCII指数达到580,另一个指数突破500的为湖北省图书馆。整体上我国公共图书馆BVCII指数有半数集

表2 公共图书馆B站账号视频传播指数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标准化(X)	权重/%
发布指数(15%)	发布总视频数	$\ln(X1+1)$	15
播放指数(25%)	视频平均播放量	$\ln(X2+1)$	25
互动指数(42%)	视频平均评论量	$\ln(X3+1)$	22
	视频平均弹幕量	$\ln(X4+1)$	4
	视频平均点赞量	$\ln(X5+1)$	4
	视频平均投币量	$\ln(X6+1)$	4
	视频平均收藏量	$\ln(X7+1)$	4
	视频平均分享量	$\ln(X8+1)$	4
覆盖指数(18%)	账号总粉丝数	$\ln(X9+1)$	18

注:X1—X9分别表示监测时间段内B站视频账号上传视频总量、平均视频播放量、平均评论量、平均弹幕量、平均点赞量、平均投币量、平均收藏量、平均分享量和粉丝总量。

中在300—500之间,仍有20所公共图书馆指数处于300以下。②发布情况:陕西省图书馆发布的视频量以401条位居第一,但播放指数、互动指数和覆盖指数所涵盖的二级指标表现一般。坪山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和广西图书馆发布的视频量不足50条,其BVCII指数排名相对靠前,可见账号发布作品数与BVCII指数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③播放量:上海图书馆表现较为突出,其发布的230条视频平均播放量达到2461次,但各图书馆所发布视频的播放量差距明显。其中南沙区图书馆和金山区图书馆仅分别发布8条和7条视频,其视频平均播放量均超过1000次。另外约有半数图书馆的视频播放量集中在100—600之间,有5所图书馆的播放量均为0。④视频的互动数据:评论量、弹幕量、点赞量、投币量、收藏量和分享量,除上海图书馆各项指标数值排名相对靠前,其他图书馆各项数值偏低。

2.6 弹幕词频分析

笔者收集了42所公共图书馆B站弹幕内容,过

滤掉无效评论后,累计收集到有效数据3 316条,根据弹幕内容出现的频率绘制词频云图^[8]。调查发现,公共图书馆B站弹幕主要分为4种类型:①情感表达类(哈哈哈、牛啊、谢谢老师、好家伙、666、请收下我的膝盖等);②弹幕间互动类(1、霸屏、好耶、有人吗、有、没有等);③弹幕与视频互动类(读过、不知道、这叫繁忙、玫瑰、有道理等);④视频点评类(讲的太好了、声音小了、经典、目测会火、做的挺用心等)^[9]。

3 公共图书馆B站运营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3.1 账号开通率不高,区域分布不均衡

全国3 215所公共图书馆中,仅1.3%的图书馆开通了B站账号,账号开通率较低。42所已开通账号的图书馆中,上海市内图书馆占8所,广东省内图书馆占5所,而甘肃、江西、宁夏等地开通B站账号的图书馆数量为0,全国各省图书馆开通B站视频账号分布不均衡。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如下:①重视程度不足。B站视频业务相对于传统图书馆业务来说,属于较新的业务范畴,所投入的成本和精力较少^[10]。②各省市区(县)图书馆B站运营间缺少合作。各级图书馆在B站运营上的合作和交流较少,导致B站账号开通区域分布不均衡,尚未形成以省带市、以市推区(县)的运营模式。

3.2 账号活跃度较低,视频更新频率较慢

42所公共图书馆B站账号中,有15所图书馆近30天新增视频量为0,占35.7%,且超半数图书馆账号新增评论数、弹幕数、点赞数、投币数、收藏数和分享数均为0,账号整体活跃度较低,视频更新频率较慢。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如下:①未形成系统的运营管理模式。由于考核指标尚不完善、缺乏激励措施等原因,导致B站建设的积极性不高^[11]。②缺乏专业运营团队。图书馆B站账号的运营多由传统馆员兼职完成,缺乏专业的运营团队^[12]。

3.3 视频选题较为单一,视频制作缺乏创意性

在7个公共图书馆B站视频主题下,讲座类、资源推荐和活动推广3个主题视频占比高达73%,视频的选题多样化不足,其中讲座类主题占比31%,而该主题下多数为线上或线下讲座、讲坛等的录制视频,视频呈现形式较为单一,视频原创性不足。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如下:①视频的选题局限于图书馆传统

业务范畴。图书馆B站视频在主题选择上过于强调与图书馆业务挂钩,反而限制了视频的制作与发挥。②视频的制作与剪辑缺乏专业性和创意性。图书馆B站账号视频内的服装、剧本、布景等设备的呈现较为单薄,且缺乏专业的剪辑技巧,视频质感有待提升^[13]。同时图书馆账号内的原创视频较少,视频多为录制、转发和图片的叠加。

3.4 账号运营数据不佳,公共图书馆品牌影响力不足

通过综合播放量、评论量、弹幕量、点赞量等指标评价,公共图书馆B站账号BVCi指数突破500的仅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两所,47.6%的图书馆BVCi指数在300以下,且71.4%的图书馆粉丝数低于1 000。当前图书馆B站账号整体的运营效果不佳,账号指标数据有待提高,缺乏品牌影响力。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如下:①未针对B站主要用户群进行内容创作。B站以二次元起家^[14],其主要用户群较为年轻,具备一定个性和趣味性的视频更符合该类用户群体的需求^[15]。图书馆B站账号的视频选题多同质化,对年轻人吸引力不足。②尚未形成图书馆品牌特色。各图书馆间,图书馆与B站官方间缺乏合作,图书馆品牌形象尚未树立,品牌特色和品牌影响力明显不足^[16]。

3.5 用户参与度较低,互动性较弱

42所公共图书馆B站账号中,有30所图书馆平均每条视频的弹幕量不足1条,占比73.9%;有36所图书馆平均每条视频的评论量不足2条。视频弹幕量和评论量是视频互动的重要指标,当前的两项指标数据不高。同时,通过浏览抓取后的弹幕内容发现,哈哈、1、来了、霸屏等流行词占比较大,而针对视频内容的评价、点评较少。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如下:①视频内互动元素较少。视频中互动元素的出现,可增加视频的活跃度^[17]。当前图书馆B站视频中缺少留白、设问等与用户的互动交流部分,同时可参与讨论的视频话题较少。②图书馆线上线下服务场景未有效融合。针对B站用户举办的线下专门活动较少,同时到馆的用户能通过B站参与的互动服务较少。

4 公共图书馆B站运营优化策略

4.1 重视B站平台建设,打造新媒体宣传矩阵

在B站平台建设上:①主动布局B站。随着抖音、微博、微信、B站等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在媒体融合

大背景下,公共图书馆仅靠传统的推广手段难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应重视B站平台的建设,充分利用弹幕视频网站提供公共文化服务。②将B站账号运营纳入部门任务清单中。以月度、季度、年度为单位,统计B站运营数据,设立合理的任务目标,以任务驱动的形式推动图书馆B站账号的发展。

在打造新媒体宣传矩阵上:①打造省内公共图书馆B站账号矩阵。由省级公共图书馆牵头,带动市区(县)级图书馆开通B站账号,省级图书馆可采用发布视频话题、视频接力、视频共拍等形式,邀请市区(县)图书馆参与视频制作,共同建设和完善省内图书馆B站账号矩阵,形成宣传合力。②整合多渠道新媒体平台。形成以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快手、微视频、B站等各个新媒体平台为一体的新媒体矩阵,统一运营团队和部门,便于新媒体账号的内容统一性和一致性,减少不同平台重复运营的成本,针对内容有针对性地进行编辑与剪辑,选择合适的平台进行发布。

4.2 完善运营管理体制,扩充新媒体专业队伍

在完善运营管理体制上:①明确职责划分。根据已有组织架构,明确B站等新媒体平台运营工作部门职责的归属。②完善奖励机制。可采取设立优秀新媒体宣传推广个人、优秀新媒体推广案例评选等形式,给予一定的精神物质奖励。

在扩充新媒体专业队伍上:①填补新媒体专业人才空缺。一方面,通过在岗位招聘中设置相关专业,引进视频剪辑、编导、设计、新闻等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可在馆内选拔和培养现有馆员。②成立2至3人新媒体工作团队。B站视频的发布需经历视频创意、素材收集、视频剪辑、文案编辑等环节,团队的成立可以发挥团队内成员的专长,提高效率。

4.3 打造图书馆特色视频,优化视频呈现形式

在打造图书馆特色视频上:①打造“图书馆+”新IP。公共图书馆B站视频除了考虑与图书馆传统业务相结合,还可尝试将图书馆与不同词组进行搭配,打造“图书馆+”新IP。如“图书馆+文化”的主题,从家乡开始介绍文人学者的辉煌人生。又如“图书馆+摄影”的主题,拍摄图书馆内的书香气息、图书馆周边的风景美食等。②制作具有图书馆地方特色的视频。不同省市区(县)图书馆都有其地方特色,在制作B站视频时,可融入地方特色,进一步扩展选题。如,湖北省图书馆与地方戏曲文化相结合,围绕

黄梅采茶戏、楚剧、荆州花鼓戏、湖北大鼓、湖北评书、汉滩小曲、汉川善书等进行视频创作。

在优化视频呈现形式上:①优化视频的拍摄与剪辑手法。可投入一定的资金,升级所需设备,如采购补光灯、手持云台、古装道具等。另一方面,负责B站的馆员需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可将动作顺接剪辑、交叉剪辑、匹配镜头等常见技巧运用在B站视频制作中。②在视频中融入B站流行元素。将B站热门话题、热门元素、热门音乐、热门表情包等元素运用到图书馆B站视频中。

4.4 抓住B站用户特点,挖掘图书馆品牌影响力

在抓住B站用户特点上:①结合二次元文化提升视频活力。公共图书馆B站视频可与二次元相结合来增加视频的吸引力。如将游戏《原神》融入视频制作中,《原神》中的一些游戏场景还原了张家界、凤凰古城、悬空寺等实景,可将游戏场景和现实场景进行比对,介绍其背后的历史文化。②邀请用户参与视频共建。图书馆可发起B站视频共创活动,邀请用户参与视频投稿,如在B站设立活动专栏,发起“我和图书馆的故事”“图书馆随手拍”等视频投稿主题活动。

在挖掘图书馆品牌影响力上:①强化图书馆IP形象。公共图书馆可结合已有的Logo、吉祥物等,针对自身图书馆品牌定位设计或强化品牌IP,融入到视频制作中。如湖北省图书馆的IP形象是一个穿着古装名叫“鄂小图”的卡通女子,可用“鄂小图”的卡通形象制作荐书视频等。②与文化场馆联动提高品牌影响力。图书馆可与博物馆、文化馆进行联动,发起品牌文化共创活动,共同制作视频。如陕西省图书馆与陕西省博物馆进行联动,制作陕西省文化遗产主题视频,结合陕西省图书馆内《碛砂藏》《襄阳郡志》《禹贡详略》等地方文献和陕西省博物馆战国杜虎符、《狩猎出行图》《阙楼仪仗图》等地方文物进行视频创作。

4.5 引导用户交流互动,整合图书馆线上、线下服务场景

在引导用户交流互动上:①参加平台主题活动。公共图书馆可参与B站各类主题活动,获得视频流量扶持和更多的曝光机会。如B站在开学期间增设的“开学季”板块,图书馆可在发布视频时带上“开学季”的话题标签,剪辑开学书籍推荐、新生入学指南等视频。②增设视频中的互动元素;图书馆一方面可

在视频内设置提问、抽奖等互动元素;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回复用户的弹幕和评论等信息,形成良好的互动氛围。

在整合图书馆线上、线下服务场景上:①图书馆与直播相结合。直播是当前新兴的新媒体传播形式,B站也早已开放直播功能,可尝试将图书馆与直播相结合。如湖南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等推出的“云同桌”直播,在图书馆内选取一块公共区域作为云陪伴直播阅读区,设立直播提示牌,通过实时直播所在区

域读者的学习状态,让未到馆的用户也能拥有沉浸式学习体验。②吸引B站用户到馆参加线下活动。各地公共图书馆B站账号服务对象多为本地用户,可尝试吸引更多的B站用户走出线上到所在地图书馆内来。如,举办图书馆B站线下沙龙,由用户向图书馆B站账号发送私信报名参加,每期选取当下B站流行话题,参与讨论;举办图书馆B站寻宝活动,图书馆B站账号上会定时发布指定书籍,用户在图书馆内找到指定书籍可至兑奖处换取奖品等。

参考文献:

- [1] 熊远明,白雪华,吴建中,等.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图书馆的专业阐释与使命践行[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2(4):4.
- [2]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2-10-15].<http://www.cnnic.net.cn/n4/2022/0914/c88-10226.html>.
- [3] 搜狐新闻.哔哩哔哩2022年Q2财报:B站日活跃用户达8350万,效果广告稳定增长[EB/OL].[2022-10-15].https://www.sohu.com/a/583589934_120478947.
- [4] 冯钰茹,邓小昭.弹幕视频网站用户弹幕评论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以Bilibili弹幕视频网站为例[J].图书情报工作,2021(17):110-116.
- [5] 人民政协网.我国90%以上的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EB/OL].[2022-10-15].<http://www.rmzxb.com.cn/c/2022-10-14/3219924.shtml>.
- [6] 韩世曦,曾粤亮.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抖音短视频运营现状调查分析[J].图书馆学研究,2021(12):10,30-37.
- [7] 清博指数.B站视频传播指数BVCI(V2.0)[EB/OL].[2022-10-15].<https://www.gsdata.cn/site/usage-8>.
- [8] 杨九龙,鲍慧璐.用户在线评论省级公共图书馆内容挖掘与情感分析[J].图书馆学研究,2021(21):10-17.
- [9] 陈亿金,梁锦玲,古婷骅.新闻视频弹幕用户情感体验特征分析[J].图书与情报,2021(4):75-83.
- [10] 肖铮,陈丽琴,黄国凡.后疫情时期高校图书馆哔哩哔哩网站运营策略研究[J/OL].图书馆杂志:1-8[2022-10-15].<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1.1108.G2.20210715.1726.006.html>.
- [11] 汤正午.我国高校图书馆应用弹幕视频网服务现状调查:以Bilibili网为例[J].图书馆学研究,2021(3):25-36.
- [12] 熊妩媚,许秦.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视频平台运营现状分析:以哔哩哔哩为例[J].图书馆学研究,2021(15):23-32.
- [13] 陈维.图书馆抖音号运营优化策略探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8):96-101.
- [14] 陈峻俊,符家宁,汪凌宇.互动与满足:B站ACG亚文化群体认同风格与行为动因分析[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2(2):103-113.
- [15] 许秦,孟祥保,顾建新.社会化视频推荐书目特征及其动因研究:以哔哩哔哩“读书等身”活动为例[J].图书情报工作,2021(16):56-64.
- [16] 高志立,余鹏彦.基于用户行为的图书馆B站官方账号影响力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8):104-109.
- [17] 欧梨成,张帆,陈培颖.传播学视域下科技期刊短视频平台运营策略探析:以抖音、哔哩哔哩和微信视频号为例[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2(1):58-66.

作者简介: 韩世曦,宁波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公共文化服务; 李金伟,现工作于浙江图书馆,研究方向为公共文化服务。

收稿日期: 2023-04-18

本文责编: 孙晓清

· 探索与创新 ·

ChatGPT赋能高校图书馆智能咨询服务研究^{*}

王超 潘雪峰

(辽宁工业大学图书馆 辽宁锦州 121001)

摘要: 文章以“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为例,了解高校图书馆智能咨询的发展现状,并从运行原理角度提出ChatGPT作为基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模式的聊天机器人程序可以应用于高校图书馆智能咨询服务工作。ChatGPT可快速提升咨询服务效率,与元宇宙技术结合为读者提供沉浸式体验,并在GPT-4技术的驱动下实现咨询服务的智慧化。

关键词: ChatGPT; 高校图书馆; 智能咨询; 读者服务

中图分类号: G252.61

文献标识码: A

Empowering Intelligent Consultation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with ChatGPT

Abstract The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contemporary landscape of intelligent consultation by taking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libraries as a case study. From an operational standpoint, it puts forth the utilization of ChatGPT, a chatbot program based on deep learning model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enhancing the efficacy of intelligent consultation service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ChatGPT exhibits the ability to swiftly elevate the efficiency of consultation services, seamlessly integrate with metaverse technologies to offer readers immersive experiences, and realize the intellectualization of consultation services driven by the cutting-edge GPT-4 technology.

Key words ChatGPT; university library; intelligent consultation; reader services

1 引言

智能咨询服务在高校图书馆中的应用已经相当普遍,而德国汉堡大学是最早使用智能问答系统的高校之一。该校于1989年建立了一个名为“Kulturportal HAM”的网站,提供了多种智能咨询服务,包括知识问答、文献检索等。我国最早的图书馆自动问答系统是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研发的一款名为“知识库”的问答系统。该系统采用了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表示技术的方法,能够回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该系统在1990年代末开始应用于中国

科学院图书馆,并开始逐渐推广。目前,许多高校图书馆都建立了自动问答系统,例如清华大学图书馆^[1]的“知网问答”、北京大学图书馆^[2]的“智库”等。这些系统不仅提高了咨询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知识信息。从智能咨询服务的本质来看,它主要涉及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知识图谱技术、机器学习技术等多个领域的应用^[3]。目前图书馆的咨询服务大多是通过用户对用户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再结合知识库中的信息,给出准确的答案或建议。因此,文本处理和语义扩展是智能咨询服务的核心技术之一。

2022年11月,OpenAI发布了一款名为ChatGPT

^{*} 本文系2021年辽宁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项目“基于空间再造视域下的图书馆服务实践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LTB202107)的成果之一。

的智能聊天机器^[4]，一时间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ChatGPT是文本类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够与使用者在同一语境下持续聊天，相较于以往的智能聊天机器人回复用户问题更具有连贯性好、逻辑性强的特点，并且响应速度更快。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给高校图书馆智能咨询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

2 高校图书馆智能咨询现状及服务内容

2.1 高校图书馆智能咨询现状

教育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5]中共涉及147所高校。截至2022年6月，在147所高校图书馆中，有32所高校图书馆以官网、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开展智能咨询服务，占比约21.77%。比较有代表性的除了前文提到的清华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智能咨询系统外，还有如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问吧机器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的“小安”、武汉大学图书馆的问图机器人、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小智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的“小叮当”等，都是比较智能的问答机器人。

2.2 高校图书馆智能咨询服务内容

研究者在了解“双一流”高校图书馆服务现状的基础上，对于部分图书馆的智能咨询服务内容作进一步调研。选取的对象既包括世界知名的综合大学，又包括重点建设地方高校以及高水平特色高校，如表1所示。

尽管目前高校图书馆的智能咨询机器人在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其信息处理能力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如能够支持语音的咨询较少，语音识别的准确度也不高，此外，尽管多数高校图书馆咨询系统支持图片或文件格式的咨询，但机器人并不能准确识别图片或文件中的信息，经常需要馆员客服介入。在人机交互方面，目前高校图书馆仍以非实时咨询为主，即读者先留言然后等待馆员客服回复，但普遍存在无法及时响应、等待时间长的问题。此外，在拓展功能方面，仅南京大学图书馆、东南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咨询系统具有如查公交、天气、汇率，发布校园资讯，查看机构知识库等的拓展功能。

ChatGPT的出现为解决上述问题带来了新的希

表1 部分“双一流”高校图书馆智能咨询服务内容

高校图书馆名称	常规问题	咨询形式			导航指引	评价机制	人机配合模式		拓展功能	备注
		图片	语音	文件			留言模式	转接模式		
清华大学图书馆	√	√		√	√	√	√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	√		√	√	√	√			
南开大学图书馆	√	√		√	√	√	√			可转接人工客服
天津大学图书馆	√				√	√	√	√		
南京大学图书馆	√				√	√	√		查公交、天气、汇率	快乐聊天功能
东南大学图书馆	√				√	√	√		校园资讯和讲座信息	
山东大学图书馆	√	√			√	√				部分功能测试中
武汉大学图书馆	√					√	√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	√		√	√	√	√			偶尔答非所问
四川大学图书馆	√	√		√	√	√			今日头条资讯	
重庆大学图书馆	√					√	√	√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	√	√	√	√	√				可转接人工客服
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	√	√	√	√		√	√			
郑州大学图书馆	√		√			√	√	√	查看机构知识库	
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	√				√	√	√		可多轮对话	某些功能需机构登录信息
									查看机器人的数据统计、提供校内各部门电话、地图	

注：“√”表示有此项功能。

望,通过借助开放接口等途径,可以使解决行业智能咨询需求成为可能。ChatGPT是一种基于大规模预训练的语言模型,具有非常强大的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它可以通过学习海量的文本数据来理解语言的上下文情景,并能够生成符合语法和语义规则的自然语言文本。如将ChatGPT应用于智能咨询中,可以通过对其进行针对性的优化和调整,从而提高智能咨询系统的精度和效率。

3 ChatGPT工作原理介绍

3.1 ChatGPT模型的发展过程

ChatGPT是GPT-3.5模型的微调版本,使用RLHF(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训练的文本生成式的对话机器人,其中GPT-3.5是一系列模型的统称,包括code-davinci-002、text-davinci-002、text-davinci-003等。2017年Google团队提出了Transformer(转换器)模型,该模型使用自注意力(Self-Attention)结构取代了传统的循环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结构^[6]。自注意力机制允许模型在不同位置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从而允许信息在不同位置之间直接传递,这使得Transformer模型可以并行计算,避免了RNN模型的梯度消失或梯度爆炸问题。相比RNN网络结构,Self-Attention结构的优点不仅在于其能够进行并行计算,还在于它能够更好地捕捉输入序列中的长距离依赖信息。这使得Transformer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任务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模型^[7]就是Transformer架构的语言预训练模型。2018年6月GPT-1模型问世,主要用于语言推理、文本生成和问答。2019年GPT-2问世,它是一种比GPT-1模型更大、更强大的语言模型,可以完成有监督学习任务^[8]。2020年,在GPT-1模型和GPT-2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人员继续改进和扩展,推出了GPT-3模型,GPT-3模型具有了更大的规模和更多的训练数据(45TB的文本语料库),模型的表现力和泛化力更强。在GPT-3模型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微调,先后出现了WebGPT、InstructGPT和GPT-3.5等模型。ChatGPT是在GPT-3.5的基础模型code-davinci-002基础上,经过InstructGPT模型生成text-

davinci-002模型后进行微调得到的模型^[9]。

3.2 RLHF框架下ChatGPT模型的训练过程

RLHF(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框架下ChatGPT模型的训练过程可以分解为三个核心步骤:预训练语言模型(Language Model, LM)、收集数据,训练奖励模型,还有使用强化学习对LM进行微调。如图1所示,训练过程中涉及三种模型,分别为SFT(Supervised Fine-Tuning,监督微调)模型、RM(Reuseard Model,奖励)模型、PPO(Proximal Policy Optimization,近端策略优化)模型。其中SFT模型基于人工标注数据经过监督微调创建原始模型;RM模型通过打分训练反馈模型;基于SFT模型获得PPO模型的初始参数,应用RM模型对PPO模型产生的多个答案进行评分判断直至收敛,完成ChatGPT模型训练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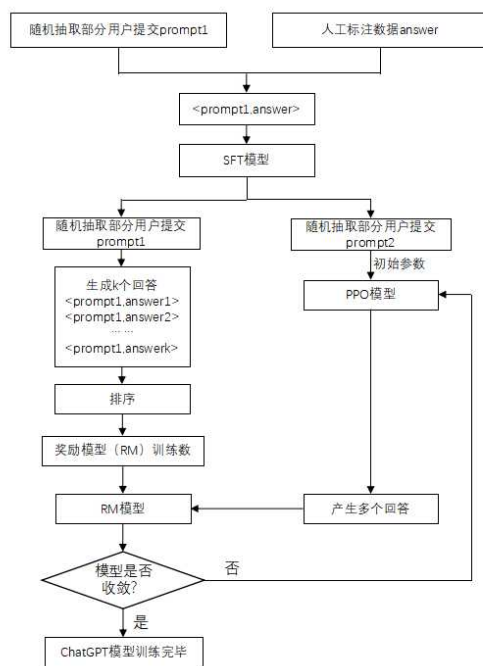


图1 RLHF框架下ChatGPT模型训练过程

在图1中,RLHF框架下ChatGPT模型的训练过程为:

首先进行ChatGPT模型训练。

第一步:随机抽取部分读者提出的问题,结合标准答案形成问题和答案的数据对。应用这些数据对微调GPT-3.5模型,获得SFT模型。

第二步:将SFT模型获得的回答参照标准答案进行相关性计算,并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由此获得RM

模型的训练数据,经过不断地优化,形成RM模型。

第三步:随机抽取新的读者提问数据,输入到SFT模型,得到的回答作为PPO模型的初始参数,并获得相应回答,将这些回答数据输入到第二步训练好的RM模型进行排序,并不断地更新PPO模型参数,直至收敛,获得图书馆智能咨询服务ChatGPT模型。

值得注意的是,模型的训练过程的确需要大量的数据和算力支持,因此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对于高校图书馆而言,构建SFT模型和RM模型的资金投入相对较低,因为这些模型需要的计算资源和数据规模相对较小。尽管如此,资金投入仍然是构建SFT和RM模型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这对于一些资金有限的图书馆来说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困难。总之,从运行原理角度看,ChatGPT是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技术,它通过多层神经元之间的相互连接和信息处理,从而实现对数据的高效分类、识别和预测。在高校图书馆智能咨询服务中,ChatGPT可以将读者的提问进行语义分析和理解,然后根据预先训练好的模型和数据,给出相应的答案或建议。同时,ChatGPT还可以通过不断地学习和优化,提高自己的回答准确性和效率。

4 ChatGPT对高校图书馆咨询服务的影响

4.1 ChatGPT赋能咨询服务实时高效

ChatGPT作为复杂适应系统语言模型,具有很强的泛化能力和适应性。通过预训练模型的学习,可以对各种自然语言处理任务进行有效的学习和推理,从而在面对新的问题时能够快速做出响应。此外,由于ChatGPT是基于Transformer架构的语言模型,它还具有很好的并行计算能力,可以在毫秒级别内对问题做出即时应答。ChatGPT的即时性和临场感相比其他人工智能咨询工具确实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读者输入完相关问题后,对话框中的字符跳动和回答生成的速度都非常快,可以让用户感受与“真人”聊天相似的互动感,从而拉近了人机的距离^[10]。因此,ChatGPT的出现为改善高校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在传统的参考咨询服务中,面对读者的专业咨询问题时,通常需要馆员人工处理且回答速度也较慢,对于某些专业化的问题需要求助资深馆员或学科专家。而ChatGPT作为一种强大

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可以快速理解读者的咨询问题,并且根据自己的预训练模型和丰富的知识库提供准确、全面的答案和建议。此外,ChatGPT还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与读者进行互动,了解用户的反馈和需求,从而不断优化自身的回答和服务。这使得ChatGPT在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中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可以帮助图书馆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

4.2 ChatGPT与元宇宙技术相结合赋能沉浸式咨询

ChatGPT是一种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用于智能对话、文本生成和语言理解等任务。元宇宙技术则是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综合应用,可以为读者提供沉浸式的体验。将ChatGPT与元宇宙技术相结合,可以赋能全智慧咨询。具体来说,这种结合可以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1)智能问答:ChatGPT可以作为智能问答系统的核心技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快速准确地回答用户的问题。而元宇宙技术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等方式,将答案呈现给用户(读者),提高交互的沉浸感和效果。(2)虚拟导览:元宇宙技术可以为读者提供沉浸式的虚拟导览体验,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场馆设施、服务空间等场所,其中ChatGPT可以作为导览系统的语音助手,帮助读者获取更多信息并提供个性化的服务。(3)智能推荐:ChatGPT同样是智能推荐系统的核心技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读者的兴趣爱好和需求,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推荐服务,并以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等方式,将推荐内容呈现给读者,提高交互的沉浸感和效果。综上,ChatGPT与元宇宙技术的结合可以为全智慧咨询带来更多的创新和发展机会。

4.3 ChatGPT赋能咨询服务智慧化

ChatGPT是基于多模态预训练大模型GPT-4开发的一种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它可以接受文本和图像形式的PROMPT,并允许用户指定任何视觉或语言任务。这意味着用户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与GPT-4进行交互,从而实现更灵活、更个性化的智能咨询服务。另外,GPT-4还具有增加文字输入长度限制的功能,这有助于摆脱问题论述方面的数字屏障,使高校图书馆智能咨询服务能够实现信息内容最大化输入和输出,从而可以减轻馆员的工作负担,加快咨询服务的整体工作流程。在使用ChatGPT

生成内容的过程中,读者提出问题的重要性确实不容忽视,这是因为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它们需要基于已有的数据和知识进行学习和推断,而这些数据和知识通常是有限的。因此,当读者提出一个问题时,ChatGPT可能无法直接回答或者给出不准确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读者需要自我审视并学习如何更好地使用AI工具。

ChatGPT赋能的咨询服务对高校图书馆和读者是双赢局面。对于图书馆而言,利用 ChatGPT等人工智能工具来实现机器咨询服务的智能化,从而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帮助读者解决问题并提供更好的学习支持;对于读者来说,ChatGPT可以帮助他们提升创新能力,通过人机交互和沟通,读者可以获取到各种知识和信息,从而启发他们的思考和创造力。此外,ChatGPT等工具还可以帮助读者快速获取答案和解决问题,从而节省时间和精力,使他们更加专注于创新和探索。总之,高校图书馆应该充分利用人工

智能工具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同时读者也可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5 结语

2022年末,预训练大模型ChatGPT爆红网络,随之而来的,如百度的“文心一言”、微软的“Newbing”、科大讯飞的“讯飞星火”等同类产品相继推出。但就目前情况而言,ChatGPT作为GPT-4技术的代表,系统运行较为稳定而且已经开放端口,尽管其大规模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从已有测试结果看偶尔会出现盲目“自信”答非所问的情况。但不可否认,ChatGPT作为一种新型的人工智能技术,为图书馆智能咨询服务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相信ChatGPT将会在图书馆智能咨询服务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姚飞,纪磊,张成昱,等.实时虚拟参考咨询服务新尝试:清华大学图书馆智能聊天机器人[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1(4):77-81.
- [2] 沈奎林,邵波,赵华.利用微信构建图书馆智能问答系统[J].图书馆学研究,2015(8):75-80.
- [3] 张乐.词向量语义扩展技术在图书馆智能咨询系统的应用与实现[J].图书情报工作,2020,64(18):126-136.
- [4] 张夏恒.ChatGPT的逻辑解构、影响研判及政策建议[J/OL].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1[2023-04-03].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30224.002>.
- [5]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EB/OL].[2022-02-14].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s7065/202202/t20220211_598710.html.
- [6] CHRISTIANO P,LEIKE J,BROWN T B,et al.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preferences[J].IEEE Transaction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2017,32(12):5369-5378.
- [7] Improving Language Understanding by Generative Pre-Training [EB/OL].[2018-06-09].https://s3-us-west-2.amazonaws.com/openai-assets/research-covers/language-unsupervised/language_understanding_paper.pdf.
- [8] RADFORD A,WU J,CHILD R,et al. Language Models are Unsupervised Multitask Learners[J].OpenAI blog,2019(1):8-9.
- [9] 钱力,刘熠,张智雄,等.ChatGPT的技术基础分析[J/OL].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1-12[2023-03-30].<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0.1478.G2.20230324.1112.002.html>.
- [10] 郭亚军,郭一若,李帅,等.ChatGPT赋能图书馆智慧服务:特征、场景与路径[J/OL].图书馆建设:1-16[2023-05-11].<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3.1331.G2.20230406.1553.004.html>.

作者简介:王超,硕士,辽宁工业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智能计算与图书馆信息化建设;潘雪峰,硕士,辽宁工业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智能计算与图书馆信息化建设。

收稿日期:2023-04-06

本文责编:李芳

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合建分馆的发展路径选择：一项定性的比较分析

吕 果

(广州图书馆 广东广州 510623)

摘 要：社会力量参与或合作建设图书馆，是“引导社会资源进入公共领域”在图书馆行业的具体实践。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合建分馆发展水平的高低与经费保障、服务项目、专职馆员、公众需求等因素紧密相关。文章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广州市12个合建分馆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单个条件变量并不构成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的必要条件，但服务项目在影响合建分馆发展成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存在2条产生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的组态路径和另外2条导致非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的组态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为合建分馆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公共图书馆；社会力量；合建分馆；高质量发展；定性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G258.2

文献标识码：A

Development Path Selection for Public Library Branches Co-Constructed with Social Power: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Abstract The involvement or collaboration of social sectors in library construction is a concrete practice of "guiding social resources into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library industry.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y branches co-constructed with social sectors is closely related to factors such as funding guarantees, service projects, dedicated librarians, and public demand. This article applies th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using fuzzy sets to empirically analyze 12 cases of co-constructed branches in Guangzhou. The study reveals that individual conditional variables do not constitut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high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of co-constructed branches, but service projec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luencing their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Furthermore, two configuration paths leading to high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of co-constructed branches and two configuration paths resulting in non-high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are identified. The article provides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selecting a development path that aligns with the practical needs of co-constructed branche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social power; co-constructed branc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1 引言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1]。因此，

公共图书馆事业现阶段必须转型适应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和社会效益，以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2]。然而，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对公共图书馆人力、物力、财力的保障不足将会是常态，社会化是必然选择^[3]。于是，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

设，便成为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可行性尝试。

2015年5月,《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出台,其中规定公共图书馆可以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吸纳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图书馆的运营与管理。据此,广州市公共图书馆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原则,采取文教融合、文商融合、文企融合等方式,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的模式。2019年3月,广州市印发《广州市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合建分馆工作指引》,将社会力量合建分馆纳入总分馆服务体系,实行统一规则、统一服务。截至2021年底,广州市各级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合建分馆达104个,年接待读者超过百万人次,投入空间资源6.78万平方米,配备专职工作人员137人^[4]。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市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合建分馆在实际发展中并不均衡,特别是在资金投入、服务创新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导致不同合建分馆的发展水平呈现两极分化的局面。目前,学界对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的合作方式、志愿服务、法人治理等方面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对影响合建分馆发展的具体因素却未有太深入的讨论。由此,为进一步加深对合建分馆发展状况的理解以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美国社会学者查尔斯·拉金提出的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方法,结合定性和定量方法各自的特点,对影响合建分馆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

2 文献综述

社会力量是指除政府机关和下属文化事业单位以外的个人和组织^[5]。目前,关于社会力量参与共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状况研究正逐步受到关注。

杭州图书馆团队考察了英、美、日等国公共图书馆中的社会力量发展情况,提出法律政策制度配套完善、社会力量类型丰富、保持图书馆的公益性和专业性、重视过程的监督和评估是国外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的成功经验^[6]。李杨等人以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的馆店融合发展为例,认为政策支持、社会需求、资金保障、业务关联、文献数量庞大和多种服务方式等因素,应是馆店合建的城市阅读空间取得良好成效的重要条件^[7]。张靖等人基于广州市黄埔区合建分馆的发展实践,总结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

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三条经验:确保政府主导、倡导互惠共赢、保障专业建设^[8]。黄莺则系统梳理了社会力量参与上海市嘉定区“我嘉书房”等公共图书馆建设实践,指出法律保障、服务质量监管、可持续的合作机制等是影响图书馆发展成效的重点因素^[9]。邓卿也通过194份调查问卷,实证分析了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图书馆建设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管理主体、政策法规、资金实力、参与渠道对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图书馆建设意愿均具有显著影响^[10]。

社会力量办馆的专业能力建设是学界重点讨论的问题^[11]。白玉静以北京地区公共图书馆为例,提出社会力量要针对从事图书馆业务的员工有长期培养与培训计划,要不断提升业务骨干的专业水平^[12]。张守卫建议要给予社会力量专业培训,培养其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供给的服务质量^[13]。沈丽红等人认为社会力量参与“运河书房”建设的关键在于管理人员的综合服务能力,其决定了“运河书房”的整体服务质量^[14]。陆和建等人也持有相似的观点,赞同社会力量的专业能力关系着提供图书馆服务的质量和成效,并呼吁重视对优质社会力量的培育,最后还总结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服务建设的成功因素:包括打造特色品牌活动、创新宣传推广模式、设立规范化管理标准等^[15]。此外,彭秋平等人在探讨广州“图书馆之城”建设的模式、问题和经验的基础上,发现工作人员的稳定性和专业性、服务内容的多样化、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总馆有效支持程度等条件对合建分馆的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6]。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拓展和深化了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的认识。但其中对合建分馆的发展探讨仍然以描述分析或经验总结为主,缺乏更为微观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合建分馆的发展水平是由多个复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既有研究思路通常使用回归分析方法,以检验影响合建分馆建设成效的单一条件因素,这便导致了研究结论的解释力度相对不足。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QCA是一种基于布尔代数的集合论组态分析

方法,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拉金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17]。QCA关注多个原因变量与某给定结果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旨在找到导致给定结果相关的条件属性的组态,组态是一组具有协同性质的原因变量,用以映射观察到的结果^[18]。按照集合形态的不同,QCA主要分为两类: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risp-sets QCA, csQ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s QCA, fsQCA)。其中,csQCA是将变量转换为“1”和“0”的二分变量。fsQCA则是取“1”或“0”之间的部分隶属分数,即评估条件在“不完全隶属”与“完全隶属”间的隶属程度。

本文选择QCA方法的主要依据,一是目前符合研究要求的合建分馆案例有限,达不到定量分析的样本量标准,而QCA对样本量和数据来源要求较低,比较适合中小样本的分析讨论;二是影响合建分馆发展成效的内外因素较多,本文主要目的是探索这些因素的条件组合及其强弱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QCA所采用的集合论分析更为恰当。另外,鉴于本文所选择的样本案例特征,并不能完全根据清晰集的“1”或“0”来进行逻辑划分,所以最终采用了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

3.2 案例选择

2019年10月,由广州零点有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的《广州市公共图书馆第三方评估报告》^[19](以下简称《第三方报告》)顺利完成。其中合建分馆参照《广州市街镇图书馆第三方评估指标》参与本次评估。《第三方报告》采用场馆自评与第三方机构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从图书馆的设立、图书馆的管理、图书馆的服务三个方面对参评的合建分馆进行了全面评估,评估过程和评估结果具有科学性和专业性。据此,本文选定以《第三方报告》中参与评估的12个广州市合建分馆作为研究案例。

3.3 变量及赋值

3.3.1 结果变量

本研究所关注的结果是合建分馆的发展成效,即合建分馆在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效果。基于案例的选择情况,本文将《第三方报告》中对合建分馆的建设成效评估分作为衡量其发展水平的指标。

3.3.2 条件变量

考虑到数据的有限多样性问题,QCA模型中的条件变量需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根据有关研究,包含

4条件的QCA模型应至少包含12个案例^[20]。据此,本文综合现有文献、理论及假设,选取经费保障、服务项目、专职馆员、公众需求因素作为条件变量。

(1)经费保障。激励社会力量多渠道、多主体投融资,可有效支持公共文化的发展^[21]。充足且稳定的经费投入是合建分馆所需资源、人员及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广州图书馆中心图书馆办公室于2020年通过《广州市社会力量分馆合作方调查问卷》对社会力量合作方进行了调查统计,本文即选取该问卷中社会力量年投入各类资源的总金额来作为评估其经费保障水平的指标。

(2)服务项目。要提升社区图书馆的服务效能,除了提供传统服务,还需要更新服务理念,探索与信息化环境相适应的新型服务和延伸服务^[22]。本文根据《广州市社会力量分馆合作方调查问卷》,选取其中合建分馆所能提供的服务项目数量,并以此作为服务内容多样化的测量指标。

(3)专职馆员。多样化参与主体的引入,可弥补基层图书馆人员不足、素质不高、专业不精等问题^[23]。馆员业务能力对合建分馆的服务质量具有直接影响。本文人力资源水平主要通过合建分馆是否配备了专职的图书馆员来进行衡量。在赋值过程中,采取清晰集的赋值方法,根据《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年度报告2021》,如果合建分馆拥有专职馆员,则赋值为1,若只有兼职馆员,则赋值为0。

(4)公众需求。读者需求是基层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24]。随着公众对美好生活和文化活动需求的不断增长,图书馆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的动力也会相应提升。据此,本文以《广州市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中的街道常住人口数作为衡量公众需求水平的指标,如果合建分馆所属的街道人口数高,则表明该分馆辐射范围的公众对于图书馆服务有更多的需求。

4 实证分析

4.1 数据处理

在fsQCA中,首先要对数据进行校准(calibrating),即将案例的某一变量值校准为0至1的模糊集隶属度。本文采用拉金提供的直接校准法^[25],并参考既有研究的处理方式^[26],把样本数据的95%分位数和5%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和“完全不隶属”锚点,同

时把模糊隶属度为0.5的点作为“交叉点”锚点。由于专职馆员采取的是1、0的清晰集赋值方法,因此不做模糊集隶属度的校准。另外在校准过程中,如得到与变量赋值数据相同的锚点,可导致校准对应数据的缺失。故本文根据锚点数据的上下数值分布情况,采用统一加减数值的方式来处理此问题^[27]。各变量赋值数据的锚点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基于此,利用fsQCA3.0可对变量赋值数据进行校准。

表1 变量的校准阈值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校准阈值		
		完全隶属(0.95)	交叉点(0.5)	完全不隶属(0.05)
结果变量	发展成效	793.65	678.50	538.70
条件变量	经费保障	201.80	51.20	20.06
	服务项目	5.45	4.05	2.05
	公众需求	18.26	9.56	4.13

4.2 必要条件分析

数据处理完毕后,再对各个条件进行必要性分析,即衡量单一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释程度,通常用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度(Coverage)指标来衡量。一致性是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释程度,而覆盖度则表示条件变量可以解释的案例数量。本文使用fsQCA3.0对校准后数据进行计算,输出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		非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经费保障	0.621	0.702	0.462	0.558
~经费保障	0.609	0.514	0.753	0.680
服务项目	0.848	0.869	0.384	0.421
~服务项目	0.435	0.398	0.881	0.861
专职馆员	0.508	0.589	0.332	0.411
~专职馆员	0.492	0.408	0.668	0.592
公众需求	0.405	0.424	0.694	0.775
~公众需求	0.785	0.706	0.484	0.465

注:“~”表示逻辑运算“非”。

通常一致性不小于0.9的条件变量可被视为必要条件^[28]。由表2所知,各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低于

0.9,说明不存在作为结果必要条件的单一条件变量,同时也表明各条件变量需要组合出现方可解释结果变量。不过,在必要条件分析中,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拥有较多服务项目,以及非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只具有较少服务项目的一致性都超过了0.8,这说明服务项目对相关结果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性。

4.3 条件组态分析

在确定没有单一条件变量能解释结果变量后,再进一步对条件变量进行组态分析。

4.3.1 真值表构建

根据QCA的操作步骤,本文通过fsQCA3.0,选择筛选出一致性大于0.8,频数为1以上的数据,得到了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数据组合,即真值表(Truth Table),且未出现相同条件变量组合情况下同时出现0和1的结果,因此可作为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基础。此外,为避免同因异果的现象,还需要参考“不一致性比例减少”指标(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 PRI)。已有研究推荐的PRI门槛值为0.75^[29],尽管这并非是一致要求,但PRI值不能低于0.5,否则组态会表现出明显的不一致性^[30]。鉴于本文案例整体偏少的情况,最终设定0.7作为PRI的门槛值^[31]。

4.3.2 标准分析

真值表构建后,再利用fsQCA3.0进行标准分析,输出结果包括三种解,即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解”指的是一个由多个案例支持的组态。中间解是复杂解的一部分,并包含了简约解。同时出现在简约解和中间解中的为核心条件,但在简约解被消除并且只出现在中间解的条件被称为边缘条件^[32]。由于是否纳入反事实组合的关系,复杂解可能非常复杂,而简约解又可能不切实际,故一般采用中间解结合简约解的方案来进行解读。本文结果表明,一共存在2条组态能产生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同时另有2条组态可导致非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如表3所示。

根据表3可知,组态H1、H2解的一致性为0.948,说明满足这2条路径的案例中有95%的案例表现出较高的发展成效;解的覆盖度为0.443,说明这2条路径可解释约44%的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而组态NH1、NH2解的一致性为0.981,说明满足这2类路径的案例中有98%的案例产生了较低的发展成效;解的覆盖度为0.663,说明这2条路径能解释约66%的

表 3 条件组态分析结果

条件组合	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		非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	
	H1	H2	NH1	NH2
经费保障	●	●		⊗
服务项目	●	●	⊗	⊗
专职馆员	●	⊗	⊗	
公众需求	⊗	●	●	●
一致性	1	0.906	1	0.976
原覆盖度	0.211	0.232	0.398	0.536
净覆盖度	0.211	0.232	0.127	0.265
解的一致性	0.948		0.981	
解的覆盖度	0.443		0.663	

注：●表示条件存在，⊗表示条件不存在，空白表示该条件既可存在也可不存在。较大的●、⊗表示是核心条件；较小的●、⊗表示是边缘条件。

非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

(1)组态H1表明，如能提供丰富的服务项目，并配备专职的图书馆员，以及得到充分的资金保障，即使公众需求的程度较低，合建分馆也会产生较高的发展成效。其中，服务项目和专职馆员是核心条件，经费保障是补充条件。该路径可以解释约21%高合建分馆成效的案例，且这21%的案例只能被该路径所解释。其所对应的典型案例是广州图书馆儿童公园分馆。儿童公园分馆是广州市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合作办馆的典范^[33]。该馆不仅探索建设“书香公园”，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还提供绘本故事会、儿童作家面对面、亲子互动活动、电子书借阅机、录音亭自助配音、图书漂流市集等多样化服务。同时，该馆配备了6名专职工作人员，其中一半以上都拥有大学学历，并定期接受图书馆专业知识培训。目前，儿童公园分馆年投入资金超过60万元，月更新图书1 000余册，服务效能长期位居广州市基层图书馆前列。尽管儿童公园分馆所处的白云区三元里街道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但由于广州市儿童公园以少年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且年接待游客超过百万人次，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馆周边需求不足的问题。

(2)组态H2表明，当合建分馆拥有较丰富的服务项目和公众需求程度较高时，再具备较充足的运营经费，那么即便人力有限，也能取得较高的发展成效。其中，服务项目和公众需求是核心条件，经费保障是补充条件。该路径可以解释约23%高合建分馆成效的案例，且这23%的案例只能被该路径所解释。

其所对应的典型案例是黄埔区图书馆万科山景城分馆。万科山景城分馆只配备了兼职馆员，但却为公众提供了类型多样的服务内容，主要包括讲座展览、亲子阅读、主题沙龙、读书分享、烘焙制作、手工活动、以及餐饮服务等，同时馆内还建成有特色公共文化服务空间供不同群体使用，并配置了自助办证、自助借还机等智能化设备。该分馆以万科山景城为原点，不仅为小区近2万多居民提供便捷、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还同时辐射长岭居周边近8万市民，而其所属的永和街道常住人口数在黄埔区名列前茅，公众需求也比较旺盛。目前，万科山景城分馆的年投入经费达100余万，有力地保障了分馆的日常运行，并且该馆近年来还先后获得过黄埔区一次性日常运营防疫补助和广州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展示项目”专项资金补助，这也对其运营所需经费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

(3)组态NH1表明，只注重公众需求程度的增加，而忽略优化服务创新和配备专职馆员，是产生非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的主要因素；组态NH2也表明，仅仅具备较高的公众需求，但轻视完善服务内容及经费保障不足，同样会产生非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

此外，由表3可看出，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的条件组态全部包含高服务项目，且非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的条件组态也都包含非高服务项目，这与上述必要条件分析的结果相呼应，说明服务项目对合建分馆发展成效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4.4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包括多种方法，如调整校准阈值、改变案例频数、变动一致性门槛值、增加其他条件、补充或删除案例等^[34]。本文主要采取的是改变一致性门槛值的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将原来的一致性阈值设定由0.80调整为0.85，然后再重复原有步骤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解的一致性和覆盖度与调整之前相比未有变化，据此可判断本研究的结果是稳健的。

5 启示与展望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可为合建分馆的发展路径选择带来以下启示。

其一，由于原有基础和背景条件不尽相同，各合建分馆应因地制宜，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差异

化发展路径。本文通过定性比较分析,发现有2条产生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的组态路径H1、H2,且每条路径都对应不同的合建分馆发展策略。例如,一方面,在现有合作模式下,合建分馆的场地一般由社会力量合作方来提供,但因为缺乏对图书馆网点分布格局的统筹规划,结果造成不少合建分馆的选址不科学,偏离了人口聚集区域,进而导致公众对图书馆的潜在需求不足。针对此类情况,可参考H1路径,在内容建设、经费保障及人员专业性等方面下功夫。其中的重点是以多样性为指导原则和发展方针,加快合建分馆服务内容的创新和深化;同时聘用全职的图书馆员来负责日常管理和运营,以促进各项业务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全面提升合建分馆的整体服务质量;另外还应要求社会力量合作方具有优良的资质和信誉,从而有能力为合建分馆的稳定运行投入充足的资金,并逐步建立健全相应的经费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人员流动性大,专业性欠缺的问题也是大多数合建分馆所面临的痛点。H2路径据此提出的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丰富服务项目、申请政府补贴等方面措施,可为受限于人力资源水平的合建分馆提供发展思路:一是根据人口集中程度和便利性原则来选择合建分馆的场地,馆舍选址应在人口密度较高、各项配套设施条件良好的区域,且馆藏资源结构要符合实际需求,如设置在小区或学校则应主要配备绘本、童书和亲子读物,而靠近企业园区则需多配备专业技术、职称考试及投资理财类书籍和期刊;二是注重社会力量与公共文化服务深度融合,努力拓展图书馆服务边界,目的是塑造合建分馆品牌,将其打造成融合图书阅读、跨界文化、文博艺术、餐饮休憩等功能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为公众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以便进一步吸引广大群众参与社区文化生活;三是在保障合建分馆正常运营经费的同时,紧跟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最新公共文化政策,并积极申报各类政策补贴和项目资助,这不仅有利于合建分馆所需经费的补充,还能把合建分馆自身发展与公共文化事业整体规划融合一致。

其二,本文分析还发现导致非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的组态路径NH1、NH2,这提醒合建分馆必须认清制约其发展成效的不利条件,以避免影响其后续服务效能的提升。此外,针对已有的非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现状,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以补齐短

板:在内容供给方面,可结合社会力量合作方行业优势,所在馆舍场地特点等,为公众提供独具特色的文献、空间、讲座等服务资源;人员方面则可采取由总馆派驻专职馆员模式,既能提升合建分馆的服务水平,也能缓解其人员紧张的窘况^[35];同时还应探索差异化的服务项目,拓展社会力量的资金获取渠道,比如可加大文创产品、文旅融合等方面的开发力度,以丰富合作方的盈利手段,从而为合建分馆的持续运营提供经费支持^[36]。

其三,要营造支持图书馆服务创新的良好氛围,引导、鼓励合建分馆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本文分析表明,更丰富的图书馆服务项目对促进合建分馆的发展成效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合建分馆应时刻关注社会需求,尤其是与民生直接相关的领域,这也是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社区组织需要特别重视和拓展服务的范围,包括就业信息与创业交流服务、企业专题信息服务、中小学生研学服务、志愿服务、心理咨询服务、健康信息服务、适老服务等^[37]。并且除了提供图书、期刊等文献信息,图书馆还具有社交中心的概念,它是社区活动场所和休闲娱乐中心^[38]。因此,合建分馆所提供的服务项目应着眼于整个社区,而不仅仅只是那些主动走进图书馆的民众。此外,还应看到,单一的扩大图书馆服务范围并不是高合建分馆发展成效的必要前提,而是其结合人员、资金、社会需求等多种因素协同匹配的结果。这也启示合建分馆在选择未来的发展道路时,要注重考虑服务内容与人力、财力、外部环境等要素的多方联动,打好高质量发展组合拳。然而仍需要注意的是,合建分馆在扩张社会化服务功能的同时,应警惕片面迎合社会需求的趋势,切忌盲目发展图书馆非专业性业务^[39]。公共图书馆的基本职能是对文献信息进行收集、整理、保存及提供利用,合建分馆也应牢牢把握这一基础职责和专业使命,要在保障文献信息服务的前提下开拓图书馆的社会功能。例如,儿童公园分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少年儿童,因而理应围绕经典的绘本、动画、儿歌等资源来开发利用、推广及分享,并与其提供的亲子活动、故事会等服务项目进行有机整合,这样既可满足少儿读者的休闲娱乐要求,又有利于专题文献信息的传播和普及;另外,万科山景城分馆的一大亮点是建成了不少特色鲜明的公共文化服务空间,那么在空间的使用上就应坚持以

阅读与学习为主,体验与娱乐为辅的原则,因此必须优先满足读者的文献阅览、自主学习、知识交流、科学普及等智识活动,并以此为基础,努力打造一个集信息获取、文化休闲、创新体验为一体的特色服务空间。

最后,本文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研究方法要求,并不能把所有前因变量都纳入讨论中,比如政策支持、地理位置、评估考核等都有可能对合建分馆

的发展带来不同影响。另外,本文案例数量仅有12个,因而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比较有限,未来应考虑扩大合建分馆的案例数据,以进一步提升结论的普适性和可推广性。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可结合深度访谈、扎根理论等方法,形成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研究框架,从而能更深入地阐释影响合建分馆发展成效的现实因素。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
- [2] 王惠君.面向未来 创新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思考[J].图书馆论坛,2021,41(2):32-40.
- [3] 方家忠.体系化为表 专业化为里——文化强国愿景下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思路[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47(6):62-75.
- [4] 方家忠.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年度报告 2021[M].广州:广州出版社,2022:3.
- [5] 邓银花.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的缘由、模式和激励[J].图书馆杂志,2014,33(2):14-19.
- [6] 褚树青.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建设研究[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38-41.
- [7] 李杨,陆和建.全民阅读背景下城市阅读空间馆店融合发展研究:以合肥市为例[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28(2):59-66.
- [8] 张靖,廖嘉琦.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智慧:国家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2022)综述[J].图书情报知识,2022,39(5):12-19,30.
- [9] 黄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以上海市嘉定区公共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4):79-83,101.
- [10] 邓卿.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图书馆建设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41(6):121-124.
- [11] 王素芳,于良芝,邱冠华,等.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制度保障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36(4):4-9.
- [12] 白玉静.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的思考:以北京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为例[J].新世纪图书馆,2023,(1):12-15,55.
- [13] 张守卫.2000年以来我国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研究综述[J].图书情报工作,2014,58(5):141-147.
- [14] 沈丽红,童卉,史小莉,等.社会力量参与“运河书房”建设的模式探索[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9(10):69-73.
- [15] 陆和建,蔡国画,吴鸿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服务创新的滁州探索[J].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0,32(7):48-56.
- [16] 彭秋平,唐琼.社会力量参与广州“图书馆之城”建设:模式、问题与经验[J].图书馆论坛,2019,39(5):79-87.
- [17] RAGIN C C.The comparative method: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 [18] PAPPAS I O,WOODSIDE A G.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practice in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marketi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2021,58(3):102310.
- [19] 广州零点有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公共图书馆第三方评估报告[R].广州:广州零点有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2019.
- [20] MARX A. Crisp-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csQCA) and model specification: Benchmarks for future csQCA applic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ple Research Approaches,2010,4(2):138-158.
- [21] 刘秀峰.公共文化经费保障机制的创新与构想:以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5(9):66-68.
- [22] 钟源,吴振寰,陈能华.美国社区图书馆服务内容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J].图书馆,2015(4):51-54.
- [23] 宁阳,王旭明.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图书馆发展的研究与思考[J].图书馆杂志,2019,38(1):54-59.
- [24] 刘兹恒,白珊珊.读者需求是基层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0(4):12-14.
- [25] RAGIN C C.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97-105.

(下转第67页)

· 工作研究 ·

数字时代公共图书馆纪录片资源建设的实践与策略^{*}

郭晓婉

(广州图书馆 广东广州 610623)

摘要:公共图书馆开展纪录片资源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但也面临着采购渠道受阻、原生数字格式资源复本获取困难和尚未形成对纪录片统一的内在需求等现实困境。文章以广州图书馆纪录片资源建设实践为案例,为公共图书馆开展相关资源建设提供几点策略:充分发挥馆员专业性;注重纪录片IP化打造;拓展与不同机构的多元合作机制;探索纪录片“藏”与“用”的分级建设模式。通过探索多样化的资源建设途径,以期为公共图书馆纪录片资源路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数字时代;公共图书馆;纪录片;资源建设

中图分类号:G258.2;G255.73

文献标识码:A

Practice and Strategies in Developing Documentary Film Resources in the Digital Era for Public Libraries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documentary film resources by public libraries holds significant practical importance and historical value. However, challenges such as restricted procurement channels, difficulties in obtaining native digital format resources, and the lack of unified intrinsic demand for documentary films pose obstacles. Using the practices of Guangzhou Library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proposes several strategies for public libraries engaged in similar resource development: leveraging the expertise of librarians, emphasizing the cre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from documentary films, expanding divers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with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and exploring a tiered approach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ocumentary film resources for preservation and use. By exploring varied avenues for resourc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aths for documentary film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public libraries.

Key words digital era; public library; documentary film; resource development

1 引言

图书馆是提供文献信息资源服务的专业机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也成为图书馆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伴随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文献信息资源的生产、保存和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图书馆的资源建设路径和策略也必

须作出相应的改变,才能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本文研究对象聚焦纪录片资源。以真实为本质特征的纪录片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是一种高质量的视听文献,兼具纪实和娱乐功能,被誉为“国家的相册”。纪录片关照和记录的边缘群体,与公共图书馆高质量发展“均等化发展”内涵中提及的“向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利用其正常服

^{*} 本文系广东省图书馆科研课题“公共图书馆纪录片服务创新研究”(项目编号:GDTK21019)的成果之一。

务和资料的人”相吻合。纪录片资源是公共图书馆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助推高质量发展的资源利器。

在数字时代,一方面,纪录片的生产主体多元化,除了电视台,主流视频网站、新媒体平台甚至地方政府都在投拍或自制纪录片;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生产主体都直接生产原生数字形态的纪录片,这就对大多以采购DVD音像制品为影像资源主要建设途径的公共图书馆提出了挑战。本文尝试以广州图书馆纪录片资源建设实践为案例,探索多样化的资源建设途径,以期为公共图书馆纪录片资源路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2 公共图书馆开展纪录片资源建设的现实困境

纪录片是公共图书馆应当建设的重要资源类型,但笔者通过网络调研、问卷调研和文献调研后发现,当前我国开展纪录片资源建设和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屈指可数,分析其困难有如下几点。

2.1 传统音像制品出版发行逐年萎缩,纪录片资源建设渠道受阻

数字环境下,传统的以出版音像制品这类有形物理载体的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1],互联网及其衍生的视听媒体生态圈的影响力不断深入,大大降低了音像产品的销量,缩小了用户范围,传统音像出版行业受到巨大冲击^[2],日渐萎缩,各音像出版社的实体出版量不断下降^[3],数字出版日渐兴盛。在这样的背景下,具体到纪录片,绝大多数制作和发行机构已不再出版实体音像制品,而是直接生产原生数字形态的纪录片并通过电视和网络平台播出,用户可直接通过电视观看、网络下载或付费观看。公共图书馆想要开展纪录片资源建设,就必须探索数字格式纪录片资源的建设路径,但数字格式的纪录片资源建设也面临一些显而易见的困境。

一是数字格式出版、发行的纪录片对接的主要是商业机构,版权销售是其主要盈利模式,尚未形成对接图书馆的内在需求和动力,因此公共图书馆所处的采购环境比较被动。二是公共图书馆采购出品音像制品,已经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规范,但数字格式纪录片资源的采购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向谁采购、如何采购、采购定价、采购流程和规范等都没有

可供参考借鉴的成熟案例或行业标准。三是公共图书馆采购经费有限,而数字格式纪录片资源复本的采购成本远高于传统的音像制品,采购经费有限与采购单价较高之间的矛盾突出,这就导致纪录片的采购数量大大受限,因此图书馆较难进行系统的、规模化的数字格式纪录片资源建设。

2.2 原生数字纪录片资源复本获取困难

纪录片的创作来源主要分为五类:电视台制作、视频网站制作、专业性独立影视团队制作、普通群众制作以及国外购买^[4]。除了极少生产主体公开出版少量音像制品外,绝大部分纪录片都以原生数字形态生产,数字资源的易复制性使得版权所有者对数字资源版权的管理非常严格和谨慎,尤其是处于商业周期内的纪录片资源,因此图书馆想要合法获得纪录片资源复本就变得更加困难。虽然网络上有极其丰富的纪录片资源,但从著作权的角度来讲,来源合法是资源建设的前提。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不能直接通过网络下载的方式进行资源建设。要做到来源合法,就需要获得版权人的同意或授权。但纪录片的生产主体非常多元化,当前市场上既没有一个类似采购出版音像制品的采购代理机构用于数字纪录片资源采购,也没有形成一个纪录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也就是说,公共图书馆没法通过一个统一的第三方代理机构去批量采购纪录片资源,只能依次与单个版权方对接才有可能获得资源的复本。这种资源复本获取方式导致图书馆纪录片资源建设的沟通成本、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很高昂,而资源建设效率又很低,资源建设的可持续性大大受限。

2.3 公共图书馆尚未构建统一的纪录片内在需求

公共图书馆都会进行纸本图书、电子书、出版音像制品和数据库等文献资源的建设,但笔者通过对国家级、省级、副省级和大湾区共计55家公共图书馆进行网络调研和问卷调研后发现,除了广州图书馆成立了专门的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常年定期开展纪录片放映、交流、展览、培训和研讨等活动外,其他图书馆没有开展专门的纪录片服务,部分图书馆在开展电影放映服务的时候也会播放少量自然科普类或红色文化类纪录片,但几乎没有一家图书馆是用“纪录片”一词去进行活动的预告和宣传,而是用“电影”一词代替,也没有发现上述公共图书馆中有专门开展系统的纪录片资源建设的案例。

究其原因,与图书馆传统文献资源类型相比,纪录片相对小众,受众群体虽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但受众基数整体来说相对偏小,且纪录片属于视听资源类目下细分的文献资源类型,可以归到电影作品的大类中去,容易被忽略或覆盖。此外,公共图书馆可以直接采购的纪录片出版音像制品总量相对有限,且每年新增的纪录片数量也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而数字格式的纪录片资源建设路径也尚不成熟,客观上也影响了公共图书馆的纪录片资源建设。

公共图书馆目前尚未构建起对纪录片资源一致的、强烈的统一需求和共识,也没有成立一个共建共享的联盟,纪录片生产主体也就缺乏对接图书馆资源采购的热情,供需不匹配不平衡,难以建立起一个常规的采购模式。

3 广州图书馆纪录片资源建设实践

2018年12月,广州图书馆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纪录片收藏、整理、展示、研究、服务的公共文化平台,也是中国第一家建设在公共图书馆的纪录片中心。中心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在探索多样化的纪录片资源建设路径。

3.1 中心纪录片资源建设现状

从馆藏建设的来源上,中心现有DVD纪录片采购、社会捐赠和公益采购等主要来源的馆藏纪录片共计4700余部/集。从绝对数量构成上,采购的DVD馆藏具有绝对优势,占全部纪录片资源的87%;其次是社会捐赠和公益采购。

分析不同来源的纪录片馆藏年增变化并结合中心开放以来的实践可知:(1)近五年市场上可供采购的新增DVD音像制品极其有限,且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也与音像出版行业整体日渐式微的趋势相吻合,因此,这一建设路径不具有可持续性。其次,经对内容分析可知,这批资源大多时效性不强,且有相当一部分为访谈类活动录制节目,资源质量参差不齐,可用性、实用性及服务效益相对较低。因此公共图书馆想要开展可持续的高质量的纪实影像服务,亟需开拓除DVD采购之外的其他资源建设途径。(2)中心通过举办活动与纪录片相关机构和个人建立联系,积极主动争取广泛的社会合作,吸引社会捐赠。社会

捐赠成为中心纪录片馆藏资源建设的重要补充。虽然社会捐赠受外在影响因素较多,具有不稳定性,但却能够大大节省资源建设成本,拓展资源建设渠道,拓宽服务边界,且资源质量较高,因此成为中心重要的资源建设路径之一,且会在未来的工作中更加注重营造和维护社会捐赠的良好氛围。(3)中心自2020年开始探索公益采购的资源建设路径。所谓公益采购,就是通过版权代理方以低于市场价的方式采购数字格式的纪录片资源,并通过协议对每一部/集纪录片的使用次数、使用时限、使用方式、使用范围等进行限定,一般约定使用时间为五年,只可线下使用。公益采购拓展了资源的建设渠道,大大节省了沟通成本和人力成本,且可实现对纪录片单的范围限定和筛选,因此,资源建设质量较高,可用性更强。但由于公共图书馆采购经费有限,每年可采购的资源数量比较受限。

3.2 中心纪录片资源建设路径

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第一条是“书是为了用的”。中心自开馆以来始终都以“实用”为导向开展资源建设工作,积极探索除采购音像制品外的其他资源建设路径,并在五年的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条“以合作促资源”“以活动促资源”的建设模式。

3.2.1 以“合作”促资源建设

以“合作”促资源建设,是指与纪录片相关制播机构、组织和个人建立合作关系,建立合作的初衷可能是基于活动策划、场地和公众等资源的共享和优化,不直接导向纪录片资源建设,但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逐步在纪录片资源建设层面找到合作的契机,进而通过共建共享、社会捐赠等方式实现馆藏纪录片资源的建设和补充。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心与广州本地的广州市广播电视台(以下简称“广州台”)建立了持续而深刻的合作以促进纪实影像资源的建设。

中心与广州台合作的源头是双方在广州图书馆合作举办一场由广州台出品的纪录片《湿地的力量》首映礼活动,经过进一步沟通和了解,双方认为二者在资源共享和活动策划方面可以开展广泛的合作,并于2019年签署了《广州市广播电视台与广州图书馆战略合作协议》,广州台向广州图书馆捐赠了10部自制优秀纪录片作为馆藏资源。此后,双方持续就“城市历史纪实影像资源”的数字化共享达成合作协议:由广州台提供其所积累的历史影像磁带,并完成

磁转数的工作;由广州图书馆承担数字化经费,数字化的资源则由双方共同享有。经过两年多的深耕细作,广州图书馆已经完成约1700小时的城市历史纪实影像资源的建设。

3.2.2 以“活动”促资源建设

以“活动”促资源建设,是指通过举办纪录片相关活动,如以纪录片展映交流、研讨、展览、创作培训等纪实影像服务为契机,与活动相关参与方建立联系,进而获得纪录片资源的收藏和使用。

2018年,中心借助开馆活动的契机,邀请了国内外众多纪录片学界和业界的专家学者,举办专业研讨会,并获赠了一批经典的纪录片资源,包括2部黎民伟先生之子黎锡捐赠的珍贵影片和5部俄罗斯国家电影基金会捐赠的维尔托夫拍摄的珍贵影像。

其次,中心在策划日常的纪录片展映交流活动时,往往是先与纪录片的主创团队包括导演、制片人、出品方等取得联系,争取单次放映授权,并同时邀请主创团队或片中主人公作为活动嘉宾,如中心曾邀请著名纪录片导演张同道、张以庆、范俭、樊启鹏等带着自己的纪录片作品做客中心,参加展映交流活动。除了正在热播、处于商业周期内的纪录片,考虑到图书馆的公益性和受众的广泛性,以及基于展映交流活动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版权方一般也都乐意将自己的作品捐赠给图书馆收藏,中心也会在展映交流活动中举办捐赠仪式,颁发收藏证书,同时签署授权协议,确保对资源的合理使用。经过四年多的实践,中心基本建立了一套“邀请嘉宾—举办活动—获得捐赠”的以“活动”促资源建设的模式。目前,中心已通过这种模式获赠纪录片50余部/集。

再次,中心还借助每年举办纪录片创作活动之机,与纪录片创作者合作创作纪录片,或面向纪录片爱好者和从业者广泛征集纪录片作品,并在征集的时候获取复制权、放映权、汇编权等使用授权。2019年,中心以培养“市民导演”为宗旨,聘请导师,招募学员,并提供拍摄设备支持,最终自主完成制作5组口述历史纪录短片。2021年和2022年,中心在举办“WE纪录”创作训练营的同时,启动主题征集,两年共征集到纪录片作品近百部,纳入馆藏的纪录片有20部。

以“活动”促资源建设的核心在于活动的策划和组织虽不直接导向资源建设,但是在活动执行的过程中,能够吸引到纪录片生产、制作、传播的多元

主体深度参与。他们是纪录片版权的直接或间接所有者,能够促成纪录片在图书馆的收藏和使用。

4 公共图书馆纪录片资源建设的优化策略

4.1 充分发挥馆员专业性,开拓多元化的馆藏资源建设渠道

“要坚持馆员在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中的主体责任,保障图书馆公共服务并提高馆藏质量及效益。”^[5]作为全国第一家专业的纪录片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中心自2018年成立以来就将纪录片馆藏资源建设作为中心开展多元服务的基础和前提。在多种困难面前,馆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尝试多种打破常规的途径与不同的版权主体建立联系,通过微博联系纪录片导演或生产机构,真诚沟通,努力争取,促成合作。此外馆员还借鉴其他资源的建设模式,积极尝试征集、捐赠、自建、共建共享等建设路径,这些都是扩充和丰富馆藏、节约经费以及获取难得资料的有效途径^[6]。为提高资源建设的质量,保证资源建设的稳定性,优化馆藏结构,馆员还创造性地开拓了“公益采购”的建设路径,在片单的筛选上掌握主动权,并就使用方式、授权范围和使用期限等做积极的沟通和争取,经过2020—2022年三年的实践,公益采购的使用范围从最初的仅可在广州图书馆馆内使用已经扩展到可在广州图书馆及直属分馆内使用,大大提升了资源建设的质量和效益。

其次,馆员的专业性还体现在“仪式感”的营造上。馆员充分利用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公益性和大众传播优势,努力克服资金、人力等不足的现实困境,在资源建设的合作中,注重细节,让合作方有获得感和满足感。如中心获赠纪录片时,会同时举办捐赠仪式,在活动现场颁发收藏证书,签署授权协议,同时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在征集纪录片作品时,也会对入选馆藏的作者颁发精美的收藏证书,还会举办专业的纪录片展映交流会。这种“仪式感”在提高纪录片的传播度和受众度的同时,也让版权主体有了极大的满足感和获得感,为吸引更多的社会捐赠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再次,馆员还非常注重总结复盘并及时调整资源建设策略。2021年举办“WE纪录”创作训练营时,

为配合广州图书馆建馆40周年系列活动,同步启动了“我和广州图书馆”的主题征集活动,因主题范围受限,仅征集到8部纪录片,且大多作品因拍摄周期短,人力、物力等投入有限,整体质量不高。意识到这些问题后,在2022年的征片活动中,馆员及时将征集主题调整为内涵和外延更为丰富的“我·青春”。为提高征集作品的质量,开启定向征集,面向中国传媒大学、上海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纪录片专业学生广泛传播征片信息,并联系高校导师,推荐并鼓励学生参与征集。最终征集到88部纪录片作品,经过评选,有20部作品入选馆藏,资源建设的数量和质量得到大幅提升。

4.2 注重纪录片IP化打造,吸引不同纪录片主体关注和参与

中心自成立以来,五年内获得社会捐赠纪录片400余部,征集纪录片作品96部,入选馆藏20部,获得单次使用或在线使用授权纪录片10余部,大大缓解了中心资源建设与服务需求不匹配的燃眉之急。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很大程度上也在于中心致力于从多个维度将自身打造成一个专业的纪录片IP,努力提升平台的社会声誉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吸引不同纪录片主体关注和参与,进而促成纪录片的收藏和建设。

一是围绕纪录片开展系列主体服务和周边服务,吸引不同的纪录片主体。除了基本的纪录片放映服务和展映交流服务,中心每年还会固定举办两场纪实影像展览、一场“WE纪录”纪录片创作培训和一场“纪实影像照进未来”的主题研讨活动。展映和展览服务面向纪录片普通观众,创作培训面向纪录片从业者和爱好者,主题研讨活动则会邀请学界和业界的大咖作为分享嘉宾,服务对象基本涵盖了纪录片从创作到传播的各类主体,争取了广泛的受众。2020年,广州图书馆荣获“中国十大纪录片推动者”,同年获此殊荣的还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学习强国、湖南卫视、Keep、快手和胡歌等单位、平台和个人^[7],中心作为专业纪录片平台的IP形象得到进一步认可。

二是注重纪录片“名人效应”,积极主动与纪录片学界和业界知名学者和代表性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2022)》明确提出“建立伙伴关系,推动公共图书馆建立更广泛、更多样化的公众至关重要”。广州图书

馆自2013年开馆以来就一直作为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举办地,中心自2018年成立以来,就一直与节展组委会保持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并在节展期间同步举办专业的纪录片研讨会,邀请包括俄罗斯国家电影基金会、英国国家电影学会、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专业机构的人员作为交流嘉宾。其次,中心在举办纪录片展映和创作培训活动,也注重“名师效应”,邀请纪录片知名导演和热门纪录片导演,广泛吸引受众。同时,随着新媒体纪录片的热播,中心也积极与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等主流视频网站建立合作关系。中心于2021年和2023年与B站合作举办的《小小少年》和《但是还有书籍》展映交流活动,都成为中心当年的重点活动,也深化了中心作为一个专业纪录片平台的IP形象。

将中心打造成一个专业的纪录片IP,能够在注意力稀缺和用户细分的时代,广泛精准吸引纪录片用户。广泛的用户基础又能够吸引不同的纪录片生产主体愿意与中心建立合作关系,以捐赠、单次授权或公益采购的方式实现资源的建设和使用。

4.3 探索与纪录片不同机构主体的多元合作机制

相比电影和电视剧这类视听作品,大部分纪录片生产主体更多的是为了发挥纪录片的文化价值,而广泛传播才能促成文化价值的实现,这也是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能够与不同的纪录片主体建立合作的基础和优势。

对于纪录片新媒体传播机构,如B站、爱奇艺、优酷、腾讯等主流视频网站,比较注重版权的商业价值,可以通过“在线播放”、单次授权使用等方式实现对热门纪录片的放映使用。对于不再热播、逐步进入商业周期尾声的纪录片,可以低于市场价的公益采购或捐赠等路径进行馆藏资源建设。对于电视台这一制播机构,公共图书馆可以优先调研本地电视台、公共机构的纪录片资源生产情况,通过资源置换、互惠互利等友好合作方式获取相关资源授权。对于民营公司和独立纪录片人生产制作的纪录片资源,则可以通过举办活动、合作宣传推广等方式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进而以捐赠或公益采购的方式获得纪录片资源。此外,图书馆还可以与纪录片业界和学界的代表人物建立合作关系,争取资源的二次推介,

即通过行业的某一个权威的嘉宾或机构,进而引荐和推介更多相关的资源。如广州图书馆在2018年中心成立之际就和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教授、制作人张同道老师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张同道老师又与该中心的樊启鹏教授以及导演取得联系,建立合作,获赠多部纪录片。

4.4 探索纪录片“藏”与“用”的分级建设模式

公共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的保存机构和传播机构,知识中介功能为主要传统功能^[8],在纪录片资源建设时应该遵循“应收尽收”的原则。当下信息生产和消费的模式已经向着去建制化、去中心化和去流程化的方向发展和转变,公众对图书馆信息和服务的获取方式也在发生变革。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单纯依靠采购收藏正式的出版音像制品来进行纪录片的收藏和建设已经不现实了,因此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建设模式也需要进行深层次、多角度的调整或变革^[9],灵活处理馆藏资源“藏”与“用”的关系,藏以致用、以用致藏、甚至藏用分离。尤其是网络环境下文献资源的“获得”并不一定要本馆“拥有”^[10],面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挑战,公共图书馆亟需探索纪录片“藏”与“用”的分级建设模式。

4.4.1 藏用并重模式

纪录片是一个国家的相册,具有厚重的文化和历史,是我们了解历史的一扇文化之窗,也是增强国际传播、增进国际了解的重要文化“推手”,而保存人类历史、传承人类文明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对于中外优秀纪录片,公共图书馆应该投入相当的力量进行资源建设,并开展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充分发挥这类纪录片的教育价值、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此外,从资源建设的成本考虑,对于建设难度较小的纪录片资源,如出版的音像制品,应该本着“应收尽收”的原则通过常规采购的方式进行馆藏资源建设。

4.4.2 重藏轻用模式

中外经典的纪录片,如世界纪录片大师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理论性和专业性较强,适合用于相关研究。此外,不同于电影、电视剧

等影视作品,能够拿到“龙标”在院线上映的纪录片凤毛麟角,还有大量中外纪录片节展优秀作品和获奖作品,尤其是国外的优秀纪录片作品尚未在中国取得公播权,不能直接用于公众服务。对于这类纪录片资源的建设,可以采取“重藏轻用”的资源建设模式,以“收藏”为主,在使用上仅供内部交流研究或在有限范围内开展学术研讨。这一方面可以节省建设资源的成本尤其是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可以获取较为珍贵的资源,优化资源建设结构,提升馆藏资源建设质量。

4.4.3 重用轻藏模式

《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让纪录片这一不同于电视剧和电影的影视作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培养了一批忠实的纪录片观众^[11]。近几年,腾讯、爱奇艺、优酷、B站等各大视频网站都相继开设纪录片频道,并纷纷开启自制纪录片的模式,涌现出越来越多“爆款”纪录片,如《人生一串》《历史那些事》《但是还有书籍》《守护解放西》等。这些纪录片在视频网站简单检索即可在线观看,读者只要有一台智能终端,即可不受时空限制地点播观看。而公共图书馆想要获取这些热门纪录片的资源复本进行资源建设的难度大、成本高。因此,对于这类热播纪录片资源,则可以采用“重用轻藏”的模式,通过与版权机构进行合作,通过在线播放、单次播放等有限的使用实现对资源的利用,先建立合作关系,待这类资源完成商业收益之后,再启动资源建设和收藏工作。

5 结语

随着数字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公共图书馆面对的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新的文献类型不断涌现,尤其是影音文献,单纯依靠收藏正式的出版物来进行纪录片资源建设已经难以为继,图书馆必须与时俱进,在借鉴特藏^[12]资源和专题资源建设路径的同时,结合纪录片资源生产、发行和制作的时代特点,探索多元化的建设路径,制定灵活多样的、个性化的资源建设策略,以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参考文献:

- [1] 罗媛.融合与发展——谈音像出版在数字环境下的生存策略[J].编辑学刊,2019(3):6.
- [2] 刘艳.我国音像市场出现萎缩的几点思考[J].艺术品鉴,2020(6):313-314,376.

- [3] 孟修,崔云红.国家图书馆中文音像制品交存工作的问题与优化[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0,40(9):3.
- [4] 贾子媛.2010—2020年网络时代纪录片的十年生存[J].今传媒,2021,29(12):4.
- [5] 陈力.数字时代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9(4):1-12.
- [6] 肖希明,张勇,顾森,等.我国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法律需求的调查分析与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3):7.
- [7] 2020年中国十大纪录片推动者揭晓[EB/OL].(2020-12-17)[2023-05-09].<https://gzdoc.cn/NewsInfo/info.aspx?itemid=2060&1cid=,2020-12-17>.
- [8] 陈传夫.拥抱数字智能时代推动图书馆学传承与创新[J].图书情报知识,2021,38(6):2.
- [9] 姚荔.后疫情时代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构建模式变革初探[J].图书馆学刊,2021,43(12):5.
- [10] 肖希明,仇晓惠.新中国文献资源建设六十年[J].图书馆杂志,2009,28(7):3-12.
- [11] 高墅.国产影视纪录片的发展之路[J].电影文学,2015(16):3.
- [12] 王雨卉.图书馆特藏概念廓清[J].图书馆论坛,2012,32(5):5.

作者简介: 郭晓婉, 硕士, 广州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公共文化服务。

收稿日期: 2023-05-11

本文责编: 孙晓清

(上接第60页)

- [26] 谭海波,范梓腾,杜运周.技术管理能力、注意力分配与地方政府网站建设:一项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J].管理世界,2019(9):81-94.
- [27] 阚艳秋.基于定性比较分析的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成效影响因素研究[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20:44.
- [28] SCHNEIDER C Q,WAGEMANN C.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278.
- [29] DWIVEDI P,JOSHI A,MISANGYI V F. Gender-Inclusive Gatekeeping: How (Mostly Male) Predecessors Influence the Success of Female CEO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8,61(2):379-404.
- [30] GRECKHAMER T,FURNARI S,FISS P C,et al.Studying configurations with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est practices in strategy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J].Strategic Organization,2018,16(4):482-495.
- [31] DU Y,KIM P H.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Strategy configurations, complex environments,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in emerging economie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21(124):272-285.
- [32] FISS P C.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1,54(2):393-420.
- [33] 陈深贵.基层图书馆服务效能提升路径研究:以广州图书馆直属分馆为例[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1(7):54-59.
- [34] 张明,杜运周.组织与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应用:定位、策略和方向[J].管理学报,2019,16(9):1312-1323.
- [35] 冯冰.向基层分馆派驻专职馆员模式探索:以广州地区公共图书馆为例[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41(5):84-87.
- [36] 李祝启.公共文化产品服务政社合作供给与运营机制创新研究:以安徽省合肥市城市阅读空间为例[J].图书馆学刊,2021,43(6):22-28.
- [37] 方家忠.社会责任、公共服务与文化传承[J].图书馆论坛,2021,41(9):14-15.
- [38] 威甘德.美国公共图书馆史[M].谢欢,等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125.
- [39] 柯平,胡娟,袁珍珍.面向社会化挑战的图书馆专业化学理依据与实践探索[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3,49(2):15-28.

作者简介: 吕果, 广州图书馆助理馆员, 硕士, 研究方向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地方文献。

收稿日期: 2023-03-28

本文责编: 孙晓清

高校图书馆参与地方老字号文化资源建设的实践探索

李林瑛 李向云 于 冬

(潍坊医学院图书馆 山东潍坊 261053)

摘 要: 老字号是无形的工商业遗产,其文化资源记录了企业的发展演化进程,反映了城市文化的变迁与传承。高校图书馆应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老字号文化资源建设。潍坊医学院图书馆通过多种渠道广泛收集地方老字号相关文献及实物资源,应用数字化技术对资源进行保护处理,深入挖掘其内在价值及文化内涵,开展相关阅读推广活动,让老字号的原生态文化底蕴得到更多呈现。

关键词: 潍坊; 老字号; 城市记忆; 城市文化; 高校图书馆; 资源建设

中图分类号: G258.6; G250.74

文献标识码: A

Exploring the Involve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he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of Local Time-Honored Cultural Heritage

Abstract Time-honored brands, known as "Laozihao" in Chinese, represent invaluable heritage in the realm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They encapsulate the developmental journey and evolution of businesses, reflecting the ever-changing tapestry of urban culture and its enduring legacy. University libraries, leveraging their inherent strengths, should actively engage in the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se esteemed brands. The library of Weifang Medical University diligently collects an extensive array of local literature and tangible artifacts associated with time-honored brands through diverse channels. Employing cutting-edge digital technologies, they safeguard and preserve these resources, delving deep into their intrinsic value and cultural richness. Furthermore, they enthusiastically spearhead relevant activities to promote reading and appreciation. Through meticulous research and pragmatic explora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volvement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time-honored brand culture, this article presents strategic approaches such as gathering original resources, digital preservation and processing, as well as the dissemination and promotion of cultural assets. These measures aim to augment the commercial brand influence of time-honored brands, foster a sense of urban identity and belonging among citizens, and bolster the city's economic and cultural soft power..

Key words Weifang; time-honored cultural heritage; urban memory; urban culture; university library; resource construction

作为高校文献信息中心的图书馆,不仅要为学校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提供服务,还要把目光延伸到学校所在地区的发展上^[1],为当地的教育、经济、文化、科学等作出贡献。老字号作为本地工商业的优秀文化载体,是历史的缩影,反映了城市与文化的变迁传承过程。高校图书馆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多维度补充本地文化特色馆藏,加强数字化保护与处理,推

广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发挥高校文化育人主阵地作用,促进城市的经济与文化发展。

1 潍坊老字号发展现状

1.1 潍坊的老字号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每一座城市都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老字号。以潍坊市为例,潍坊历史上即为手工业名城,在鸦片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潍县华丰机器厂”为代表的潍坊民族工业一度昌盛,到20世纪80年代,潍坊是驰名全国的电子城、动力城、纺织城。潍坊工商业也是几经周折,历尽沧桑,在兴衰起伏的过程中,曾经涌现出许多百年以上的老字号。

2006年和2011年,商务部先后确立了两批中华老字号名录,认证企业总计1128家,其中仅10%的企业蓬勃发展,40%的企业勉强实现盈亏平衡,而近一半都是持续亏损状态。在国家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中,多数分布于人们日常生活消费领域,其中食品、药品和餐饮业占60%以上,其他还分布于传统技艺与服务行业。

山东省和潍坊市也相继出台了权威的老字号认定程序,以潍坊市为例,有“崔字牌”香油、“景芝白干”白酒、“云门陈酿”白酒、“潍坊嵌银厂”4家品牌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百货大楼”“青州剪刀”等12家品牌被认定为“山东老字号”。另有“潍坊口腔医院”“高密市常发刀具厂”“安丘市芝泮食品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被评为“潍坊老字号”。

1.2 老字号与非遗的区别

在已认定的老字号企业中的许多代表性技艺同时也属于非遗名录,但老字号并不能完全等同于非遗,虽然例如“景芝白干”白酒、“崔字牌”香油、“隆盛”糕点等产品,因其传统制作技艺世代相传,具有不可再生的经济、文化与社会价值,从而也被认定为非遗名录,但像“潍坊百货大楼”“潍坊口腔医院”等品牌,使用的都已经是现代的商贸经营或者医疗技术,虽然未列入非遗名录,但因其年代久远,信誉良好,依然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可。

老字号中的非遗项目与其他非遗项目的不同之处是老字号更加强调自身的商业属性,品牌效应更加明显,更注重商标所有权和使用权。如南宫和乐店被认定为潍坊老字号,同时也是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虽然潍坊的和乐店很多,但是南宫和乐店的历史、影响力、经济效应是无可替代的。而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安丘景芝镇红旗三页饼店,则因为“无商标所有权”而于2001年被取消了“山东老字号”的称号,这也反映出企业对于品牌产权的保护意识仍然

欠缺。另有潍坊风筝、高密剪纸等多个非遗项目,目前还尚未出现相应的老字号品牌。即使是在现有的老字号企业中,仍存在固守“酒香不怕巷子深”传统思维的现象,不注重品牌形象的积极打造,其文化资源零星散乱,不成规模,相关的深入研究开展得少,历史文化内涵有待进一步挖掘和向公众展示。

2 高校图书馆参与老字号文化建设的意义

地方文化研究历来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目前来看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公共图书馆作为地区的文化和信息中心,早已承担了保存和传承地方文化的任务^[2],特别是关于非遗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对于老字号的研究比较少,这也留下了足够多的开展选择性保护传承的机会。

各个高校图书馆都会选择与自身校园环境及特点相关的特色文化作为重点建设的项目加以开发与推广。不同的文化侧重点不仅表明了一个学校的办学特色,也从侧面验证了其学术研究实力与馆藏资源的开发能力。高校图书馆要结合自身的文献优势(地方文献馆藏丰富)、人才优势(馆内、校内及校友中有大量地方文化专家学者),积极主动参与本地老字号文化建设,拓展新的发展领域,增强高校图书馆的职能。

2.1 记录老字号及城市的历史变化

老字号文献能够客观真实、完整系统地再现其品牌筚路蓝缕、开拓前行的发展史,从创办到发展、传统技艺的延续、工匠精神的传承等,都得依靠文献的留存得以呈现,如青州隆盛糕点传承人脱氏家族的家谱——《脱氏宗谱》中的相关内容,记录了脱氏家族隆盛糕点百年篇章的准确发源时间与地点^[3]。

从城市记忆的视角看,老字号资料不仅是企业发展的见证,在记录城市历史发展轨迹和城市变迁方面的价值也不可替代。城市的快速发展对城市原有街区和布局的冲击不可避免,许多街道现在已经足迹全无。如潍坊南宫和乐店最初是在南马道街上,随着南马道拆迁,南宫和乐店搬迁到胜利街上,但是在原址留下的老照片成为了几代人的美好回忆。

2.2 展现城市的地域文化

城市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文化特质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老字号中蕴藏的城市

文化符号承载着城市的文脉。如景芝酒厂以前的大门口照片,许多人还记得其两边卖散酒的小店和推着独轮车用地瓜干换酒装在鱼鳞酒坛子中的经历,见证了景芝独特的酒文化。因此老字号文化资源既是城市文化的沉积,又是探寻城市记忆的源泉。

“地域文化”表现为不同区域人群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总和^[4],老字号能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城市最原生态的听觉和视觉信息,展现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高校中的本地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长期耳濡目染,对于本地老字号有一种自然的故乡情结和亲近感,而来自异乡的学生也可以通过老字号快速了解和熟悉本土文化。如提到寒亭杨家埠,首先想到的就是年画和风筝,到潍坊,外地学生总是要去品尝和乐、肉火烧等传统美食。城市记忆的建构和地域文化的传播是一个城市软实力和归属感的体现,老字号所代表的城市底蕴和文化能增强人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实现对城市中自我身份的认同。

2.3 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图书馆的基本职能就是要满足用户的知识需求。图书馆根据本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创建相关主题的特色数据库,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有助于用户方便快捷地了解当地老字号品牌的现状及历史,满足了用户高层次、多样化的精神享受,从而引领用户去实地体验和尝试,推动经济发展。

另外,原始的老字号实物也为企业商标归属权提供了佐证资料^[5],如山东阳谷景阳冈酒厂与景芝酒厂因产品景阳春的“武松打虎图”商标归属权产生纠纷时,原作画家刘继卣先生的夫人裴立的亲笔信为官司的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4 能够为师生和社会提供更全面的服务

图书馆的老字号文化建设与本校的教学、学术研究等活动密不可分。它一方面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为教师提供教学素材,促使师生共同学习和进步;另一方面,以这些馆藏资源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全面、细致的研究,有利于向社会输出新的研究成果;再次还可以为社会上对此方面感兴趣的学者提供相关的信息查询工作,为后续相关决策的制定和优化提供保障。

3 老字号文化资源建设的原则

高校图书馆地方老字号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建设机制较为复杂,当前尚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在对文化资源进行筛选和整合时,需遵循一定的原则,推进过程中还需要学校及社会各界的支持。

3.1 增强资源的多样性

传统的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通常有重文献图书、轻实物资料,重文本图片资料、轻音视频资料,重正规图书、轻内部资料等特点,导致资源类别失衡。潍坊医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本馆”)在实际收集过程中,除书籍、杂志、档案、各地市志、商业志、行业志等纸质材料外,也收集了大量网络资料以及老照片、影音介质、相关的企业证书证件、徽章、各类奖品、纪念品等小型实物,另外还将那些已经不复存在的老字号资源纳入收集范围,虽然它们已成为历史,但依然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其留存资料年代久远,更加稀缺,价值更高。

除静态文化资源外,还注重活性文化资源的收集,本馆多次实地探访相关老字号企业,采访传承人、员工、顾客或者其他知情人员,留下现场店面、产品及制作过程的图片、视频以及口授的第一手资料,全面采集不同类型、不同载体的资料档案,实现从文字到影音、从实物到虚拟的不同媒体资源的结合。

3.2 加强共享共建

早期老字号发展过程中留下的重要原始文献,实存数量有限、载体脆弱、保管难度大,好多都是孤品,被妥善保存在其他单位中。本馆与本地区公共图书馆、其他高校图书馆、文化馆、档案馆、地方志办公室、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建立了健全的协调沟通机制,与老字号企业自办的博物馆,如景芝“酒之城”文化博物馆、崔家小磨香油博物馆等实现资源共享、互通有无,获取了部分原始文献的图片复制品,避免了重复工作,减少了不必要的资源投入。

3.3 注重资源之间的关联性

关联性指资源之间或与特定主题间的关联程度。某些资源看似毫无联系,若能按某一主题进行挖掘与重组,却能够形成高附加值的记忆信息,如山东景芝酒厂的铜质厂徽、《安丘文史资料——景芝酒专辑》、酒厂自办报纸、商标,以及各类宣传图册、杂志和广告等,能够从多个侧面反映出景芝酒厂的发展与变化历史过程。再如景芝镇因盛产白酒而商业发达,许多资料中也记载了“景祥”肉制品、“芝泮烧

肉”、“春开窖”酒等品牌与景芝酒业发展过程的密切脉络传承,这些不同老字号的相关联的文献能够共同记录景芝镇历史与经济的发展。还有潍坊百货大楼1984年纪念搪瓷茶杯、带有广告语与大楼图片的信封、同时期的老照片等,也见证了其重新装修开业的时代印记。

3.4 需要多级多部门联动

进行地方老字号文化资源建设需要大量人力资源,图书馆人员都有各自的本职工作,而且缺少文史、经济、商业类专业的人员,需要与其他院系的老师进行合作研究;妥善保存和展现文献与实物资料要有足够的场地,对于一些珍贵稀有的古书籍等资料,还需要有专业的保护设备,可以适时对外进行展览;在搜集各类资源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费用,一是相关的文献需要购买;二是许多实物类物品无法通过正规采购渠道买到,仅在经营二手物品或收藏品的市场或者网店才能找到;三是还要经常出差到相关老字号企业进行调研,因此在人员、经费、场地等方面需要馆内及学校给予协调与支持。

本地的老字号文化资源建设具有地方性,许多文献作者或整理者为当地人,还需要当地的宣传部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的协助,因此在推进该项工作的过程中有必要学校出面争取当地社会各界及其他部门的支持^[6]。

4 老字号文化资源建设的步骤

我国学者对老字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遗产研究、视觉设计研究和传播策略研究等方面^[7],较少有针对老字号文化资源建设方面的研究。

4.1 原始资源的收集

首先要确定收集的目标。由于老字号文化资源品种繁多,不宜求多求全,要强调突出性,即其反映或者记录的内容能代表其所属时代。通常形成的时间越早,越具有稀缺性,但是老字号早期的相关资源很难寻找,因此也要关注近现代涉及老字号发展进程中重大活动、搬迁、易名等相关的资源,而一些内容重复、时间较晚(如2000年之后)的资源则不必收集。

收集原始资源是一个长期不懈的过程,本馆历时多年,通过日积月累的多途径搜集,现已形成老字号资源体系,并将书籍、实物分门别类进行安全存放。

为了让资源之间建立联系,还要按照地区、年代、传承的次序或者行业等进行分类并组成专题库,如老商场专题库、老工厂专题库、酒业专题库、中药业专题库等。

4.2 数字化保护与处理

利用三维扫描、摄像、数码拍摄等现代信息技术组建老字号数字资源库,有利于老字号资源的保护和宣传,同时更契合当代民众从网络渠道获取信息的习惯。

将部分书籍资料和图片等转为数字格式,对于一些原始有缺损的照片图像进行数字化修复处理,对一些意义重大的黑白照片可以考虑将其转为彩色照片,最大可能恢复其原始信息;对于书籍,由于内容和页数通常会比较多,可以只拍摄封面和目录信息,根据需要再翻阅。

数据库设计中对于原始书籍文献处理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将相关的“元数据”以文本形式抽取出来输入到表中,以方便索引及查询;二是将原始文献直接转为图片,此方式包含内容详实但不能实现快速查询。方式一中用户经常需要根据查询所得结果再回头翻阅原始文献以获取更多内容,所以我们可以将原始文献中对应的电子图片与表记录之间建立链接关系,方便用户来回查阅或自行核对。

对于一些磁带、胶片、录相带、影碟光盘中的模拟信息资料,由于直接读取会面临信号的衰减问题,衰减呈加速状态不可逆,因此在未来的工作中最好全部转换为数字音视频格式。

按照信息需求、处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三个方面对数据库进行系统设计,统一资源分类体系,优化数据库网页功能,合理创建友好的人机界面,实现老字号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各项功能并录入数据,适量应用动漫技术、3D技术等使读者获得沉浸式体验^[8],方便读者精准、快速查询到所需资料信息。

4.3 老字号文化资源的传播与推广

在当下新媒体环境下,以“三微一端”及“抖音”“B站”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由“中心”到“边缘”的权威主导模式,个体的记忆记录已经成为与集体、组织、国家同样重要的记忆的记录形式,虽然个体记忆的专业性、权威性略有欠缺,但从另一个层面上增加了个性化、丰富性与多元性。

对于老字号的记忆记录,虽然从正式渠道可以收集到大量资源,但是民间也存在大量对于老字号不同角度的认知和理解,因此需要对老字号的文化资源进行精选与整合,制作成短、中视频并发布在网络中,吸引了众多网友结合自身经历参与讨论,延伸文化传播的触角,将老字号文化记忆的传播与社交进行有机结合。这些“碎片化”记录经筛选补充到老字号文献之中,可以实现官方与民间记录的老字号记忆的统一。

学校依托图书馆举办的相关文创作品比赛、图书推荐、征文、摄影、实地考察等阅读推广活动,让学生充分了解潍坊老字号,并联合校内相关教学部门,邀请部分老字号传承人进学校,进课堂,为学生普及相关知识,通过现场展示、学生亲自主持操作等方式,强化感性认识,使学生深刻领会本地文化的无形内涵和魅力,实现文化的活态传承。

5 结语

老字号的背后是世代坚守的匠心精神,是几代人精益求精、艰苦奋斗打造出来的金字招牌,每个老字号都有一段关于诚信、品质、拼搏、创新的商业传

奇。对于老一代消费群体来说,老字号联结着其年少或孩童时的文化记忆,其价值效用体现在怀旧情怀上;对于新一代消费群体来说,老字号意味着国民大众品牌,是文化自信的象征。

老字号资源能够直观地保留和再现城市历史发展轨迹,延续社会记忆。目前本馆已经征集到大量潍坊老字号相关的文献、实物、档案、老照片等文化资源,其中有代表性的老照片百余种,包含民国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潍坊市区航拍照片多张;代表性实物60余种,有民国时期裕鲁颜料公司的厂徽、解放初景芝大众代理店木印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潍坊香油厂的带原装纸盒香油、东风百货商场的铜章等,都是目前网络上所见的孤品或少见品种,但是对于明确资料载体与城市记忆的关系,建立各个老字号间的相关性,将文献加工成综述、调研报告等形式^[9]等方面尚有欠缺,因此还要针对现存问题采取相应对策,借助信息化技术,提高文化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在互联网和移动网络中开展相关推广活动,让老字号的原生态文化底蕴得到更多呈现,让不同背景、不同地域、不同成长经历的学生了解与热爱所在城市地区,进而转换为学生为本地城市文化不断探索前行的动力。

参考文献:

- [1] 李兰.地方高校图书馆与城市文化建设[J].情报探索,2007(8):10-12.
- [2] 葛智星.公共图书馆参与地方文化传承建设的实践与策略研究:以开封市图书馆为例[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2,42(6):34-35,50.
- [3] 杨月.山东老字号品牌的传承与创新:以青州隆盛糕点为例[J].中国市场,2021(22):97-98,112.
- [4] 陈虹.试论福建高校图书馆在地域特色文化建设中的策略[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1,23(6):34-38,58.
- [5] 谢巍弘.城市记忆建构视域下我国老字号声像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策略研究[J].档案天地,2021(8):13,25-28.
- [6] 赵纪彬.高校图书馆地方文库建设相关问题刍议:以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新乡文库为例[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6(2):46-50.
- [7] 胡晓菲,庄曲昊.基于文化基因视角的青岛老字号文化传播研究[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22(1):119-124.
- [8] 刘波.公共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探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2,42(10):34-36,58.
- [9] 孙士现.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整合策略研究[J].文化产业,2022(13):101-103.

作者简介: 李林瑛,潍坊医学院图书馆讲师,研究方向为图书馆资源建设、文化遗产数字化技术;李向云,潍坊医学院图书馆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卫生统计学;于冬,潍坊医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阅读推广。

收稿日期: 2023-02-22

本文责编: 孙晓清

· 基层图书馆 ·

县级公共图书馆藏地方民国报纸开发利用探析

——以浙江省平湖市图书馆为例

沈 芳

(平湖市图书馆 浙江平湖 314200)

摘 要: 文章在对我国公共图书馆藏民国报纸收藏与保护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平湖市图书馆对馆藏地方民国报纸的开发和利用,从馆藏情况、具体做法、创新特性、取得的成效和经验总结五方面探析了县级公共图书馆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转变观念、加强支撑,培养人才、深入挖掘,融入全民阅读、扩大共享等发展建议。这将有利于基层馆藏民国报纸更好地开发、利用与传播。

关键词: 民国报纸;开发利用;县级公共图书馆;平湖市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5.3; G258.22

文献标识码: A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ocal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1912–1949) Newspapers in County-Level Public Libraries: A Case Study of Pinghu Library in Zhejiang Province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urrent state of collecting and preserving newspapers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1912-1949) in public libraries and presents a case study of a county-level public library's efforts to develop and utilize local newspapers from that era. The article provides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library's collection, specific methods, innovative features, achieved results, and lessons learned. Additionally, it proposes several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including changing mindsets, strengthening support, cultivating talent, deepening exploration, integrating with national reading initiatives, and expanding sharing opportunities. Implementing these suggestions can help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newspapers publish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in public librari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newspaper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County-Level Public Library; Pinghu Library

1 引言

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变化剧烈、学术思想活跃,短短几十年间留下了为数众多、内容丰富、价值极高的文献资料。民国时期文献目前还没有严格的书面定义,一般按照2011年5月16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的“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座谈会”上多数与会专家的观点,指“形成于1911年至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各种

知识和信息的载体”,包括“图书、期刊、报纸、手稿、书札、海报档案、电影、唱片以及非正式出版的日记、传单、商业契约和票据等”^[1]。民国报纸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值得我们关注。

笔者检索中国知网发现,2000年之前关于民国报纸的专题研究非常少,2008年以后研究有所增加,但多集中在大型公共图书馆或各大院校,来自基层公共藏书机构的研究几乎没有。在民国报纸的研究专著方面,现有著作多为报纸专题篇名索引、目录汇编、内容集成等,反映基层民国报纸专藏的特色做法

也比较少。本文通过对我国民国报纸总体情况的现状分析,介绍了县级公共图书馆的馆藏地方民国报纸开发利用个案,并提出了发展建议,以期为其他基层收藏单位及个人提供有益参考。

2 我国民国报纸的收藏与保护概况

2.1 民国报纸的藏量巨大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民国报纸方面的学术论文,笔者整理得到了《我国部分图书馆民国报纸藏量与保护成果统计表》,如表1所示。表内的几家馆藏民国报纸量相加已近12 000种,数量非常庞大。当然,这不是准确数字,专家的了解渠道、采集数据的时间、普查整理对馆藏的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藏量数据的统计。但是,表1的统计量远远大于2021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民国时期出版物总目录·民国报纸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收录的3 950种,这里有各单位收藏种类重复的原因,也有表1中的一些收藏馆不在《总目》的收录范围内的原因。另外,散布在各市、县级公共图书馆、党史馆、档案馆、博物馆、研究机构及一些私人藏家收藏的地方民国报纸数量也不在少数,未纳入系统的收录范围之内。

2.2 民国报纸的保护成果斐然

2.2.1 保护的必要性

中华古籍历来有“纸寿千年”的说法,因为古籍用纸多采用麻、皮、藤、竹等韧性天然材料由传统手工工艺制造,很好地保留了纤维属性,所造纸张坚韧柔软,呈中性或偏碱性、耐老化,更有利于翻阅及保

存。而民国时期是引进西方机械造纸技术的初期,造纸技术由传统手工向近代机械过渡。这一时期,造纸材料混杂、工艺不成熟,部分商家为追求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大量使用化学品,种种原因导致纸张质量差、酸性强、保存期短。加之报纸大多是在当地印制发行,分布广泛,呈散页状,属于“随看随丢弃”的读物。所以,民国报纸虽然仅有数十年历史,相比历史久远的宋、元、明、清古籍,反而面临更严峻的保存危机,其开发利用也刻不容缓。调研结果显示,由于纸张脆弱、不易保存、利用率高,一般情况下民国报纸的寿命是50~100年。

2.2.2 已有的保护成果

2012年1月“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民国报纸保护成果丰硕。①拍摄缩微胶片。1985年全国图书馆文献复制中心成立,现有44个成员馆即协作单位,在全国公共图书馆建立了23个缩微拍摄点,截至2010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与各成员馆共抢救报纸4 361种,如浙江图书馆为242种报纸拍摄了缩微胶片。②购买资源。如苏州图书馆购买了苏州地方特色报纸缩微胶片。③自建数据库。收藏机构以自身馆藏为基础自建书目、题录、全文等不同深度的民国报纸数据库,提供读者使用。例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开发了“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北京大学自建“晚清民国旧报刊数据库”,浙江图书馆对部分馆藏民国报刊数字化加工后,分别建成了“民国期刊数据库”和“民国报纸数据库”。④影印出版。如上海《申报自由谈》《新华日报》影印出版,广州《民国日报》影印出版。

表1 我国部分图书馆民国报纸藏量与保护成果统计表

收藏单位	民国报纸藏量	保护成果
中国国家图书馆	4 000余种	建成“民国时期文献专题资源库”
上海图书馆	3 543种	建成“中国近代中文报纸全文数据库” ^[2]
南京图书馆	2 000种	负责编成《江苏地区图书馆建国前中文报纸联合目录》,收录江苏地区近现代中文报纸1 800余件
重庆图书馆	300余种	已完成全部民国报纸数字化
吉林省图书馆	360余种	—
浙江图书馆	247种	242种民国报纸拍摄了缩微胶片,建成了“馆藏报纸数据库1937~1954”
四川省图书馆	334种	完成125种852卷429 140拍
湖南图书馆	400种	编成《湖南图书馆民国图书期刊报纸目录》
山东省图书馆	400余种	—
首都图书馆	报纸182种952册 ^[3]	2003年已全部完成书目数字化工作
天津图书馆	225种1 919册	—

⑤汇编目录。如《湖南图书馆民国图书期刊报纸目录》，收录民国时期报纸400余种。前文提到的《总目》，是当代民国文献保护工作的最新成果，对读者通过书目引导，进一步查阅所需报纸，具有现实的意义。

2022年4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其中第13条提出“做好古籍普及传播”，加大古籍宣传推广力度，多渠道、多媒介、立体化做好古籍大众化传播^[4]。这是新时代做好古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和重要遵循，为县级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民国报纸开发利用指明了方向。

3 平湖市图书馆民国报纸开发利用现状

3.1 馆藏情况

浙江平湖文化底蕴深厚，思想活跃，创办报纸较早。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刊的《平湖白话报》为平湖报纸之始。1919年的“五四”运动，促进了平湖报纸的发展，民国年间先后创办了《平湖日报》《新平湖》《民声报》《小平湖人报》等78种报纸和38种期刊。平湖市图书馆收藏了其中的60余种、3 000多张，因其品种多、内容涉及广，深受地方文史爱好者喜爱。一张旧报纸，串起一段平湖史。这些珍贵的民国报纸，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保存了大量的平湖地方文化，是读懂平湖不可或缺的宝贵史料。但是由于时间久远、纸张老化，加上反复查阅，报纸业已破损严重，不再适合直接纸质查阅。

为了解决馆藏民国报纸保护与传承的矛盾，让其更好地发挥作用，平湖市图书馆于2019年下半年启动了“平湖民国报纸阅读普及项目”。2020年以来，结合浙江省公共图书馆服务大提升工作要求，将项目推向深入。

3.2 主要做法

3.2.1 馆藏平湖民国报纸数字化

平湖市图书馆制定了《平湖市图书馆民国报纸数字化编目规则》，与当地档案馆合作，对馆藏平湖民国报纸进行扫描。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于2020年1月完成了全部馆藏民国报纸数字化，建立了平湖民国报纸数据库，为后续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3.2.2 “故纸里的记忆”民国平湖报纸云展览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平湖市图书馆一度闭馆，线下查阅停止，转为线上服务。平湖民国报纸普及活动“故纸里的记忆——民国平湖报纸展”在线上开展，以时间为序分三期，共展出平湖民国报纸52种。通过报纸“头版书影+简明文字介绍”的形式，在平湖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连续推送，广受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3.2.3 平湖民国报纸电子版免费查阅

2018年1月1日，我国首部图书馆专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正式实施，明确公共图书馆是“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开展社会教育的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平湖民国报纸数据库查阅，标志着图书馆免费全民阅读的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3.2.4 平湖民国报纸主题文创产品开发

在文旅融合发展的当下，公共图书馆已经成为展示当地文化的重要窗口和游客观光体验的重要场所，而平湖民国报纸文创产品开发无疑是宣传地方文化最直观、最生动和最有效的方式。“金平湖”智慧书房内的平湖民国报纸元素灯箱、文创产品“平湖民国报纸系列书签”、“慧阅读”文创民国报纸元素手提袋，兼具展示与实用的功能，是图书馆特藏开发融入全民阅读品牌活动的生动体现。

3.2.5 民国报纸等地方文化宣传进校园

公共图书馆与学校合作开展少儿阅读推广即馆校合作，是基层公共图书馆开展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的有效途径。“双减”政策落地减轻孩子负担的同时，对学校和家庭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是图书馆进行阅读推广的良机。平湖市图书馆结合地方传统文化开展创新品牌活动，通过“金平湖 慧阅读”品牌活动进校园，选取民国报纸中的平湖方言、历史、民俗、古桥、古迹等内容，多元化推广地方文化阅读，让孩子们在学习和体验中传承地方文化。

3.3 创新特性

3.3.1 理念创新

改变了过去基层收藏单位以藏为主的旧格局，使地方特藏资源真正让老百姓用起来。解决了民国报纸的“藏”“用”矛盾，既保护了珍贵的特藏资源，又便于当地百姓了解地方历史，方便各地文史爱好者查阅，使地方民国报纸发挥最大价值。

3.3.2 方式创新

突破了特藏普及的地域、时间限制,让普及的时空范围和活动效应不断放大。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和生活方式,对线下学习交流带来深刻影响。项目满足了疫情等特殊情况下读者的文化需求,使其可以足不出户了解地方文化,进行学习研究。提高了文献传播的效率和扩大了普及面。在线数据查询、平湖民国报纸微展、电台电视台主动宣传等方式,突破了资源收藏地点和展示文献数量等限制,传播速度更快,普及面更广。

3.3.3 机制创新

创新了立体读报服务模式,特藏服务从被动转向主动,客观上也有利于实现基层收藏单位管理、服务机制的更新。除传统纸质阅读、电子读报机外,地方文化进校园、文创产品的开发、新媒体的运用,多措并举拓展了大众了解地方文化的渠道,让尘封的历史以全新的面貌进入大众视野,贴近人们的生活,也为图书馆特藏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了思路。

3.4 取得成效

3.4.1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平湖民国报纸阅读普及项目”实施以来成效显著。平湖民国报纸电子版免费查阅服务,在保护纸质报纸的同时,大大提高了查阅效率,提高了读者对图书馆服务的满意率。相关文创产品开发,让地方历史文化走进百姓生活,使老百姓在接触中增加了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地方文化进校园,是图书馆服务“走出去”的有益尝试,“遇书芳”礼盒、“平湖老味道”笔记本、创意文化衫、帆布袋等作品,作为馆校合作活动的独特奖品,受到师生欢迎。

3.4.2 得到了相关部门肯定和媒体关注

“故纸里的记忆——平湖民国报刊微展”荣获嘉兴市首批社科普及创新项目,“平湖民国报刊阅读普及”项目荣获2020年度“浙江省社科普及创新示范项目”。2021年6月,包括挖掘地域文化的“一路书香一路风景”线路的金平湖精品书香线路发布,成为平湖市打造共同富裕“嘉兴示范”和“10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馆藏民国报纸开发利用的普及宣传,登录当地新闻媒体和广播直播。同时,文明平湖、金平湖文旅、天天快报、搜狐网等网络媒体也纷纷进行了转载、报道,活动新闻登上了浙江省社科联网站。平湖民国报纸细颗粒度标签标引

连续获得2022年、2023年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专项资金12万元/年。

3.5 经验总结

3.5.1 从“分”到“合”,地区特藏融合发挥最大效益

平湖民国报纸,以当地图书馆和档案馆收藏为主。长期以来,两家单位共同面临的问题是:民国报纸以藏为主,开发利用有限;收藏报纸不全,无法提供一站式服务,导致查阅者为了一份资料往返辗转;馆藏民国报纸纸张老化严重,加上反复查阅导致破损,纸质查阅难以为继而且效率低下;无法提供数字阅读,馆藏民国报纸数字化经费紧张。平湖市图书馆与平湖市档案馆合作开展平湖民国报纸数字化后,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平湖市图书馆建立了“平湖民国报纸数据库”并免费向读者开放,平湖市档案馆增加了档案收集,在保护自有馆藏的同时,两馆都丰富了馆藏,提高了对外服务能力。读者的查阅效率和对两馆服务的满意度同步提高。

3.5.2 从“藏”到“展”,特藏开发融入全民阅读推广

特藏开发利用融入平湖市全民阅读节系列活动。云上展览突破了地域与时间的限制,突破了资源收藏地点和展示文献数量限制,普及面更广,传播速度更快。“故纸里的记忆——平湖民国报纸微展”的文章点击近2000次,读者评论踊跃,金平湖文旅、文明平湖等媒体都进行了转发,反响超过预期,大大满足了疫情等特殊时期读者对地方文化的需求。线下活动如民国报纸等地方文化宣传进校园、暑期阅读夏令营,“一路书香一路风景”地方文化体验精品书香线路等,将本土传统文化注入阅读,是优秀案例吸引群众参与全民阅读的有益尝试。

3.5.3 从“看”到“用”,创新立体阅读特藏服务模式

运用多种手段,多元化推广地方文化阅读。提供传统纸质阅读、电子读报机、民国报纸数据库、地方文化数据库等,保障读者基础阅读的权利。结合地方传统文化开展品牌活动进校园,让孩子们在学习和体验中传承地方文化。开发平湖民国报纸文创产品融入全民阅读推广活动,让老百姓在接触中增加对当地文化的了解。新媒体的运用,拓展了大众了解地方文化的渠道。当地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微信、网站等网络媒体纷纷对平湖民国报纸利用情况进行报道,图书馆工作人员走进直播间推介,与广大读者互动,让地方历史文化传播贴近百姓的生活。

4 发展建议

4.1 转变观念, 加强支撑

民国报纸不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对文旅融合的当下更具有现实意义。要充分认识民国报纸对图书馆馆藏的重要意义, 认识民国报纸开发和利用的紧迫性。要提供系统有利的制度保障, 如制定年度开发计划、相应的倾斜政策和激励措施等。采用项目化运作, 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的基础上, 将地方民国报纸开发利用列入本单位常规项目, 争取政府主管部门和地方财政的支持, 从设施设备、资源、人员、经费等方面, 保证民国报纸开发利用的全面开展和实施。争取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专项资金支持, 对已经数字化的民国报纸, 深入进行细颗粒度建设和标签标引, 为进一步内容开发做准备。

4.2 培养人才, 深入挖掘

民国报纸的开发利用需要具备较高的历史、文学、计算机等多元兼容知识素养的专业人员。要求熟悉民国各阶段历史, 掌握当时的出版动向, 了解当时地方的重大事件和典型人物等等。基层图书馆一方面可通过人才招聘、馆员深造和开设地方文化专题研究班等引进和培养专业人才, 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 另一方面可通过开放合作、多馆共建,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等方式提升综合实力。以自身发力、相互借力, 加大数字化开发力度, 建立专题目录、索引, 进行影印出版、专题汇编、数据库开发等。结合馆藏民国报纸特色、读者分析和社会需求,

加快报纸内容分析研究^[5]、读者层次分析和推广手段研究。

4.3 融入全民阅读, 扩大共享

将民国报纸的开发利用、文献传播, 与图书馆全民阅读推广有机结合。树立优秀案例吸引群众积极参与, 广泛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和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 加强活动宣传, 扩大社会影响。聘请相关专长人员、地方史专家担任图书馆的顾问。通过开展特色地方文化活动、制作地方特色题材音视频节目推介, 深化特色文创开发等图书馆创新服务, 为不同年龄层次读者打造各具特色的服务, 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 吸引和服务全年龄读者。加强与其他文旅场馆、各类学校、档案馆、企事业单位及其他民国报纸收藏单位的广泛合作, 共享成果, 合作共赢。

5 结语

民国报纸是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理地开发利用民国报纸, 是新时期满足社会各界读者多元阅读需求的需要, 也是特藏资源实现时代价值和图书馆自身发展的需要。图书馆收藏资源的根本目的, 就是为了让读者用起来。所以, 加快民国报纸的数字化, 建立地方特色数据库, 索引发现和收录更多地方民国报纸资源; 健全阅览制度, 丰富阅读方式, 加强民国报纸内容研究和普及; 将民国报纸开发利用融入全民阅读推广, 为读者提供更便捷、更多元的阅读服务, 才是基层民国报纸收藏单位特藏服务的正确打开方式。

参考文献:

- [1] 马子雷. 存世数量巨大 保护难度超过古籍: 国图报告献策民国时期文献保护[N]. 中国文化报, 2011-05-19(2).
- [2] 蔡迎春, 段晓林. 上海地区民国文献整理现状与对策[J]. 出版发行研究, 2017(7): 105-108.
- [3] 林岫. 晚清至民国报刊的保护与开发: 以首都图书馆为例[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20(4): 114-116.
- [4]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EB/OL]. [2022-04-11]. http://www.gov.cn/jzhengce/2022-04/11/content_5684555.htm.
- [5] 杨佳颖, 许鑫. 民国报纸广告图像资源的语义标注: 以《新闻报》所刊的越剧广告为例[J]. 图书馆杂志, 2021(3): 96-102.

作者简介: 沈芳, 平湖市图书馆副馆长、馆员, 研究方向为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阅读志愿服务。

收稿日期: 2023-01-05

本文责编: 郑秀花

· 基层图书馆 ·

舟山地区海岛“微信图书馆”的建设实践

袁素霞

(舟山市图书馆 浙江舟山 316021)

摘要: 舟山是海岛地区, 117万常住人口分布在140个海岛上, 传统图书馆服务难以有效覆盖偏远海岛, 迫切需要建设适应海岛环境特点的数字化图书馆。借助微信服务平台的巨大传播力, 舟山以市、县(区)公共馆、乡镇分馆、基层村级(社区)图书室四级为管理体系, 以覆盖更大群体、增强双向互动、改进用户体验、拓展特色功能、做强优势资源为建设思路, 积极回应群众对海岛图书馆公共服务的需求, 采用一体化设计创新构建了海岛“微信图书馆”服务系统, 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关键词: 微信图书馆; 海岛; 功能设计; 舟山地区

中图分类号: G250.7

文献标识码: A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WeChat Library for Island Areas: A Case Study of Zhoushan Region

Abstract Zhoushan, as an island region, is home to a population of 1.17 million residing across 140 islands. Traditional library services struggle to effectively cover remote islands, highlighting the urgent need for a digitized library tailored to the unique island environment. Leveraging the extensive reach of the WeChat platform, Zhoushan has established a four-tier management system comprising municipal, county (district) public libraries, township branches, and grassroots village-level (community) libraries.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expanding coverage, enhancing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improving user experiences, introducing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strengthening valuable resources, Zhoushan has responded actively to the public demand for island library services. By integrating design innovation, an island-specific "WeChat Library" service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yielding positive outcomes.

Key words WeChat library; island; functional design; Zhoushan region

1 引言

图书馆事业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推动实现人民“精神富足”的重要载体。国家和浙江省对加快图书馆服务数字化、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有明确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规定: “推动公共图书馆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向社会公众提供便捷服务。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加强数字资源建设、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 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献信息共享平台, 为社

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1]《浙江省公共图书馆服务提升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大力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全省公共图书馆延伸覆盖, 积极推进公共图书馆服务便利化、智慧化、人性化、特色化、规范化。”^[2]

“将微信服务与公共图书馆相关服务相结合, 是一种全新的终端数据服务体验, 也是当前公共图书馆服务发展的大趋势。”^[3]在即时通讯工具中, 我国微信用户使用量名列前茅, 微信成为使用最便利、用户最庞大的网络平台。随着微信公众平台的广泛使用, 自2013年以来, 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都陆续开通了

微信公众号。舟山市顺应数字化改革的大背景,借助微信服务平台的巨大传播力,积极推动数字化改革,以市、县(区)公共馆、乡镇分馆、基层村级(社区)图书室四级为管理体系,以“满意图书馆”各项指标为标准,积极回应群众对海岛图书馆公共服务的需求,采用一体化设计创新构建了海岛“微信图书馆”服务系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2 舟山海岛“微信图书馆”的建设背景

2.1 舟山海岛及人口分布的客观制约

舟山是海岛地级市,区域面积2.22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08万平方公里,陆域面积仅为1440平方公里,2800多个岛屿像珍珠撒落在广袤海域中,是典型的海洋大市、陆地小市。全市共有常住人口117万,分布在140个住人岛屿,其中有60多万人居住在舟山本岛之外的离岛,人口居住分散,岛际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共享差,公共服务短板明显,给公共图书馆传统服务普及带来客观制约。

2.2 海岛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失衡

截止到2023年3月,舟山市布局建设市级图书馆1家、县区图书馆4家,图书馆分馆43家、城市书房40家、图书馆外流通站482家,在舟山本岛以及万人以上大岛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公共图书馆实体服务网络。但是人口稀少的偏远小岛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单元不配套等情况,图书分馆、城市书房、市级基层流通点在小岛上分别只有14家、9家、89家。也就是说,140个住人岛屿的公共图书服务机构(点位)只有112家,还没有实现全覆盖。因此,迫切需要建设适应海岛环境特点的数字化图书馆,“用数字空间实现对现实空间的定量认识”^[4],发挥线上资源和途径的优势,有效弥补线下服务网络的不足,推动资源要素配置最优化、价值最大化,丰富海岛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更好地推动公共文化事业的传播,最大程度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2.3 智慧城市建设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舟山市图书馆事业建设蓬勃发展,为舟山市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来源,为广大市民和渔农村群众提供了丰富有益的精神食粮,使市民的文化生活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受制于种种条件限制,普及程度仍未达到理想状态,给读

者带来较多不便之处。微信图书馆作为数字图书馆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数字化改革的推进,更加注重向“智能服务型”发展。创建具有鲜明海洋特色的微信图书馆服务系统,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提高广大市民的文化素质和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3 舟山海岛“微信图书馆”建设实践

3.1 建设思路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改革的深入,一些地市顺势应时纷纷构建公共图书馆微信服务平台,但在具体运行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受众面狭窄、栏目设置缺乏特色、用户体验欠佳、线上线下统筹不够、宣传途径单一等,需要持续改进提升。舟山海岛“微信图书馆”在建设前期就充分借鉴了各地微信图书馆建设经验,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紧密联系舟山海岛实际,以公共图书馆核心业务梳理为基础,推进流程优化、制度重塑、系统重构、迭代升级,努力推动传统图书馆转型、微信图书馆发展。其整体建设思路如下。

第一,覆盖更大群体。将传统的线下覆盖与线上覆盖结合起来,在目标群体上兼顾市民读者、游客、小岛居民、在校学生、新市民、重大项目建设者、出海渔民等各类人群。充分利用小岛上的文化礼堂、海岛驿站、幸福食堂、便民服务场所以及项目党建、红帆渔船等载体,并在宾馆酒店民宿和旅游场所设置微信二维码,使读者可线上扫码办理电子读者证,随时访问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切实加大海岛“微信图书馆”的宣传推广力度。将微信图书馆同步上线到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浙里办”APP,最大程度方便市民和游客,推进主客共享,高质量推进“一网通办”。

第二,增强双向互动。围绕改进系统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交互,强化问题咨询、荐购系统等模块建设,设立自动回复叠加人工回复功能,为用户分享心得、推荐借阅和价值共创设立特定版块,有效改变微信图书馆时效性低、实用性差的通病,提高用户的满意度。同时有机结合线上线下活动,不时在线上分享线下活动照片、视频,组织在线直播等,多渠道丰富线上活动内容,提高读者对图书馆服务的认知及关注程度。

第三,改进用户体验。顺应数字化技术迭代,立

足广泛的用户调查,不间断地改进微信图书馆界面设计,优化界面风格、配色、图标、排版及栏目设计。加强底座技术支撑,推进算法库、知识库、工具库协同共建,切实改进界面打不开、页面跳转慢、乱码现象多、书签功能缺乏、全文无法阅读等问题。加强对微信图书馆的有效管理,组建微信图书馆运维团队,保证读者咨询、后台维护、内容编辑及宣传推广等服务到位。

第四,扩展特色功能。根据海岛实际,研发图书漂流、自主还书、图书荐购等功能模块,延伸线上优势,实现一键借还、一键荐购,有效解决海岛借书还书不便的实际难题。同时基于读者对微信图书馆平台的实际需求,加强图书预约、资源检索、数字资源在线书库、个人阅读报告等模块建设,开发馆内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虚拟专用网络),确保用户随时随地使用和获取各种信息资源。为到馆读者提供线上服务,完善活动报名及签到、场馆预约、车位预约、座位预约等功能,使图书馆管理服务更加有序。

第五,做强优势资源。切实改变数字资源同质化、优质自建资源少的现象,结合地域特色,加强对馆藏资源的挖掘、利用和再创造,打通数字图书馆在线通道,发挥微信图书馆知识领航作用,打造佛教文化、海洋文化、地域文史、自贸试验区、海事服务等具有舟山特色的专题资源库。

3.2 架构与功能设计

海岛“微信图书馆”在舟山数字图书馆整体架构基础上进行设计,是将舟山数字图书馆常用功能移植到微信公众号,实现基于微信端的掌上应用。

3.2.1 基本功能

基本功能包括基本读者服务、读者咨询服务和其他基本服务。强化“基本读者服务”这个最基本功能,通过抽取舟山数字图书馆系统的读者服务和资源管理两个功能中高频事务,结合微信公众号特点进行重组设计,包括资源检索、图书预约、数字资源在线书库、服务指南、公告预告、读者中心等具体功能。拓展读者咨询服务,读者可自由选择常见问题解答、人工在线咨询、机器人咨询、在线填单咨询四种咨询方式,咨询形成的问题和解答会自动导入知识库,方便读者查询,并支持文本、语音、视频、留言板、电子白板、手机二维码扫描对话。做好其他基本服务,包括活动报名及签到、场所预约、个人阅读报告、个人积分、志愿者服务等功能。

3.2.2 特色功能

(1)读者荐购服务。一是通过线上线下便捷优势,帮助图书馆快捷了解读者需求,实现“读者要读,图书馆购,到书通知,及时借阅”闭环服务读者链路。二是与新华书店、欢喜书店、岛上书店等联合推出线上线下的“岛与快借”项目,只要是书店展列的图书,无论图书馆有没有馆藏,读者都可以即刻借走新书,同时书店每周新书都会链接到微信图书馆,为读者荐购提供便利。三是根据读者在亚马逊、当当网、孔夫子旧书网、淘宝等平台上的浏览记录,系统自动推送相关书籍。读者荐购服务体现服务读者理念,让读者能更方便获得自己想要的服务,也能让管理员更好地了解读者需求,同时完善图书馆服务体系。读者可查看最新图书、人气排行、院系专业、中图分类、专题推荐、我的推荐、期刊荐购,各个功能模块风格一致,且呈网络状互相交叉。读者可了解图书信息,可选择进行荐购,可在人气排行里看到荐购次数排名,可将荐购名次排列输出文本进行筛选,方便购买。

(2)自助借还服务。舟山是海岛地区,岛际交通十分不便。自助借还服务作为海岛“微信图书馆”特色功能,能帮助读者实现自助移动借还。在没有条件配置自助借还机的图书流通点、农家书屋、旅游景点、旅游船等场所,图书管理员在输入编号登录后可以通过手机扫条形码、扫身份证号,为读者进行借书、续借或者还书,还可以为读者办理读者证。在城市书房、文化礼堂、车站码头等放置还书箱的场所,读者通过扫描还书箱上的二维码,再依次扫描要还书的条码,然后将扫描完成的图书放入还书箱,完成自助还书。

(3)图书漂流功能。读者与图书自动匹配轨迹漂流是微信图书馆漂流模块采用的核心技术之一,充分利用定位技术与图书和读者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促进图书等资源有效流动,有效解决不同图书场馆、城市书房图书资源不足的问题。该功能充分利用了微信、手机、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定位系统)三者结合的能力,将人、手机、图书完美结合在一起,以“手机定位人,以人定位书”为纽带,实现图书漂流。转借者通过微信图书馆发布转借的图书,求书者通过搜索功能寻找需要的书籍,系统自动定位求书者位置,按照距离筛选匹配发布的转借图书资源,匹配成功后自动发私信给求书者和转借者,通过求书者和转借者交换,完成图书的轨迹漂

流。舟山“微信图书馆”通过图书馆漂流模块实现图书100%的流通率。图书漂流功能主要包含漂流图书书目管理、漂流图书二维码生成、图书漂流轨迹、漂流图书书评和个人信息完善、漂流数据统计、漂流日志管理等功能。

3.3 具体实践及成效

截止到2023年3月底,舟山市图书馆微信关注人数达到12.35万人,较上年同期增长72%;资源访问量达到22.5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增长61%;移动端数字资源访问量达到15.8万人次。微信图书馆对实体图书馆作了十分有益的补充,有效弥补了海岛传统公共服务资源的短板。

第一,海岛全域覆盖。舟山有一半以上常住居民在小岛,一批国家级的重大工程项目几乎都在海上,如鱼山石化基地5万名建设者、海上作业6万多名渔民都是微信图书馆的重要客户群。微信图书馆在全市140个住人岛屿实现全覆盖,打造成为小岛居民身边的图书馆。服务重大工程项目,在重大项目建设工地、工人宿舍以及周边公共文化场所,设置新颖的数字阅读墙,墙上附有醒目的微信图书馆二维码,罗列了不少推荐的电子书目,尤其是针对性地提供大量与工程项目有关的电子书籍,并在书目左下角附上小程序二维码,供职工扫码阅读。服务海上作业渔民,打造海上流动图书馆。一方面送书上船,为渔民提供精神食粮;另一方面,推广微信图书馆,让渔民随时可以访问在线书库,并推送他们需要的政治时事、军事地理、文化艺术、渔业生产等数字资源。

第二,推动统筹融合。在海岛“微信图书馆”建设中,由舟山市图书馆牵头统筹规划,围绕数据采集、归集、整合、共享、开放、应用等全生命周期构建公共数据平台;下属县区馆全面实行一体联动、应用推广,推进数据贯通、业务贯通、应用贯通,避免各馆重复建设和浪费资金;同时采用统一的总体功能、不同的用户界面,并打造分级分布式数字文化资源库群,优化资源结构,提升资源质量,激发数据要素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达到微信图书馆数字资源全域共享、全市使用的目的。打通了与“浙里办”等平台的关联,海岛“微信图书馆”功能已同步上线到“浙里办”APP,市民游客可通过“浙里办”APP进入舟山海岛“微信图书馆”,享受便捷的个性化掌上办事服务。积极推进馆校融合,试点将市教育服务中

心、舟山第一初级中学、舟山一小集团、南海长峙小学等纳入市公共图书馆系统管理,实现图书管理系统和借还规则“一体化”,实现图书资源、数据库资源、推广活动互通共享,这在省内属首创。后续将拓展至全市符合条件的中小学。

第三,系统迭代升级。在原舟山数字图书馆基础上,重新设计了所有的用户界面和功能,保留读者登录、办证、查询等功能,开发场馆预约、读者反馈、附近图书馆、重要通知、扫码借书、重要通知等功能,保留了人脸识别接口,大大拓展了服务的内容和深度。微信图书馆采用模块化设计,挂接H5功能页面,在前期开发基础上,不断更新迭代产品版本,并根据读者的需求以及图书馆事业发展不断地增加特色功能。如在基本功能的“读者中心”增加了“问卷调查”,在其他基本服务中增加了“志愿者管理”,在特色功能上增加“读者荐购服务”,更加贴近读者,贴近图书馆实际需求。积极引入“元宇宙”产品的概念,将智能机器人带进微信图书馆,为用户提供一个新的平台,在更具沉浸感和互动性的方式下访问图书馆资源和服务。随着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发展,用户可以进入一个模拟物理图书馆环境的数字世界,以更富吸引力的方式浏览,与资源互动。

第四,突出特色资源。“一直以来,图书馆将资源保存作为地方文献资源工作的重点,往往忽视对地方特色资源的整合利用和宣传推广,微信平台作为一种高效便捷的线上推广方式应该受到重视。”^[5]海岛“微信图书馆”提供丰富的数字资源服务,对外服务数字资源总量达240T,可挂接任何支持远程访问的电子资源、特色文献库,并支持在线阅读。重视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利用和推广,建设了普陀山观音文化特色库、舟山方志、舟山群岛数据库、舟山文化话语等特色资源,创建了海洋文化、自由贸易、海事服务等具有舟山特色的专题库,并通过海岛“微信图书馆”平台将舟山本地文化、特色资源更多地介绍给本地、省内甚至全国的读者和游客。设置专栏推荐舟山本土作家著作、地方志、舟山文史、非遗文献等,引发海岛读者的共情。

第五,促进文旅融合。舟山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旅游业蓬勃发展。舟山微信图书馆旨在引领海岛特色旅游,“尝试开辟公共图书馆与旅游相融合的信息服务新途径”^[6]。如每月一期推出“阿拉舟山人”文旅

融合主题系列,在“游在舟山系列”专栏基础上,更新推出“专家带你游舟山”系列31期,“小岛你好·一岛一游”系列6期,全方位介绍舟山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面向大众读者和市民游客开展新媒体推广服务实践,较好地宣传了海岛文化旅游资源,扩大了旅游知名度,彰显了公共图书馆在促进文旅融合中的独特优势。在海岛“微信图书馆”点击量排名前十的文章中,“专家带你游舟山”系列主题占了6篇之多,足以说明市民游客对文旅融合时期公共服务的期待,这也成为我们今后进一步努力的重要方向。

4 结语

舟山海岛“微信图书馆”以“精读化”“个性化”“智能化”为主要特点,整合了海量数字资源,创新性地采用了一体化设计,引入了大数据分析处理技术提升系统的智能化,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模块提升机器人自动化咨询服务,以读者为中心,不断

提升服务品质。但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海岛“微信图书馆”以本地需求为主,虽已同步上线到“浙里办”APP,但仍缺乏与上级业务部门的主动对接和应用贯通。二是侧重部门核心业务数字化并有效解决业务关键问题,但与当地高校、教育部门、档案部门等的横向协同不够,数据共建共享和贯通不足。三是对应用尚没有开展系统全面的使用评估,项目建成后评价和特色推广有待加强,数据价值实现比较薄弱。下一步要聚焦聚力上述三个方面,进一步做好海岛“微信图书馆”应用的改进和提升工作。

“相信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无线上网网速加快和上网资费降低,以及移动终端设备进一步普及和性能提升,未来利用‘微信图书馆’服务将成为趋势。”^[7]舟山市图书馆将继续拓展海岛“微信图书馆”功能和服务,推进相关应用和功能的深化和持续开发,加快系统迭代升级,以海岛“微信图书馆”带动全民阅读,传承岛城文脉,传播优秀文化,构建精神家园,促进社会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EB/OL].[2022-09-10].<http://www.npc.gov.cn/npc/c12435/201811/3885276ceafc4ed788695e8c45c55dce.shtml>.
- [2] 中共浙江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办公室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关于印发浙江省公共图书馆服务大提升行动方案(2020—2022年)的通知[EB/OL].[2022-09-10].http://www.jinyun.gov.cn/art/2020/9/25/art_1229368921_59048778.html.
- [3] 胡晶晶.公共图书馆微信服务的现状与对策[J].新西部,2017(34):50-55.
- [4] 袁家军.数字化改革概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8.
- [5] 孟姗姗,秦鑫鑫,韩雷.文旅融合视阈下微信公众平台助力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宣传推广研究:基于全国43个省级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的实证研究[J].新世纪图书馆,2021(9):88-93.
- [6] 岑映,方芳.新媒体在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推广中的应用:以舟山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为例[J].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3,40(1):84-88.
- [7] 陈深贵.手机图书馆的可用性研究:以上海手机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2013(4):125-127.

作者简介:袁素霞,舟山市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公共文化空间建设。

收稿日期:2022-12-21

本文责编:王晓琳

· 文献学研究 ·

《史汉异同补评》的版本及体例^{*}

王悦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016)

摘要:凌稚隆《史汉异同补评》基于刘辰翁《班马异同评》成书。经考察,《史汉异同补评》以李元阳嘉靖刻本《班马异同评》为底本。《史汉异同补评》大体上延续了《班马异同评》的体例,某些评点篇目略有变化。因凌稚隆出版家的身份,是书字体、版面、勾画标记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美观大方,整洁舒朗,便于读者查阅、比照。《史汉异同补评》主要是刘辰翁和凌稚隆评语的合刻本,兼收其他学者的评语,其成书过程较为复杂,也因此构成了其特殊的评点文本形态。

关键词:《史汉异同补评》;《班马异同评》;版本;体例;空心矩形框

中图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识码:A

Editions and Structure of *Supplement of the Comments o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hih Chi and Hanshu*

Abstract Ling Zhilong's *Supplement of the comments o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hih Chi and Hanshu* was based on Liu Chenweng's *Comments on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Shih Chi and Hanshu*. Upon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edition used as the basis for *Supplement of the Comments o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hih Chi and Hanshu* was the Jiajing edition of Li Yuanyang's *Comments on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Shih Chi and Hanshu*. Overall, *Supplement of the comments o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hih Chi and Hanshu* follows the structure of *Comments on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Shih Chi and Hanshu*, with slight variations in certain sections. As a publication by Ling Zhilong, a publishing expert, the book demonstrate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ypography, layout, and annotation, resulting in an aesthetically pleasing, clear, and reader-friendly format for easy reference and comparison. *Supplement of the Comments o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hih Chi and Hanshu* primarily consists of annotations by Liu Chenweng and Ling Zhilong, along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other scholars. The complex process of its compilation has resulted in a unique textual form for the annotations.

Key words *Supplement of the Comments o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hih Chi and Hanshu*; *Comments on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Shih Chi and Hanshu*; edition; structure; hollow rectangular frame

明代凌稚隆生于乌程晟舍凌氏家族,自幼受家学滋养,酷爱《史记》《汉书》。几番科场失利后,他将精力投向了出版业,并做出了一定成绩。凌稚隆一生无功名,以著述名于世。他的《史记评林》和《汉

书评林》是明中期集大成的汇评之作,二书分别汇集了历代文人关于《史记》《汉书》的评语,受到文人士子的欢迎。《史汉异同补评》三十二卷,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成书,是凌稚隆在刘辰翁《班马异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3&ZD11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班马异同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FZW011)研究成果之一。

同评》的基础上补评而成的一部评点著作。书中评语涉及到文学、史学、文献学等,对研究凌稚隆的评点具有很大价值。

1 《史汉异同补评》的成书

我国从汉魏六朝开始就有了对《史记》《汉书》的比较分析。到宋代,班马异同问题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出现了专评二史异同的著作《班马异同评》。南宋倪思的《班马异同》着眼于二史的文字异同,将《史记》正文用大字表示,《史记》无而《汉书》所加者用细字表示,《史记》有而《汉书》删去者以墨字勒于其旁,直接开创了史汉异同比较学。《班马异同》35卷,又名《史汉异同》。《平津馆鉴藏书籍记》“《班马异同》卅五卷”条云:“题‘宋倪思撰,元刘会孟评,明李元阳校’。前有目录一卷,后有永乐壬寅杨士奇跋,嘉靖丁酉汪佃序。据杨、汪两跋,此书本名《史汉异同》,不题撰人姓名。旧未有刻本,李元阳付梓,据《文献通考》,题作倪思,改名《班马异同》。”^[1]

南宋刘辰翁后评《班马异同》。刘辰翁对倪思标记之处多予以评论,亦涉及到倪思未标记或难以标记的方面,如章法、布局等,遂成《班马异同评》(35卷),后世也称《班马异同》。是书将文字异同与文学评点紧密结合,刘之评语被明代杨士奇赞为“臻极精妙”^①。《班马异同评》对后世“史汉比较”有重大启示,如许相卿《史汉方驾》、凌稚隆《史汉异同补评》皆受其影响而成书。刘辰翁评语无专刻,仅附《班马异同》以行。

唐守礼在《史汉异同补评序》中直接解释了《史汉异同补评》的成书缘起:“吾以栋频年沈酣二书,即异同了了齿颊,无俟取覆。顾独念世之业两作者,俾得周览,而旧刻不具载两家全语,劳苦翻阅,终成厌弃,故为别书而并存之,辑评其上。”^[2]由此可得,因《史记评林》《汉书评林》分别收录《史记》《汉书》评语,难以同时体现凌稚隆对二书的看法,为解学者翻阅之烦,凌另为《史汉异同补评》一书。《史记评林》和《汉书评林》收录了历代文人及凌稚隆同时代文人的评语,按语中也表达了凌稚隆的观点,但二书意在搜辑历代资料,便于读者查阅,凌稚隆之评较为零散。而《史汉异同补评》所收凌稚隆之评,内容涉及字词、句法、文法、史法等各个方面,全书虽

仅三十二篇,但因其体例特殊,较之《史记评林》《汉书评林》,能更集中地反映凌稚隆的评点思想。

《史汉异同补评》的版面分为上下两栏,下栏内容大致与《班马异同评》相同,录《史记》《汉书》原文。上栏眉批较为复杂,一部分是选录刘辰翁及其他学者的评语,另一部分是凌稚隆自己的评语。从书名即可看出,这些评语大多考察《史记》《汉书》之异同,并论其得失。

2 《史汉异同补评》的版本

《史汉异同补评》刻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仅有明万历凌氏刊本存世,现藏于重庆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台湾图书馆。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云:

《史汉异同补评》三十二卷,明凌稚隆撰。明万历刻本^[3]。

《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云:

《史汉异同补评》三十二卷,明凌稚隆撰。明万历间刻:南京、华东师大、重庆^[4]。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记载:

《史汉异同补评》存三十三卷十册,宋倪思撰,旧题宋刘辰翁评,明凌稚隆订补。明万历年间吴兴凌氏刊本,缺卷三十四、三十五^[5]。

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著录《史汉异同补评》:

《史汉异同补评》存三十三卷十册,明万历年间吴兴凌氏刊本。宋倪思撰,旧题宋刘辰翁评,明凌稚隆订补。稚隆字以栋,号磊泉,乌程人^[6]⁹⁸。

《四库存目标注》卷一二史部正史类“《班马异同》三十五卷”条解题中在梳理《班马异同》版本时,涉及到了凌稚隆的增评本:

明万历凌稚隆刻本,作《史汉异同补评》三十五卷,题“宋倪思编,元刘会孟评,明后学凌稚隆订补”^[7]。

《史汉异同补评》一书的版本情况如上所述。台湾图书馆本和重庆图书馆本相差无几,仅几条评语一收一无。

《晟舍镇志》将《倪思史汉异同补评》系于凌濛初下^②。然《史汉异同补评》一书于书题之下明确署:“宋倪思编,元刘会孟评,明后学凌稚隆订补”,且书

中评语多以“稚隆曰”发端,从未出现凌稚隆之侄凌濛初之名,该书为凌稚隆所作无疑。此条记录讹误。值得注意的是,多篇论及凌濛初著作的论文都将《史汉异同补评》归在凌濛初之下,或与《晟舍镇志》的误记有关。

刘辰翁《班马异同评》35卷,有两大版本系统。一为明嘉靖李元阳刻本,一为明万历韩敬序刻本。据王晓鹏《〈班马异同评〉研究三题》中的考证,这两个版本的差别主要有二:一是次序不同。李元阳刻本卷33为《滑稽》,卷34为《日者》,卷35为《货殖》。韩敬序刻本卷33为《货殖》,卷34为《滑稽》,卷35为《日者》。其他各卷次序相同,只是叙述偶有差异,如嘉靖本卷2为《汉高》,万历本卷2称《高祖》;嘉靖本卷12为《张苍 周昌 赵尧 任敖 申屠嘉》,万历本卷12称《张苍 周昌 任敖 申屠嘉》,缺“赵尧”;嘉靖本卷31为《游侠 鲁朱家 田仲 剧孟 王孟 郭解》,万历本卷31则称《鲁朱家 剧孟 郭解》,缺“游侠”“田仲”“王孟”。二是两本所附序跋不同,嘉靖本有杨士奇跋和汪佃序文,万历本附有韩敬序文和杨士奇跋^[8]。

此外,通过对比《班马异同评》两个版本,还有新的发现——嘉靖本卷22称《李广 孙陵》,万历本卷22题《李广 李陵》。李陵是李广之孙,嘉靖本“孙陵”二字比“李广”二字小,用以提示李广与李陵的关系,但易造成传主姓孙名陵的误解。万历本直接用“李陵”,字体大小一致,消除了歧义。万历本后出,应比前本有所发明、进步,消除歧义或为万历本改为《李广 李陵》之故^③。嘉靖本卷24称《卫青 霍去病 公孙贺 李息 公孙敖 李沮 赵食其 曹襄 韩说 郭昌 荀彘 李蔡 张次公 苏建 赵信 张骞 路博德 赵破奴》,万历本则称《卫青 霍去病 李息 公孙敖 李沮 张次公 赵信 赵食其 郭昌 荀彘 路博德 赵破奴》,传主人数、次序稍有变化。

据比照,《史汉异同补评》应以明嘉靖李元阳刻本《班马异同评》为底本成书。原因有二:第一,万历本年份稍晚。韩敬生于1580年,而凌稚隆在1590年左右就已去世,此时韩敬仅10岁左右,几乎无刊刻万历本《班马异同评》的可能性。第二,《史汉异同补评》的体例和内容大都本于嘉靖本《班马异同评》,仅第33篇、第34篇、第35篇的目录名目与嘉靖本次序不同,却与万历本《班马异同评》相同。嘉靖本《班马异同评》第33卷为《滑稽 淳于髡 优孟 优旃》、

第34卷为《日者 司马季主》、第35卷为《货殖 范蠡 子贡 陶朱 白圭 猗顿 卓氏 乌氏 程郑 宛孔氏 宣曲 刁间 师史 任氏》。万历本《班马异同评》第33卷为《货殖 范蠡 子贡 白圭 猗顿 乌氏 寡妇 清 卓氏 程郑 宛孔氏 邴氏 刁间 师史 任氏》、第34卷为《滑稽附 淳于髡 优孟 优旃》、第35卷为《日者附 司马季主》。万历本《班马异同评》第33卷、第34卷、第35卷名目的次序都与《史汉异同补评》相同。且“货殖”篇中“子贡”与《史汉异同补评》称呼一致,不复嘉靖本《班马异同评》中的“子贡”。考察年代,《史汉异同补评》成书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正好在《班马异同评》嘉靖本和万历本成书之间,万历本后出,很有可能参考过嘉靖本《班马异同评》及万历本《班马异同评》,这从时间上来说是合理的。

因嘉靖本与本文所用底本有最大相似性,《史汉异同补评》以嘉靖本为底本的可能性也最大,故对比研究时参考嘉靖本《班马异同评》,《班马异同评》书影亦选自嘉靖本。

3 《史汉异同补评》的体例

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对《史汉异同补评》一书之体例有所阐述:

版匡高18.1公分,宽14.01公分。左右双边。每半叶九行,行十九字,注文小字单行,字数同。版心花口。最上方记书名篇第(如“史汉异同补评第一篇”),下方记叶次,最下方记刻工。书眉附刻刘辰翁评、凌稚隆补订之文,并以墨圈别出。刻工名:自、安、英、仕、付、佑等。阙卷三十四、卷三十五。

首卷首行顶格题“史汉异同补评第一篇”,第二至四行低十格题“宋倪思编 元刘会孟评 明后学凌稚隆订补”。第二篇后有尾题。第二册至第十册封面左上方墨字题“史汉异同补评”,下小字各篇篇名。右上方则题各篇篇第。卷首有己丑孟冬颜正色《题史汉异同补评》、唐守礼《史汉异同补评序》。序后有,目录。第二十四篇二十三叶并第三十三篇以班马异同钞补。第一册有墨笔断句。

书中钤有“‘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墨香阁图书”朱文长方印^{[6]98-99}。

《四库存目标注》卷一二史部正史类“《班马异同》三十五卷”条解题中论及《史汉异同补评》的体例：

半叶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书眉刻刘辰翁评、凌稚隆补评，以墨围识别。版心下有刻工：自、安、英、仕、付、佑等。前有万历十七年己丑孟冬闽龙溪友人颜正色序云：“兹《史汉异同补评》行，会不佞行役过吴兴，式以栋之庐，得请而卒業焉，以栋属之序。”当即刻于是年。又唐守礼序。清华大学、南京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均藏此刻。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著录一帙，缺卷三十四卷三十五^[7]。

《史汉异同补评》共10册，以线装订，包背装，版心向外。第1册自第一篇《项籍》至第二篇上《汉高》，第2册自第二篇下《汉高》至第五篇《曹参》，第3册自第六篇《张良》至第九篇《张耳 陈余》，第4册自第十篇《魏豹 彭越》至第十三篇《张苍 周昌 赵尧 任敖 申屠嘉》，第5册自第十四篇《酈食其 陆贾 朱建》至第十九篇《张释之 冯唐》，第6册自第二十篇《吴王濞》至第二十二篇《韩长孺》，第7册自第二十三篇《李广 孙陵》至第二十四篇《匈奴》，第8册自第二十五篇《卫青 霍去病 公孙贺 李息 公孙敖 李沮 赵食其 曹襄 韩说 郭昌 荀彘 李蔡 张次公 苏建 赵信 张骞 路博德 赵破奴》至第二十六篇《公孙弘 主父偃 徐乐 严安》，第9册自第二十七篇《司马相如》至第二十九篇《汲黯 郑当时》，第10册自第三十篇《酷吏 郅都 宁成 周阳由 赵禹 张汤 义纵 王温舒 尹齐 杨仆 减宣 杜周》至第三十二篇《佞幸 鄧通 韓嫣 李延年》^④。

《史汉异同补评》包括二序、目录、正文。序言主要记成书缘由及凌稚隆于史学用力之深。第一篇下栏正文部分前五栏记录了是书的重要信息，依次为“史汉异同补评第一篇”“宋倪思编”“元刘会孟评”“明后学凌稚隆订补”“史记项羽本纪第七 汉书项籍列传第一”。其他篇篇首多径以篇数、篇名始，如“史汉异同补评第三篇”“史记陈涉世家第十八 汉书陈胜传第一 项籍同传”。第一篇篇末无字，有些篇目篇末题“史汉异同补评第×篇终”。

目录展现补评篇目。《史汉异同补评》之篇目大都本于《班马异同评》而略有变化。《班马异同评》称35卷，《史汉异同补评》称35篇。二书前二篇目次一致，为《项籍》《汉高》。

《史汉异同补评》目录作35篇，就内容而言，《史汉异同补评》应为32篇。篇33、篇34、篇35均无凌稚隆之评。其中篇33《货殖》仅存《史记·货殖列传》之原文并3条刘辰翁评语，篇33《滑稽》、篇34《日者》仅存目录无正文。

《史汉异同补评》将《高祖》篇分为上、下篇，但仍当一篇计，都为第2篇。《史汉异同补评》在《班马异同评》的《汉高》与《萧相国》之间补评一篇，为第3篇《陈涉》，又将《班马异同评》中的第26、27卷《司马相如上》《司马相如下》合为一篇，为第27篇《司马相如》。除上述变动，其他篇目与《班马异同评》无异。

《班马异同评》之目录并未使用如“高祖本纪”“游侠列传”等题目，而以传主之名作为该卷之名，如卷25《游侠列传》的题目为“公孙弘 主父偃 徐乐 严安”。这一点上，《史汉异同补评》本于《班马异同评》。通过对二书目录与传主的比对发现，如此题名之原因应与《史记》《汉书》的不同有关。《汉书》将《史记》的某些本纪降为世家，世家降为列传，又为《史记》中利用“互见”法表现的多个单独人物立传，还于合传中增加了传主数目，诸如此类的改动不少见。若依《史记》《汉书》之题，则无可依，索性将二书涉及到的传主取并集作为题目。

《史汉异同补评》所选篇目以《史记》为标准，有2本纪，《项羽》《汉高》；6世家，《陈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其余篇目皆出自列传。以《汉书》为标准，仅1纪，《高帝纪》。《汉书》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降为《项籍列传》；《陈涉世家》降为《陈胜传》，《萧相国世家》降为《萧何传》，《曹相国世家》降为《曹参传》，《留侯世家》降为《张良传》，《陈丞相世家》降为《陈王传》，《绛侯世家》降为《周勃传》。其余皆为传。

《史汉异同补评》正文分上下两栏，下栏18.1×14.1公分，半叶九行，每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上栏仅有边框而无界线，每行五字，边框大小依评语内容多少而变，各人评语分置各栏。同一人之评或好几条同置一栏，或一条评语过长则分置于几栏。《班马异同评》评语亦位于下栏之上，但无边框，不如《史汉异同补评》整饬。上栏方框置于下栏相应的点评语段之上。如评论传末赞语，则上框起始的界行与下栏“太史公曰”齐。上栏与下栏相比，字要小得多，字体疑与下栏方体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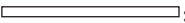
下栏本于《班马异同评》而稍有变化。从体例上来看,《史记》原文以大字书之,《史记》无而《汉书》所加者以细字书之,《史记》有而《汉书》所删者以墨笔勒字旁。墨笔所划在《班马异同评》中为实心墨迹,在《史汉异同补评》中变成了空心矩形框。

空心矩形框“”为评点符号之一。文章圈点法是在南宋伴随着《古文关键》《文章轨范》等评点著作的编刻而发展成熟的。《文章正宗》所标示的圈点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形式上基本以圈、点、抹(撇为短抹)、截四种符号为主,在符号的含义上多指向字句章法、行文立意的作文法。明代的文章圈点法既有对南宋圈点法的承袭,也有一些新变。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由书坊所刊的《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卷首《凡例》标明了唐顺之圈点之法:

○○○○○○○○○: 精华。

.....: 精华。

○○ ●●: 止一二字者是字眼。

: 敝。

: 处置。

: 故事。

: 短抹, 转调。

|: 截, 分段^[9]。

唐顺之之空心矩形框分长、短两种, 长框表明文章敝处, 短框表典故、历史。若按评点学之术语, 矩形框称“抹”, 长框为“长抹”, 短框为“短抹”。龚宗杰在《符号与声音: 明代的文章圈点法和阅读法》一文中将空心长抹称为“虚长抹”, 空心短抹为“虚短抹”^[10]。

明薛应旗批点的《新刊举业明儒论宗》, 有明隆庆元年(1567年)金陵三山书坊刻本, 书前《明儒论宗凡例》对书中所用圈点之法作了如下说明:

○○○○○○○○○: 工意。

●●●●●●●●: 工词。

○○ ●●: 止一二字者是字眼。

: 精华。

: 处置。

: 故事。

: 顿挫、起伏、转调。

|: 分段^[11]。

此书所用圈点之法与前引唐顺之圈点法大同小异, 将唐顺之表示“精华”的长圈、长点细化为工意、

工词两方面, 取而代之的是原本表示文之敝处的虚长抹, 另外给表示“转调”的短抹增加了“顿挫”“起伏”二项。

由上二例可见, 虚长抹、虚短抹往往起着指示阅读之法的功用。考《史汉异同补评》, 虚长抹、虚短抹兼有之, 但仅为标记《汉书》删《史记》处, 无直接指示文章精华或敝处之用。凌稚隆使用“虚抹”之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为了标记更明显。《班马异同评》的实心线为黑色, 虽较栏线稍粗, 但栏线亦为黑色, 二者容易重合, 尤其是在所标记的语段过长的情况下, 墨线有时要至上至下划完整栏, 几乎与栏线重合。这种情况或直接促使凌稚隆使用“虚抹”符号作为标记。二则出于出版创新之意。《班马异同评》有多个版本, 凌稚隆在其基础上成一新书, 为出版之逐利, 有在下栏部分做出改进以吸引读者的可能, 且《史汉异同补评》中的“虚抹”较唐顺之、薛应旗又有了新功用, 显示出凌稚隆于出版形式上的创新, 见图1、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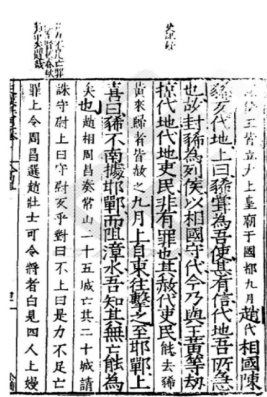


图1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嘉靖本《班马异同评》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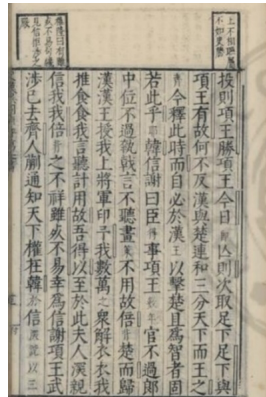


图2 台湾图书馆藏万历本《史汉异同补评》书影

由图1可见, 墨线标记比栏线色深, 但某些确与栏线重合, 漫漶不清, 难以辨认; 观图2, 即使标记与栏线重合, 但因形为空心矩形, 并不影响阅读, 且《史汉异同补评》的版面更整洁、明朗。由图2下栏亦可见,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所加者字体细而小, 所删者以长框标示, 观感大甚于嘉靖本《班马异同评》。图1与图2相对照, 亦可看出上栏评语外围的边框有无之差别。从嘉靖本《班马异同评》和万历年间出版印刷业发展得更为精进, 而凌稚隆作为出版家, 对书籍版式的用心可见一斑。

从评语内容来看, 《班马异同评》中有的评语常

提示段落位置,例如“连下文‘夏六月’”“连上文‘十月’”,这表示《汉书》将《史记》的某些句、段移动。此种情况,《史汉异同补评》皆按《史记》原文以行。对《班马异同评》中标记出的《史记》《汉书》不同处,《史汉异同补评》也并未因袭,而是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加以标记。故《史汉异同补评》与《班马异同评》的下栏内容并非完全一致。

是书版心部分信息丰富,记篇数及页码,如上为“史汉异同补评第二十三篇”,下则为页码,每篇以“一”始,至篇末页数止。上文《四库存目标注》卷一二史部正史类“《班马异同》三十五卷”条解题中提到,《史汉异同补评》“版心下有刻工:自、安、英、仕、付、佑等”。当时记刻工姓氏多为计算工量以支付工钱。据台湾图书馆本,仅见几篇于某页记刻工之姓,或与刻印不清有关。

各篇版心部分信息如下:第一篇计30页,未见刻工;《汉高》上计29页,刻工“自”“安”;《汉高》下计22页,版心刻“二下”;第三、四、五篇计8页,皆未见刻工;第六篇计13页,版心刻“一百□”^⑤;第七篇计13页,刻工“付”;第八篇计12页,版心刻“□三百六”,“仕三名□”;第九篇计14页,第十篇计5页,未见刻工;第十一篇计20页,刻工“安、付”;第十二篇计15页,刻工“古”;第十三篇计9页,未见刻工;第十四篇计11页,刻工“安”;第十五篇计4页,第十六篇计10页,未见刻工;第十七篇计6页,刻工“安”;第十八篇计7页,刻工“付”;第十九篇计7页,刻工“安”;第二十篇计14页,刻工“付”“安”;第二十一篇计13页,第二十二篇计11页,未见刻工;第二十三篇计11页,刻工“付”“安”;第二十四篇计34页,第二十五篇计21页,第二十六篇计22页,未见刻工;第二十七篇计15页,刻工“付”;第二十八篇计29页,刻工“付”“安”;第二十九篇计9页,第三十篇计23页,第三十一篇计9页,第三十二篇计5页,皆未见刻工。

《史汉异同补评》的评点符号多为空心矩形框,仅第一篇《项籍》及第二篇《汉高》上有“、”列于句侧。经阅读比对,这些“、”在文中起着提示句读之功用。这些标记有的与《班马异同评》所标一致,有的不一致。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凌稚隆与倪思、刘辰翁所据的《史记》《汉书》版本不同;其二,凌稚隆阅读时发现了倪思、刘辰翁未曾标记的不同之处。从这

个意义上来看,《史汉异同补评》的形式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建立在文本的形式之上。学者眼中严格的“评点”一般有三个要素:一、批评;二、圈点;三、随文的形式。在《史汉异同补评》,第三条是毫无疑问的;以第一条“批评”来看,《史汉异同补评》涵盖了刘辰翁和凌稚隆及别家批评,可说是多家批评且是多家、跨代学者批评的融合体;以第二条“圈点”来看,《史汉异同补评》包括了倪思、刘辰翁、凌稚隆的标划,虽则凌稚隆在圈点未曾用力,但从形式上来看,此书也融合了跨代学者的圈点。评点形式上的特殊性会影响到评点内容,从其评语可看到内容的融合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研究者须得从《史汉异同补评》对《班马异同评》的继承中探求其创新处。

《史汉异同补评》流传至今,是难得的善本古籍,其版面舒朗整洁,文本印刷精美雅致,距今已五百多年,细节历历可见。由于上下两栏版式、字体大小不一,下栏又有空心矩形框、句读、墨笔符号,版心记篇目、页数及刻工等各类信息,对印刷工艺有很高的要求,这也体现了凌氏印刷技术的高超。从体例来看,是书符合黄永年对万历本的界定。第一,字体为万历年间盛行的方体字,美观大方,方正规整。第二,版心上方一律白口单鱼尾,书名提到鱼尾之上,鱼尾下只有卷次。不过,《史汉异同补评》无鱼尾。第三,常在每卷卷首题撰人的次行,题“明×××校”一行。这在过去虽已有,万历年间更为风行。第四,开始将评点刻在古书上。第五,牌记的消失^[12]。

评点与所评作品是一体的,故带有评点的文学作品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本形式——“评本”。“评本”是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本形态,借着多重形式要素及其组合,构成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细部的总体批评,其主要形式要素有:序、读书法(或称总评)、批语(包括:文前总评、眉批、旁批、尾批等)、圈点等,评点家即借由这些形式要素,进行其批评活动,以开导读者,指引其文学欣赏与创作之门径。倪思的《班马异同》并不成评本,有了刘辰翁之评成《班马异同评》才是评本,且是倪思《班马异同》与刘辰翁评语的合刻本,《史汉异同补评》又补评了刘辰翁的评语,是评本无疑。

《史汉异同补评》的评点形式分为三种。一、序。二、批语(眉批)。“眉批”含有校勘、注释、考证、评文、评史等丰富的内容,也充当了“文前总评”和“尾

评”的角色。批语是评本的主要部分,也是学者进行批评活动最活跃的部分,其内容有评史者,有评文者。就批评视角而言,兼具宏观的和细部的批评。三、圈点。《史汉异同补评》下栏为《史记》《汉书》原文,本于《班马异同评》,有倪思、刘辰翁、凌稚隆划出的二书不同之处,还有少数标点列于句侧。以上三种形式要素彼此呼应,形成一个有机的组合,共同构成此评本之总面貌。

4 结语

《史汉异同补评》是《班马异同》《班马异同评》《史汉异同补评》的合刻本,也是《史记》和《汉书》相似篇目的合刻本。是书下栏体现出《史记》和《汉书》之对比,眉批体现出刘辰翁与凌稚隆之对比,整体又体现出《班马异同评》与《史汉异同补评》之对比。这种多重的对比形式汇于一书,又有空心矩形框等标记的新奇运用,评点与批评对象互相交融,形成一种高度的互文性,相互作为对方的阐释背景而存在,这正是《史汉异同补评》重要的文本形态价值所在。

注释:

- ① 明嘉靖十六年李元阳刻本《班马异同评》录杨士奇题识:右《史汉异同》,近从邹侍讲借录,凡三册。此书吾郡前辈家有之,相传作于须溪,而编内不载。观其评论批点,臻极精妙,信非须溪不能。然《文献通考》云:“倪思撰《班马异同》三十五卷。”思以班史仍《史记》之旧而多删改,务趣简严,或删而遗其事实,或改而失其本意,因其异可以知其优劣,所论政与今所录者合,而卷数亦同。岂非书作于倪,而评论批点出于须溪邪?永乐壬寅八月既望,庐陵杨士奇识。
- ② [清]闵宝梁《畲舍镇志》卷六《著述》论凌濛初时载其著述二十六种,仅提到《倪思史汉异同补评》三十二卷,无其他说明(浙江图书馆藏清抄本)。周录祥《〈史记评林〉研究》一文认为凌氏兄弟情深,推测《史汉异同补评》为二人合著,亦不足信(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页)。
- ③ 《史汉异同补评》本于嘉靖本《班马异同评》,题为《李广 孙陵》,但字体大小一致。
- ④ 后三篇题为:第三十三篇《货殖 范蠡 子贡 白圭 猗顿 乌氏 寡妇 清 卓氏 程郑 宛孔氏 邴氏 刀间 师史 任氏》、第三十四篇《滑稽附 淳于髡 优孟 优旃》、第三十五篇《日者附 司马季主》。
- ⑤ “□”表某字刻印不清,以“□”代之;“一百”等数字应表刻印数量。

参考文献:

- [1] 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9.
- [2] 倪思.史汉异同补评·题史汉异同补评[M].刘辰翁,评.凌稚隆,订补.刻本,明万历(1573-1620).
- [3]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史评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523.
- [4]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史部史评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496.
- [5] 台湾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史部纪传类总义[M].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93:154.
- [6] 台湾图书馆特藏组.“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史部纪传类总义[M].台北:“国家图书馆”,1997.
- [7]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卷一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96.
- [8] 王晓鹏.《班马异同评》研究三题[M].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69.
- [9] 唐顺之.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M].刻本.书林胡氏,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卷首.
- [10] 龚宗杰.符号与声音:明代的文章圈点法和阅读法[M].文艺研究,2021(12):55.
- [11] 薛应旗.新刊举业明儒论宗[M].刻本.金陵:三山书坊,明隆庆元年(1567年):卷首.
- [12]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39-140.

作者简介:王悦,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文学文献学。

收稿日期:2023-02-22

本文责编:李芳

以“残缺”为“实”的文献保护研究

——以《懒放禅师语录》修复为例

吴爽 吕芳

(浙江图书馆 浙江杭州 310007)

摘要:浙江图书馆藏《懒放禅师语录》是《嘉兴藏》的零本之一,该书历经了漫长的岁月,发生了大面积的虫蛀、黏连、鼠啮等病害。文章尝试以现代科学分析检测技术为基础,对搭缝修复与无搭缝修复这两种技法进行比较与总结。研究发现在书页大面积的虫蛀破损处使用平补并结合传统的修复手法,明显提升了修复后文献的平整度、柔软度;在遇到“美观”与“实用”相互矛盾时,严格遵循“整旧如旧”“最少干预”的修复原则,以“残缺”为“实”的方式实现文献的最大化保护。

关键词:修复技法;整旧如旧;最少干预;文献保护;《懒放禅师语录》

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识码: A

A Case Study of Document Restoration Emphasizing the "Real" in the "Incomplete": Restoration of *Zen Master Fangda's Quotations*

Abstract The *Zen Master Fangda's Quotations*, housed in the Zhejiang Library, is one of the rare volumes within the *Jiaying Collection*. Enduring the passage of time, this text has suffered extensively from issues such as insect damage, adhesion, and rodent gnawing.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restoration process, utilizing modern scientific analysis and detection techniques as a found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two restoration techniques, namely "with-seam" and "seamless," are presented. In instances of widespread insect damage on the pages, a combination of patching and traditional restoration methods is employed to notably enhance the smoothness and flexibility of the restored document.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dilemma of balancing "aesthetic appeal" and "practical utility," a stringent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s of "preserving the old as it is" and "minimal intervention" is upheld. This approach avoids excessive restoration, safeguarding the maximized utilization of documentary information.

Key words restoration technique; preserving the old as it is; minimal intervention; document conservation; *Zen Master Fangda's Quotations*

1 引言

《嘉兴藏》是明紫柏大师倡导筹刻,由其门下几代弟子极力谋刻,经明清两代社会名流、文人居士、信士等人捐资助刻而成。因其装帧改变了历来佛经沿用的梵式而采取轻便的方册,又被称为方册大藏经。其内容分为正藏、续藏、又续藏三个部分,因

倡刻者都很注意搜集藏外著述,后来汇成庞大的续藏、又续藏,至于这部分内容,有义疏、各宗著述、忏仪、语录等,大都是明清人所著,语录种类多,反映了当时佛教界思想的情况,是该藏的特色所在。

由于刊刻时间长,刊刻地又不止一处,且是边刊刻边流通,《嘉兴藏》没有完整的目录或全书。浙江图书馆藏有一部残本《嘉兴藏》,就封面、戳记等来认定,此书来源不一,是汇集在一起的。随着古籍普

查工作的开展,浙江图书馆对这部残本进行了整理,发现有二十种子目是《中国古籍总目》与民族出版社重辑之《嘉兴藏》目录所未见,而本次修复的《癞放大禅师语录》(以下简称《语录》)就是其中一种,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该书历经了漫长的岁月,现呈现出大面积的虫蛀、污渍、鼠啮等病态,亟需保护修复。本文着力阐发在遵循古籍修复原则的基础上,如何运用传统与平补的修复手法,并辅以现代科学分析检测技术,对文献进行全面的保护修复,旨在为此类破损文献提供一些修复上的参考。

2 《语录》基本情况与保存现状

2.1 《语录》基本情况

此书共1册,48叶整(卷三为正文首叶),书中记事至清康熙四年(1665年),四眼线装,版框尺寸22.1*15.3厘米,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四周双边,白口,无鱼尾,版心上题:支那撰述,中题:癞放大禅师语录卷次、叶码,下为墨钉。其版式符合《嘉兴藏》的整体特征。该书封面封底破损,双层纸质;颜色为黄色,有签条一则。根据纸张显微镜的分析,其封面封底、护叶和内叶均为竹纸。原书纸张的厚度三点取平均值分别为封面0.153厘米,护叶0.053厘米,内叶0.035厘米,酸碱度为封面6.0,护叶4.9,内叶4.8。

2.2 《语录》保存现状

《语录》全书整体受潮,书口已开裂,呈波浪形皱褶。书册四周(天头、地脚、书口、书脊)因虫蛀、鼠啮破损损失严重,以致无法正常阅读,尤以正文天头虫蛀最甚,能明显看到蛀虫的虫卵黏连书叶,导致前后书叶顺序错乱似麻花交织在一起(见图1)。

封面处有蓝色签条也已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变色和缺损,缺失面积约为原签条的40%。签条上字迹保存清晰,有一字与签条断裂后与正文卷三的首页黏连。正文页一至页四,疑因不明脏物(阳光、有害气体和灰尘侵蚀造成的发黄,也有细菌作用下产生的霉斑)导致封面靠近签条处有4页黏连,呈黄蓝色状态。全书地脚的右侧,有呈三角形的鼠啮破损。

3 修复目标与方案



图1 浙江图书馆藏《癞放大禅师语录》破损情况

3.1 确定修复目标

本次修复重在完成:(1)此书天头处虫蛀破损严重,已无法正常使用,为确保其能如常翻阅,将虫蛀黏连以及虫卵处进行妥善分离,并修复完整。(2)封面签条与正文处,因当时保护环境受限的问题,均有不同程度的黏连,用适宜且安全的方式分离,既不影响美观,又不影响后续使用。

3.2 修复配纸的筛选

在修复配纸的选取上,笔者参照了浙江图书馆2017年出版的《中国古籍修复纸谱》(以下简称《纸谱》)一书。《纸谱》对修复用纸进行了科学、规范的分类和编码,收录了146种手工修复用纸,详细标注了修复用纸的纸张名称、厚度、PH值、亮度、颜色、平面结构、线位图等资料^[1],极大地提高了修复配纸的效率。

3.2.1 正文书页配纸

通过与《纸谱》对比,馆藏毛太纸(ZAH001)与苦竹(ZGG028)在厚度、PH值与纹理上与《语录》正文书页用纸最为相似,然苦竹(ZGG028)在色泽与柔软度上不堪匹配,因此确定毛太纸(ZAH001)作为《语录》正文书页配纸。新的配纸对比正文内页的纸张有着明显的燥性,也就是通常说的“火气”。这种“火气”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纸张手感方面的软和度,一是颜色上的润度。馆藏毛太纸购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四十余年的存放,纸张已经自然充分地接受了空气氧化,在柔软度方面已充分去火,但是在色彩上的火气并未完全去除,此时需要对症下药——染色,秉着“宁浅勿深”的修复原则,以及考虑到为将来留下进一步“色变”的余地^[2],终是以20g橡碗子壳水+500ml水,以“浅一度”的色差,染出与正文内

页最为匹配的纸张。

3.2.2 签条配纸

从表面看签条呈蓝色,纹理不明显,受潮后失去韧性,经显微镜检测原用纸为宣纸。与汪六吉净皮扎花四尺(XAB027)较为相似,但签条受脏物影响所致,四周颜色明显不一,由深向浅过渡,左下侧签条因褪色成浅黄蓝色,而右侧的签条则过渡成黄蓝绿色。为使修复后的签条色泽与封面和谐统一,染色时以植物染料群青为底色,用淡如水的橡碗子滤液做基础,添加少许钛白、赭石,有意识地在颜色中加入一针尖的土黄,借此避免可能出现签条与封面颜色相差过大的结果,最终使其产生整体和谐的效果。

3.2.3 其他辅助用纸

选用安徽潜山桑皮薄皮纸(PIG029)、楮皮纸(PDG007)、旧封面纸作为辅助用纸。

3.3 确定修复方案

根据“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首先,正文内叶选用20世纪80年代福建购买的馆藏毛太纸染色后修复补全。其次,封面封底有霉斑处经干棉球擦拭后,配以近似封面纸补全。再次,书签条褪色后状态为蓝黄色,且与封面、正文黏连,极难揭取,揭下后用染色扎花修复并以楮皮纸加固。最后,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修复后书册原样装订,使这册古籍在修复后仍以最真实、最原始的面貌呈现给读者。

4 修复实施过程

4.1 签条修复

封面签条因长期暴露在外,又因南方气候影响受潮严重,导致纤维降解,韧性缺失,牢牢地黏连于封面之上。因此,必须要先将封面揭取,于封面背部签条之处喷洒纯净水将其湿润,之后用热毛巾在正面签条处稍微闷一下,使此处的水分与纸张上下融合,待水分半干之时,用镊子、针锥等工具尝试揭取。所得的签条看似完整,实则毫无强度可言,对此在破损处先进行修复,然后用楮皮纸对整张签条进行加固,以此方式让签条重生,修复前后的签条如图2所示。

4.2 正文修复

4.2.1 虫蛀及两种修复方法比较

《语录》全书正文天头处虫蛀尤为严重,能明显看到蛀虫的虫卵黏连书叶导致前后书叶顺序错乱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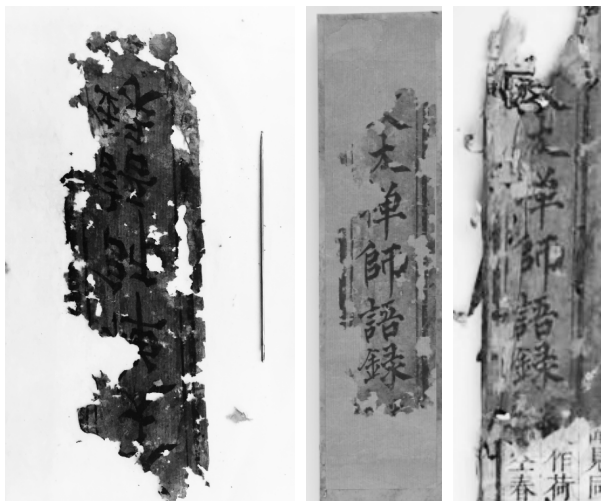


图2 从左至右的签条修复前、中、后对比图

麻花交织在一起。因此首先将全书依次进行编码,确保书叶前后次序不被打乱。对黏连处慢慢地进行分离,每拆解一页就将其平铺覆于吸水纸之上喷潮,使用小号压铁短暂性压平隔离并进行标注,定时对吸水纸进行更替使正文书叶不会再继续受潮。

修复难点:试修用第一种传统修复法(搭口2—3mm),将破损书叶完全展平后,对需修复处顺着纤维用毛笔润湿固定,进而对虫蛀处进行修复,用此法尝试修复完成一叶对折比较后发现竹纸的柔软度欠佳,若用于一般平面文献(1—2页)尚可接纳。但《语录》破损处集中在天头且虫蛀呈蜘蛛网状,若48页层层叠加,修复后将是天头与主体书页呈现高低坑洼不平的状态,整体效果难以令人满意。尝试用第二种平补法进行修复:所谓平补,顾名思义就是无搭缝修复,即对每个虫蛀口都要精确剔除,而后用楮皮纸(PDG007)对搭口处进行固定。平补法优缺点都比较明显,优点:无搭缝的修复可以做到整册书柔软平整又结实,翻阅起来灵活,与原书配合度更为默契,适用于书页纸张较为轻薄的书籍。缺点:效率明显没有传统修复法高,平补讲究严丝合缝,对修复师的技艺要求较高,以此书为例,使用平补法每日也仅能修复一页而已。

经过反复权衡两种修复方法的利弊,最终确定以平补法为主进行大面积书页修复,传统修复方法为辅协助修复部分书页,正文修复后的效果如图3所示。经过此番修复,笔者认为修复书页要从整体效果入手,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不同的情况,哪怕同一页纸,也可使用不同的方式让其效果更加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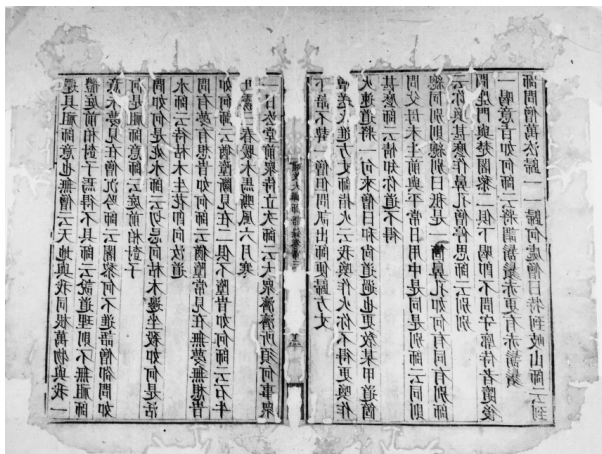


图3 正文修复后平面效果

4.2.2 纸张黏连及三种修复方法比较

《语录》正文与签条页一至页四,疑因不明脏物所致,封面靠近签条处有4页黏连,纸张纤维失去张力,不易揭取。因周围环境影响导致有不同程度的褪色,有部分呈现为蓝黄色,对于这样的状态,笔者先后尝试了三种修复方案:

(1)秉承着“最少干预”的原则^[3],率先尝试干揭法,此方法如若可行,是为此处破损最为快捷的修复与保护方式。所谓干揭法,其核心就是“干”,要保持纸张的干燥,不加入任何水分,只使用修复工具(如镊子,启子、针锥等)将黏连纸张分离。此种方式只能将污渍黏连处周围的软组织打开,对硬伤部分的黏连基本毫无作用。因此只将能揭开处慢慢分离后,另做其他方式的修复。

(2)试用湿润法尝试揭取正文的黏连处,在页四黏连处局部喷洒些纯净水,用毛巾稍微闷一下,使此处的水分与纸张充分融合,待稍干透些,用医用分离器与传统工具(启子、针锥)尝试慢慢揭取。但此时书页依旧僵硬,纹丝不动,完全没办法分离,故而此法也只能搁置。

(3)综上述两种经验之谈,取其利弊采用蒸揭法。所谓蒸揭,顾名思义就是在蒸屉上平铺上吸水纸,将受损书页放置在上面进行揭取。本次修复使用的蒸揭法是在传统的干蒸基础上稍做改良,不同以往仅将整张吸水纸平铺于蒸屉上,而是在吸水纸上开一个5*10cm的小口子,如此一来,使水蒸气与热气都有发散的地方,底下的吸水纸就不会快速受潮,减少水分对书页的碰撞,不用频繁地更替吸水纸,而后将受损的书页放置在吸水纸之上,利用蒸气的热

量,致使纸张纤维受热张开,在高温的熏陶下,边蒸边揭。此法分离黏连处比较有效,但因温度异常高,气体往上直窜,指尖因为高温发烫而难以坚持长时间作业,为了保护书页不二次受损,揭取工作进行相当缓慢,用了2天的时间,才将正文2—4页揭开。

4.2.3 封面与正文处黏连的修复及以“残缺”为“实”的保护方式

封面残损严重,仅剩若干点块状。该册纸张结成书饼状,如何揭开封面与正文处的黏连为本书修复最为纠结所在。考虑到“最少干预”的保护理念,在修复过程中要秉持着对文献干预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不可朝着“过”的方向干预,并要符合古籍修复中“可逆性原则”;但考虑到“文献翻阅”的正常使用,并为将来的古籍数字化作准备,文献修复又要避免修得“不及”,即“点到为止”,但这类修复方式,在美观与完整性的角度上,会有所欠缺。考虑到修复“美观”的艺术性,那么正文页一的书饼霉烂之处还需进一步清理,但彻底的清理,容易伤害文献内容的根基,也就跟文献利用的“实用”性相互矛盾,同时也是一种“过”的干预。

如何同时满足“美观”“实用”“最少干预”这三个修复原则,在“保护”“阅读”“美观”的三重矛盾下,笔者对破损现状进行具体分析,本册修复采用夹固法。在正文页一a面与反面b面破损处用皮纸加固,再尝试进行揭取,从而使a面与b面打开,但是a面与残存封面处黏连严重,为保护书页,决定保留a面与封面的黏连。保留粘连后,该处尚有部分剩余的字迹残留,继而用浅染超薄皮纸进行固定,最大限度保留字迹,保全内容的完整性,以不影响查阅。区别以往的修复理念,不对书页进行过度的修复,遵循“整旧如旧”“最少干预”的修复原则,以“残缺”即为“实”的方式让整册书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黏连修复前后对比细节如图4所示。

4.3 封面封底的修复

将封面封底作为最后的修复程序,是出于对全书完整性的考量。整册书封面封底,经历200多年的风霜洗礼,受潮后产生大量黑色霉菌斑点,用棉球拭去外在的斑点后,用染色后旧封面纸修复大面积缺失部分,小部分破损处使用馆藏老纸进行点缀后,用染色皮纸进行托裱。

4.4 文献后续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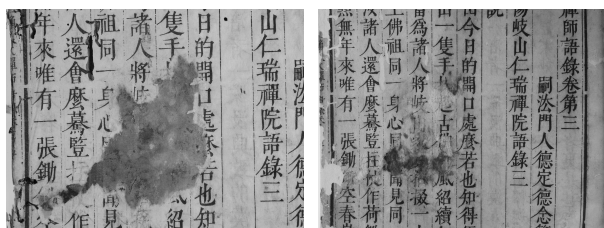


图4 正文黏连修复前后对比细节图

(1) 喷书: 整本书因受潮致使书页有不同程度的收缩, 经过修复的书页, 纸张有明显的还原性, 为使整本书的收缩有最自然的状态, 也为使书籍有更好的平整度, 进行五次喷潮, 五次自然压平, 五次静放的方式, 使书页与空气自然地结合与收缩, 呈现出平整的状态。(2) 敲书: 全书大面积破损处均在天头、书口、地脚, 贯穿始终, 由于采用平补法修复, 所以平整度相对较好, 易平, 捶书时只需注意控制力度即可。(3) 剪书叶: 书叶天头处全部缺失, 可以量完尺寸用裁刀直接裁切成型。但其余书脊与地脚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且书线的弧度都不相同, 再用裁刀以后还需用剪刀细心修改, 修剪时以原存书叶边缘最外侧为准。(4) 装订: 整册书的书叶只有48叶, 比较薄, 墩书过程中有一定的困难。原书无附页, 上下各加2页附叶, 在原装订洞上进行重新装订。贴上书签条, 整册书的修复就结束了。(5) 完善修复档案: 从书目拿到手中开始记录整个过程, 记录修复前、中、后期状况并拍照存档, 从纸质档案上传至浙江图书馆修复档案数据库, 为以后的科学研究提供更为真实、有效的信息。整体修复效果如图5所示。

5 结语

《语录》是研究《嘉兴藏》中明清佛教界思想情况的重要文献实物。针对《语录》本身存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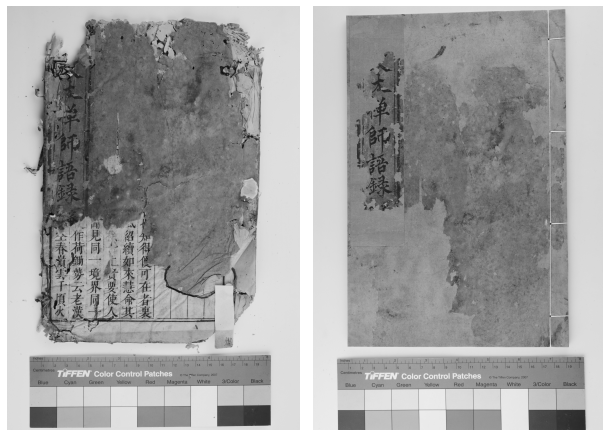


图5 整体修复效果前后对比图

笔者借助纸张纤维检测仪、厚度仪等检测手段, 采用“破损评估—检测分析—修复方案—保护修复—整理档案”等系统的文献保护方式, 利用传统修复技法与现代检测技术相结合的方式, 对文献进行科学的保护修复。

在书页大面积的虫蛀破损处使用平补并结合传统的修复手法, 能明显提升修复后文献的平整度、柔软度。此外, 这种平补的双层修复技艺也可以延伸到其他方面: 一是书页配色。有的单一补纸颜色不够深, 若加一层同色的补纸, 能使修补后的颜色变深, 与书叶更适宜。二是书页厚度。有的补纸颜色合适, 但是偏薄, 遇到整册破损的情况容易凹陷不平, 为了增加补纸厚度有时也可以使用双层补纸。

修复用纸的选用是保证修复质量的关键, 除了需要原材料与本体相似外, 还应与本体强度、PH、厚薄、柔软近似, 配色方面一定要秉持“宁浅勿深”的原则, 才能使整体看起来自然协调。

在“保护”“阅读”“美观”的三重矛盾下, 不对书页进行过度的修复, 灵活运用古籍的修复理念, 在遵循“整旧如旧”“最少干预”的修复原则下, 以“残缺”为“实”使整册书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参考文献:

- [1] 浙江图书馆. 中国古籍修复纸谱[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17: 前言.
- [2] 汪帆. 论古籍修复中“度”的把握——以《唐诗拾遗》一书修复为例[J].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2018(5): 76-79.
- [3] 王国强, 褚嘉欣. 古籍修复“整旧如旧”原则研究[J]. 图书馆论坛, 2017, 37(6): 121, 122-127.

作者简介: 吴爽, 浙江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古籍修复与保护; 吕芳, 浙江图书馆馆员, 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

收稿日期: 2023-05-30

本文责编: 李芳

(上接封二)

2 每多少人拥有一位公共 / 社区图书馆员

考虑到图书馆员和信息工作者在发挥图书馆潜力中的重要作用,分析每位公共/社区图书馆员需要服务的人口数量同样重要,甚至意义更为重大。

表2 每多少人拥有一位公共/社区图书馆员

	最低/人	平均/人	最高/人
亚太地区	1 826.08	24 196.12	760 725.4
欧洲	832.23	2 607.14	70 745.19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1 867.46	10 578.91	484 338.9
中东及北非	35 164.29	64 214.20	240 380.5
北美	2 098.56	2 620.03	19 348.86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3 335.33	61 760.17	6 444 788
世界	832.23	8 975.44	6 444 788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见表2),全球平均不到9 000人就拥有一位公共/社区图书馆员。平均值最低的区域为欧洲,每位图书馆员仅需为2 607人提供服务(北美的平均值略高,为2 620人),中东及北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拥有的图书馆员数量最少。从区域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图书馆员在人口中占比最高的往往是前苏联国家,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和立陶宛每1 000人中就有一位甚至以上的公共图书馆员。而在另一些国家,每位图书馆员需要为超过50万人提供服务(见表2)。

3 公共 / 社区图书馆注册用户数的人口占比

公共/社区图书馆的另一重要指标是注册用户在该地区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表3 公共/社区图书馆注册用户数的人口占比

	最高/%	平均/%	最低/%
亚太地区	100	4.77	0.02
欧洲	35.84	17.27	0.06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28.43	13.94	0.06
中东及北非	2.28	0.15	0.09
北美	51.55	49.69	33.82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18.28	1.25	0.01
世界	100	9.61	0.01

表3展示了公共/社区图书馆注册用户数的人口占比。这个指标的数值差异非常大,但从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全球仅有不足10%的人口注册成为了公共/社区图书馆用户,平均值从北美的近50%到中东及北非地区的0.15%不等。从国家层面来看,有部分国家报告说他们所有的人口都是图书馆的注册用户,而在部分其他国家,每1万人中仅有1人是图书馆的注册用户。

4 每一公共 / 社区图书馆的员工数量

了解每一公共/社区图书馆的员工数量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公共/社区图书馆的架构。

表4 每一公共/社区图书馆的员工数量

	最低/人	平均/人	最高/人
亚太地区	0.06	0.80	21.10
欧洲	0.58	2.25	7.00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0.13	2.32	37.00
中东及北非	2.15	2.86	6.23
北美	0.59	6.88	8.13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1.08	1.61	8.79
世界	0.06	1.77	37.00

表4简要描述了这一指标。可以看到,在全球层面,每一公共/社区图书馆平均拥有1.77名员工。在区域层面,每一图书馆拥有的员工数量从亚太地区的0.8名到北美地区的6.86名不等。欧洲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数字相对接近,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数据更加接近全球的平均水平。

从该指标的各个区域最高和最低值来看,结果显然是有些极端的。从巴拉圭的0.13到安提瓜和巴布达的37,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呈现出了巨大的差距,那里的公共图书馆也同时承担着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加拿大(0.59)和美国(8.13)的平均值也有很大的差距。

5 公共图书馆提供互联网访问的情况

并非所有国家都向世界图书馆地图提供了有关互联网访问情况的数据,因此,该指标的研究范围比较有限,但还是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表5 提供互联网访问的公共/社区图书馆占比

	最高/%	平均/%	最低/%
亚太地区	100	77.62	50.22
欧洲	100	67.69	12.23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100	55.44	8.33
中东及北非	100	20.05	6.25
北美	100	96.18	96.17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100	69.14	7.24

表5所示平均而言,在所有提供了数据的公共/社区图书馆中,有近70%的图书馆提供有互联网访问服务,这一数字从北美的96%到中东及北非地区的20%不等。

从区域层面来看,每个区域都有一个或多个国家/地区的所有公共/社区图书馆都能够提供互联网访问服务。同时,在所掌握数据的国家中,从该数字的最低值来看,亚太地区为50%;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中东及北非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部分国家/地区不到10%;有趣的是,在欧洲,部分国家提供互联网访问的图书馆占比也非常低(最低值仅为12.23%)。

将这些数据与该地区互联网用户占比的数据进行比较(见图1),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结果。(这里的互联网用户占比是一个较低的标准,指的是过去一个月内的上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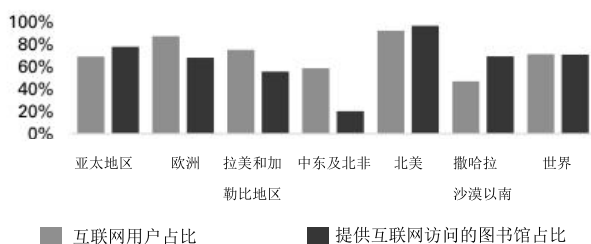


图1 互联网用户占比 vs 提供互联网访问的公共/社区图书馆占比

但这里仅呈现了部分我们既掌握了图书馆数据又掌握了互联网访问数据的国家/地区,因此该数字与全球数据存在差异。

例如,从全球角度来看,互联网用户占比与提供互联网访问服务的图书馆占比非常接近。但在亚太地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提供互联网访问服务的图书馆占比要高于使用互联网的人口占比,而其他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中东及北非地区的差距尤其大。

6 每多少人拥有一位学术馆员

在学术图书馆领域,我们可以分析学术馆员的人口占比,考虑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学术图书馆组建方式的差异,这一指标可能更有意义,具体数据如表6所示。

表6 每多少人拥有一位学术馆员

	最低/人	平均/人	最高/人
亚太地区	1 962.197	13 594	676 174.6
欧洲	1 860.903	7 513	203 835.1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6 455.199	12 803	109 248.1
中东及北非	25 757.74	39 321	1 531 664
北美	3 886.645	3 964	56 661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10 100.18	86 676	1 574 986
世界	1 860.903	10 384	1 574 986

从世界图书馆地图的数据来看,全球平均每10 384人就拥有一位学术馆员(图书馆和信息工作者),这一数字从北美的每3 964人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每86 676人不等。在亚太地区和欧洲,有些国家每2 000人中就有一位以上的学术馆员,但也存在每150万人中只有不到一位图书馆员的现象。

7 每一学术图书馆员对应的研究人员数量

世界银行提供了人口中研究人员数量,将其与学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数量进行比较,可以了解学术图书馆和研究部门的相对规模(见表7)。虽然并非所有研究人员都在大学里工作,但可以由此了解图书馆员对研究部门的支持力度。

表7 每一学术图书馆员对应的研究人员数量

	最高/人	平均/人	最低/人
亚太地区	1.235 892	25.42	225.384
欧洲	3.186 695	26.69	354.48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0.603 956	3.70	18.581 96
中东及北非	6.382 644	19.08	21.584 46
北美	18.738 4	18.98	21.554 4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5.535 613	13.08	43.855 43
世界	0.603 956	22.42	354.48